

《慈善法》首修 16
经济触底之后 30

理财净值化步入深水区 38
险企养老社区开启大洗牌 44

多年生稻能否带来农业革命? 58
直面人口负增长时代 65

财新周刊



新加坡接班人的愿景

黄循财说：“我认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是一个服务型的领导者”

P.22



2023年 第4期 1月30日出版
总第1040期
邮发代号：32-235

ISSN 2096-1251



9 772096 125233

最新封面报道 | 新加坡接班人的愿景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1月30日第04期

黄循财说：“我认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服务型的领导者”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图：新加坡财政部

文 | 财新周刊 曾佳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地处东南亚的新加坡，依托中新两国开展的三大政府间合作项目等桥梁，成为中国和西方世界彼此沟通、相互理解的重要交流管道之一。近年来，在中国于东南亚等地区推进的一系列多边开发机制中，新加坡展现出高度的兴趣和参与热忱。通过共建陆海新通道、在数字和绿色经济等新领域不断拓展合作，中新两国积极维系着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示范性的高质量合作伙伴关系，并且已溢出双边维度，为整个亚太区域的合作、稳定与繁荣铺设了一层重要基石。

在过去三年的全球疫情考验中，新加坡被广泛视为张弛有度的“抗疫模范”，也是最早推动对华人员和经贸交流重启的国家之一。

作为在面积和人口意义上的小国，新加坡在外交上视国际法和以多边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立身之本。而今，中美大国竞争长期化、中国与东盟合作升级等趋势，驱动着全球格局的震荡和变迁。自俄乌冲突2022年初爆发以来，新加坡力求与各方维持默契与互信的外交空间，遭受到新一波的挤压。但这些冲击没有动摇新加坡对多边主义原则的坚持，也未湮没其反对单边行径的频频发声。

步入2023年，在全球各主要经济体迎来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周期，中共二十大和防疫措施的大幅调整为中国叩响下一阶段的大门之际，中新两国将通过加强疫后复苏合作、携手维护区域稳定发展，来共同书写后疫情时代的新篇章。

即将在未来的这段旅程中扮演新方关键角色、日后笃定接棒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的，正是经过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协商达成共识、于2022年4月被推举为该国第四代领导团队领军人物的新加坡副总理黄循财。

和新加坡已故首任总理李光耀、其长子李显龙等前几任领导人不同，今年50岁的黄循财并不具备显赫的家世背景，而是来自一个父亲是推销员、母亲是教师的普通家庭。

在社交网站上，黄循财自我介绍是一个“书虫、吉他手和爱狗人士”。他的账号还时常发布自己在充满烟火气的新加坡小贩中心吃饭，或者和小动物微笑握手互动的照片。

据黄循财回顾，他的父亲在上世纪40年代离开祖籍海南，远赴当时的马来亚帮助当厨师的祖父。童年时，黄循财在位于新加坡本岛东南沿海地带的马林百列（Marine Parade）长大，他就读的中学也没有新加坡精英学府的标签。但成年后，他负笈美国，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取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

早年在新加坡财政部担任公职后，黄循财于2005年被总理李显龙看中，出任李显龙的首席私人秘书达三年之久。

2011年，黄循财从文官转型，首次当选新加坡国会议员。之后他历任文化、国家发展、教育部长等职。但黄循财在新加坡国内外声望急升，始于2021年1月他在新冠疫情危急时刻，出任新加坡疫情应对跨部门工作组的联席主席。



当地时间2022年4月16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左）和黄循财出席新闻发布会。当天，李显龙宣布，黄循财将出任该国下一任总理。图：Mohd Fyrol/IC photo

在黄循财及同僚的联合指挥下，新加坡实现了由“清零”转向“共存”方针的稳步过渡。疫情刚刚袭击新加坡时，黄循财曾在国会发言中一度哽咽，含泪感谢在最前方抗击疫情的医护等一线工作人员。

2021年4月，此前选定的新加坡原第四代领导团队领袖、副总理王瑞杰因年龄原因而自愿放弃了接班人资格。第四届领导班子随即启动了新一任接班人的选拔程序。

仅一个月后，黄循财被委以财政部长的重任。继在抗疫小组证明了自身能力之后，黄循财执掌财政部期间亦被认为表现不俗，发挥了其一贯稳健谨慎、低调亲和行事作风的优势。

经过一年的遴选，2022年4月，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征询了19名内阁部长的意见后，获得其中15名同僚背书的黄循财，被推到了聚光灯下。现任总理李显龙宣布，黄循财被选定为新加坡第四代领导团队的新领军者。

2022年6月起，黄循财升任新加坡副总理，并继续担任财长。在党内职务方面，黄循财从当年11月起出任新创设的人民行动党副秘书长一职，进一步确认了准备接棒秘书长李显龙的地位。

针对推举黄循财为接班人以及自己对第四代领导梯队的期望，现年70岁的李显龙表示，新领导班子必须满足新加坡国民的新期望与要求，应对世界中涌现的新问题，让已处在高发展水平的新加坡继续茁壮成长，而且确保新加坡领导层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十分重要。“领导权并非源自继承，而是需要每一代领导人的努力争取。”

过去十余年间，多元、多种族的新加坡社会围绕自身基本价值观的讨论日益突出——包括是否应该继续奉行“效绩至上主义”、如何在适度收放移民政策与保持新加坡竞争力等需求之间保持平衡，等等。

作为一名树立了亲民形象、在舆论场中几无争议的领导人，黄循财或有望吸引传统上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新加坡选民群体。在有力团结和凝聚新一届领导班子方面，黄循财也备受看好。

在总理接班人的身份明确后，黄循财誓言，他将为新加坡“创建一个更公平、更绿色、更包容的国度”。同时，他也不讳言摆在自己面前的重重挑战：“没有一个现成的新加坡未来蓝图”。

为在适合的时间点接替李显龙而己在“热身”的黄循财，于新旧年的交替之际接受了财新的书面专访，就中国和新加坡的双边关系、中国与东盟合作展望、新加坡自身定位和挑战、区域与国际事务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财新：2022年6月，你启动了一场为期一年的“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目标为“更新新加坡的社会契约”。你对目前和未来的新加坡社会契约抱有哪种愿景？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的移民国家，它的根基和凝聚力在何处？

黄循财：许多发达经济体都在应对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以及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如果一个国家无法实现包容性增长，让各阶层人民共享繁荣的果实，那将导致社会分裂，出现纷争。

因此，我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展开“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以更新我们的社会契约。我们希望借此运动达到以下目标：为每一位新加坡人提供更多机会，让每一位国人都感受到国家的进步与自己的未来息息相关；加强对人民的保障，尤其是对弱势群体，以确保没有人在陷入困境时感到孤立无援；维持社会凝聚力，确保人民始终保持团结一致。

这事关重大。社会契约一旦瓦解，新加坡社会必会出现分裂。但如果我们能加强社会契约，就能把挑战转变成机遇，确保新加坡社会继续享有高度信任。毕竟，信任是维持社会凝聚力的黏合剂，对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的小国而言，尤其重要。

财新：新加坡第四代领导班子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在当今的世界中，带领这个第四代领导团队的最重要素质都有哪些？

黄循财：新加坡的政治领导模式，从来就不是单靠一个人，而是讲求团队合作。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有所贡献，大家相辅相成、相互配合。作为团队的领导，我将尽最大的努力让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发挥所长，做到最好，共同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大贡献。

我认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服务型的领导者。换句话说，我的角色并不只是带领同胞，而是为我的国家和新加坡同胞服务。父母自小给我灌输的理念是，无论别人交给我什么任务，我都要尽力做到最好。如果尽了力却还是不足，我就会不断学习、力求进步，不断做得更好。日后，我将继续秉持这个已坚守多年的原则，努力赢得全民的信任和支持。

财新：全球化正日益遭到地缘政治摩擦、民族主义思潮升温、大流行病等冲击的挑战。新加坡是一个高度依赖并且受益于全球化的国家，它将如何应对这些全球化的逆流？在下一个阶段，全球化的前景如何？

黄循财：过去几十年，全球化让世界各国获益良多，并让包括中国和新加坡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蓬勃发展，经济大幅度增长。不仅如此，全球化更有助于拉近各国之间的距离，进而促进了和平与稳定。

遗憾的是，世界似乎即将迈入新的历史时期。经济、贸易和金融，日益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因此，世界变得更加分裂，经济脱钩的风险也日益加大。

作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新加坡一直密切关注这个趋势。如果中美关系持续紧张，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许会越来越难找到与彼此进行贸易及合作的理由。这将对全球经济和供应链产生严重影响。中美两国乃至全球各经济体，都有着唇亡齿寒的关系，所以无论是一分为二，或是选择性脱钩，都不可能毫无痛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最近趁出席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时会晤，反映了双方对稳定两国关系的共同意愿。我们希望这次会晤能为两国开辟道路，让双方重建互信，并找到和平共处的方式。

新加坡相信，在共同关心的领域促进合作与伙伴关系，仍然对确保所有国家持续繁荣发展至关重要。这也正是为什么，新加坡将持续与中美两国都建立坚定友谊和伙伴关系。新加坡也会继续提倡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继续作为一个主要的连接点来联系各国和各区域的人民及企业，为建设一个稳定和具包容性的区域尽一份力。

财新：新加坡虽小，但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扮演着厚重的角色。2022年早些时候，新加坡罕见地对俄罗斯实施单边制裁。在地缘政治摩擦上升之际，新加坡将扮演哪种角色？你希望向国际社会传达哪种声音？

黄循财：新加坡是个小国。尊重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对新加坡而言是赖以生存和存在的核心原则。我们坚决支持国际法和禁止对主权国家进行侵略的《联合国宪章》。正因如此，我们强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新加坡将继续秉持一以贯之和有原则的立场，拥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治。我们也竭尽所能，尝试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支持以多边方案解决全球问题。

如果世界各国不携手合作，我们将无法解决气候变化和全球冠病疫后复苏等共同问题。新加坡虽是个小岛国，但胜在足够敏捷、富有想法且善于与他人合作。1992年，新加坡与一些国家合作，建立了跨区域的“小国论坛”平台（FOSS）。该论坛不仅延续至今，更是茁壮成长。如今，这个已有108个成员国的小国论坛，能让小国在制定国际议程和促进共同利益方面集体发声。

财新：你如何定义中新关系？中国和新加坡建立了重要的政府间合作项目，包括1994年的苏州工业园区、2008年的天津生态城、2015年的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这些项目扮演了哪些角色？中新两国还能在哪些领域深化双边关系？

黄循财：新加坡和中国是老朋友，也是长期的合作伙伴。在中国的各个发展阶段，我们都给予支持。2015年，新中两国在庆祝建交25周年之际，同意建立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在苏州、天津和重庆所推展的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就是两国之间牢固伙伴关系的最佳例证。这些项目是根据中国的发展考量而展开的，也体现了新中关系具有示范性和前瞻性。

两国于1994年开发的苏州工业园区，是第一个新中政府间的合作项目。该项目侧重分享新加坡在工业和综合市镇发展方面的经验，而这些是中国工业化初期的首要发展事项。如今，苏州工业园区在中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为了确保园区持续与时俱进和保有竞争力，新中两国在近年来把合作范围扩大，以涵盖生物医药业等新领域。尽管苏州工业园区成立至今已近30年，它仍然是新中两国合作的“探路者”。

于2008年建设的天津生态城，是新中两国的第二个政府间合作项目。当时，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还未引起全球的

关注，中国却正经历快速城市化，也日益重视可持续发展。如今，天津生态城已从一片贫瘠的荒地发展成一个富有活力的宜居地区。天津生态城现有超过13万人居住，以及超过2.3万家注册公司营业。天津生态城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并获中国政府指定为测试与绿色发展、海绵城市、零废弃城市 and 智能城市相关解决方案的试点。天津生态城是一个极具价值的项目，汇集了新中两国的官员、企业和人才，以试验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实施的创新、实用和可持续方案，来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全球挑战。天津生态城将在2023年庆祝成立15周年，我期待两国继续加强在天津生态城的合作。



上图：当地时间2022年7月15日，印尼巴厘岛，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黄循财（左二）与印尼、沙特和阿联酋财政部长会晤。图：MadeNagi/人民视觉。
下图：当地时间2022年11月14日，新加坡，黄循财（前排左二）、德国总理朔尔茨（前排左三）等出席德国经贸亚太会议。图：KayNietfeld/视觉中国

于2015年启动的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重点示范项目。以“现代互联互通”为主题的中新（重庆）互联互通项目，加强了新中两国之间的贸易和连通性，为双方带来益处。该项目旗下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也为中国西部和东南亚提供更直接的通道，使双方的供应链更具韧性。

除了上述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新中两国也建立了其他合作项目，以推动双方在拥有共同利益新领域的合作。这包括中新广州知识城和新中（深圳）智慧城市项目，以加深双方在创新和建设智慧城方面的伙伴关系。

这些双边合作项目在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自1996年以来，新加坡已培训超过5.5万名中国官员和干部。另一方面，新加坡也派遣了许多高级官员到中国各地考察，以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这些双向交流非常重要，能够让两国官员更加了解彼此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以及激发双方提出新点子让两国合作更为丰富。

这些项目不仅彰显新中关系不断向前迈进，也促进两国的高度互信。新加坡会继续和中国携手合作，为两国人

民和企业谋福祉。展望未来，我们认为两国可以在一些长期合作领域，如贸易、投资和创新等，深化伙伴关系。此外，也加强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和供应链互联互通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我们在新中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JCBC）第18届会议上所达成的19项谅解备忘录和合作协议，就反映了两国双边合作的多元化和前瞻性。

新加坡非常珍惜并高度重视和中国的深厚友谊和伙伴关系。我们坚信，新加坡和中国的双边合作会继续攀登新高峰，并为本区域创建一个稳定、和平和包容的环境，让各国可以共生共荣。

财新：中国已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而且也在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化合作。新加坡在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上秉持什么立场？新加坡如何看待中国在区域合作方面扮演的角色？

黄循财：多年来，中国积极促进区域和世界繁荣发展，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有系统地发展其区域和多边联系。中国也是首个与东盟建成自由贸易区的外部伙伴，并且是最先核准RCEP的东盟自贸协定伙伴。

随着中国继续推进其改革开放议程，我们期待中国能与其他区域经济体更紧密融合。中国与区域各国加强经济合作，将能为我们的人民和企业带来实质的好处，互惠互利。

新加坡对中国申请加入CPTPP之举表示欢迎和支持，前提是这必须按照协定的规则和程序进行。CPTPP意在成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协定。协定的签署成员已经重申对扩充其规模的支持；任何经济体，只要承诺实现协定目标，以及能够并愿意达到协定的高标准与市场准入要求，那么成员就会对这些经济体的加入表示欢迎。因为新成员的加入必须获得现有签署成员的一致同意，所以新加坡一直鼓励中国等有意加入的经济体与签署成员进行磋商，以解答个别签署成员的问题或消除它们的顾虑。

财新：在2021年的上海市—新加坡全面合作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上，双方提到将在金融领域深化合作。迄今为止进展如何？

黄循财：自2019年成立新加坡—上海全面合作理事会以来，新沪双方扩大并深化了各方面的合作，例如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新合作项目。新加坡和上海都是金融枢纽，而我们的金融机构也有意扩大跨境合作，因此，我们也加强了我们的伙伴关系，尤其是在金融领域的合作。



2022年11月5日，上海，第五届进博会，新加坡国家展区。如今，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新加坡自2013年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境外投资来源地。

绿色金融方面，我们也取得了三个“第一”。在债券市场中，[华侨永亨银行（中国）](#)成为第一家在中国发行5亿元人民币绿色债券的外资银行，为中国境内符合条件的绿色项目提供融资。另外，[上海临港集团](#)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和中国[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支持下，在新加坡发行了第一单双币种（欧元及人民币）自贸区离岸债券（又称“明珠债”）。股市方面，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共同推出第一套低碳指数，为基金经理提供基准，以推出专注于中国、东盟和RCEP国家的新绿色基金。这些例子凸显了新加坡和上海能通过合作和发挥各自优势取得更大成就，以满足双方经济乃至更广大区域的绿色融资需求。

为了更好地支持中国与东盟日益增加的经济和贸易流动，我们的金融机构也提供更多服务并深化它们之间的伙伴关系。例如，星展银行和银联国际在2022年6月推出一项全球服务，让星展银行用户能够在任何支持银联扫码支付的商户扫码付款，方便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旅客利用该服务进行小额支付。同样的，新加坡的3家银行也和临港

特区签署了合作协议，更好地满足中国企业的跨境需求。

我相信新加坡和上海的金融中心可以携手做得更多，支持两国的经济并促进本区域的投资活动。通过新的机制，例如最近成立的新加坡—上海金融合作工作小组，我们希望能深化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的合作，促进最佳作业方式的交流（**facilitate exchange of best practices**），以及开辟新道路，为本区域的发展提供更多支持。

财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表示有兴趣在新加坡和东盟进行投资。你对他们有哪些建议？私营企业在中新关系中能够扮演怎样的角色？

黄循财：我们注意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希望将自己的方案、技术和发明推向国际市场。这些企业家梦想建立业务遍布全球的企业。他们也希望从东南亚的增长中受惠，因为这个地区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东南亚也正迅速数码化，人口也很年轻。

新加坡在东盟地理位置独特，加上有许多跨国公司汇聚于此，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中国企业和企业家通往本区域和世界的桥梁。许多中国企业已经选择以新加坡作为自己在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枢纽。我们的吸引力在于拥有良好的数码和物流连通性、熟练的劳动队伍、充满活力的创新和创业生态系统、清晰明确的政策，以及我们良政善治、社会稳定的声誉。

我们为企业提供选择，协助它们在东南亚扩大制造业足迹，建立更多元的供应链。同时，新加坡也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社会。学习在这样的环境中运营，将有助于中国企业在多元文化的东南亚中取得成功。

私人业界是新加坡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的主要推手。如今，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新加坡自2013年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境外投资来源地。为促进双方的商业合作，新加坡与四川、山东、辽宁、浙江、天津、广东、江苏和上海设立了八个经贸理事会。这些理事会的工作重点，是加强私人领域之间的合作。

私人业界的往来，也是两国人民交流的重要渠道。我们在2019年推出了青年实习交流计划，为来自新加坡和中国的青年提供长达六个月的双向实习机会。在私人业界的推动下，这类计划有助于新中两国的青年更深入了解彼此的文化和观点。□

版面编辑：吴秋晗

社论 | 坚持合作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1月30日第04期

寻求最大公约数，弥合分裂，找出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新思路、好方案

未来世界向何处去？睽违三年后重回线下的[达沃斯论坛2023年年会](#)日前举行，其主题“在分裂的世界中加强合作”令人感喟。愿望是美好的，而现实是严峻的。面对种种全球性挑战，各国如何重建互信、加强合作，考验着国际社会的智慧。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并推动国际政策协调与全球交流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正面临新冠疫情、经济衰退、俄乌冲突、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安全等一系列共同威胁，亟待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但是，世界已然改变。与新冠疫情暴发前乃至俄乌冲突爆发前相比，各国之间曾经热火朝天地讨论的全球气候变化、经济金融风险等主题，都不似过去受关注，仿佛问题已不复存在。更大的危险在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形成的全球合作机制、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协调机制越发薄弱。这一局面令人忧心。上述全球性问题并不会因为人们不再密切关注而凭空消失；如果一味抱持鸵鸟心态，忽视国际协调与全球合作，人类面临的种种风险与危机将呈愈演愈烈之势，各国均无法独善其身。加强协调与合作是当务之急，大国更应负起责任。只有合作的姿态、善意的表达是不够的，国际社会须正视和反思造成世界分裂的原因，各国特别是大国应跳出相互指责的恶性循环，这于事无补，而应积极行动起来，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怎么说、怎么做，备受国际关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今年达沃斯论坛年会上的主旨发言](#)，正发出了“在分裂的世界中加强合作”的强音。他特别提出了关于如何解决世界合作问题的三点观察：坚持正确的原则，维护有效的国际经济秩序；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平衡好治理通胀和稳定增长的关系；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几项主张十分重要，在国际舞台上再一次传达了中国政府专业、理性的声音。而在此行的短短数日内，刘鹤还同美国财长耶伦举行了会晤。这也是拜登总统就职以来，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双方牵头人举行的首次线下会晤。无论对于面临衰退风险的全球经济，还是对于“科技脱钩”愈发严重的中美关系，这些都是积极信号。

来自中方的信号明确，信号接收方的态度也同样重要。在去年年末调整国内疫情防控政策、今年年初优化中外人员往来管理之后，中国经济有望实现整体性好转，国际社会特别是商界对此反响积极。但是，外界的观望和疑虑情绪也不容忽视。三年来的新冠疫情和一年来的俄乌冲突已然改变了很多事情，世界不会简单回到过去。

信任的重建、信心的回升，需要的不仅是口头的善意、政策的宣示，更重要的是具体的行动、落地的效果。眼下，分裂仍在加深。有中国企业家指出，如今，供应链脱钩已不再仅是某些外国政府行为，很多跨国企业也开始参与其中；一旦走到外资对中国市场不在乎的地步，形势就很难挽回了。他们盼望企业公平竞争，政府对内外资一视同仁。形势逼人。据IMF研判，2022年中国GDP增速可能40年来首次低于全球增速。2023年，全球经济将比去年更加艰难。有此外部环境，虽然中国经济会好于2022年，但是，对于可能面临的困难，政企两界仍须做好心理准备，并制定有力的对策。

“坚持正确的原则”不仅适用于解决世界合作问题，也同样适用于推动国内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二者又相辅相成。正如刘鹤在发言中所提出，关于合理分工、鼓励竞争、反对垄断、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弘扬企业家精神、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坚持公平分配、完善社会安全网、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等经济原理没有改变，政府应该在重大问题上发挥作用。“面对暂时出现的阻力和倒退，我们应当勇于坚持真理，尊重规律，用务实朴素的办法解决复杂的问题。”这些论述，是4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结晶，也是人类发展的至简大道。

对中国来说，坚持正确的原则，最重要的是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依法治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题中应有之义。当前，中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是，顺畅的国内循环绝对离不开国际分工和合作。分工与合作则需要普遍认同的体制、规则与价值观作基础。刘鹤在发言中有针对性地回应称，“有的人说中国要搞计划经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可谓掷地有声。不过，也应看到，不必说真搞计划经济，单单个别官员对市场经济心存疑虑进而留恋计划经济、贯彻全面深化改革部署不够坚决，就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伤害。

只有坚持正确的原则，中国才能做好自己的事，也才能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同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加强协调与合作。我们期待各国力戒庸俗狭隘的实用主义哲学，摒弃首鼠两端的机会主义行为，一道寻求最大公约数，这样才能弥合分裂，找出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新思路、好方案。

（本文为即将于2023年1月30日出版的《财新周刊》第04期[社评](#)）

版面编辑：李东昊

最新财新周刊 | 《慈善法》首修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1月30日第04期

《慈善法》施行六年首次修订，拟新增应急慈善专章，将个人求助纳入规制范围，慈善组织登记、公募资格及税收优惠措施等问题未突破



2021年12月16日，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37名孩子收到一家基金会送出的爱心温暖包。

文 | 财新周刊 唐爱琳

“作为一线人员，让我感到欣喜的是，修订草案专门提到了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慈善的协调机制。”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灾害救援与项目管理部主任朱一存说。

2021年7月，河南省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在山洪肆虐的巩义县，为获取损失和需求信息，朱一存向当地乡村振兴局报备后，对全县的乡镇逐个开展调研。这是朱一存工作的常态，过去十年间，她参与了大大小小各类自然灾害救灾工作。对灾情信息的及时收集和判断，直接影响到资源的募集、调拨；而应急状态下，社会组织与当地政府部门之间往往缺乏有效的协调。“《慈善法》修订，可以在协调机制中，明确政府与社会力量共享信息，以便更精准地响应灾民需求。”朱一存说。

2022年12月底，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期进入倒计时之际，几经酝酿的《慈善法（修订草案）》（下称“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审议。2022年12月30日至2023年1月28日，修订草案全文上网公布，向公众征求意见。相比现行《慈善法》，修订草案新增1章21条、修改47条，对应急慈善设立专章，填补了网络慈善规制空白，将个人网络求助纳入规制范围。

现行《慈善法》于2016年3月16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表决通过，同年9月1日开始施行。一部法律实施仅六年多便启动修订，在立法工作中较为少见。这既与百年难遇的新冠疫情有关，也得益于官方和民间共同的推力。财新了解到，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全国人大代表共提出57件相关修法议案建议。2020年8月至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对《慈善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撰写了《关于检查〈慈善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下称“执法检查报告”），提出适时修改《慈善法》。同年10月中旬，实务界、学界、企业、媒体和政界60余人联合发声，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送交《关于〈慈善法〉执法检查后启动修法程序的建议》（下称《修法建议》）。

2021年3月，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启动修法。官方和民间共同关注到，《慈善法》颁布以来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如社会组织增幅减缓，慈善组织登记认定总量偏低、结构失衡；社会捐赠增速下降，互联网募捐能量反遭限制；新冠疫情暴露了政府部门与慈善力量缺乏应急协调机制；民政部门监管不足和制约过度并存，慈善组织享受的优惠政策难以落实。

有关《慈善法》修订的研讨会在2022年底2023年初密集举行。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修订草案回应了《慈善法》施行以来遇到的款物募捐等热点问题，但一些实质性问题仍有待突破。“修订草案有进步和突破，但力度有限。”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的看法颇具代表性，由于立法体系的限制和相关配套制度不足，修订草案未能清晰梳理和触及阻碍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些核心问题。

应急慈善规制什么？

2020年的执法检查发现，新冠疫情是《慈善法》自2016年实施以来接受的最集中、最全面的考验，暴露出应急协调机制缺乏等问题。

现行《慈善法》仅有一个条文涉及应急慈善，其第30条规定：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需要迅速开展救助时，有关政府应当建立协调机制，提供需求信息，及时有序引导开展募捐和救助活动。

许多慈善界人士记忆犹新的是，在武汉新冠疫情初期，社会捐赠款物的接收与分配机制失灵，湖北省与武汉市指定五家机构作为接收社会捐赠款物的专门机构，但湖北省红十字会、武汉市红十字会因“人手不够”频频统计出错，物资调配效率极低，引发舆论哗然。而在志愿服务方面，前往武汉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大多是自发的、分散的、随机性的参与抗疫，既缺乏必要的物资保障和安全防护，也没有规范系统的指导和统筹协调。

此次修法中，修订草案将应急慈善列为专章，规定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政府，应当建立协调机制，明确专门机构、人员，及时发布需求信息，引导慈善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突发事件应对。针对突发事件中款物募集和使用情况公开不及时的情况，修订草案新增规定，在应急处置与救援阶段应及时拨付或使用募集款物，至少每五日公开一次募得款物的接收、分配、使用情况；县级以上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应急慈善工作需要，为捐赠款物分配送达提供便利条件。

作为一线救援人员，朱一存注意到修订草案提及协调机制，以及明确了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在她去过的灾害现场，由于地方政府或应对不暇或缺乏对社会组织的了解和相应的机制，社会组织往往只能通过各自不同的路径与当地有关部门对接，如乡村振兴局、团委等等。一位救援组织人士把这种局面形容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2022年春天上海新冠疫情期间，封控措施使许多志愿者无法在线下活动，社会组织难以获得车辆通行证。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家良曾向政府有关部门呼吁，开放社会组织参与响应。他向财新表示，应细化对突发事件中的慈善活动规范，突发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应当建立与企业代表、社会组织代表的决策参与机制，帮助企业和社会组织了解情况，确保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引导募捐和救助活动的有效开展。

在朱一存看来，信息共享是协调机制的关键环节。救援过程中，社会组织常通过志愿者逐村走访的“拼图”方式获取灾情和需求信息，存在效率低、信息欠准确的情况，同时灾情和求助信息也是实时变动的，这直接关系到款物筹集和发放。她举例说，2022年9月四川泸定地震发生后，一开始因未见房屋严重垮塌情况，她预估人员伤亡并不严重，但之后政府公布地震造成近百人遇难，信息差异使得她所在的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未能筹集到充足的灾后重建资源。朱一存建议，政府部门主动向社会组织共享需求信息和已经调拨的资源信息，避免民间力量在救援现场出现“不能发、不敢发”的情况。

北京师范大学民生保障研究中心教授谢琼多次参与了官方组织的《慈善法》修订研讨。她表示，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处置具有阶段性，大众关注度高的应急救援多发生在事中阶段，但灾后重建、心理疏导等事后救援往往需要更长时间，参与其中的慈善活动和服务因此具有与日常活动不同的阶段性和长期贯穿性特点，应急慈善专章应尊重应急慈善本身的阶段性特征，建立特别的、全套的、贯穿救援始终的管理和监督制度。

朱一存也表示，考虑到灾区实际的长短期需求变化，项目资金应科学合理使用，这远比及时拨付使用重要。中国慈善联合会救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郝南提出，救灾回应的是人和社区的需求，在经济条件发达的地区，社会力量参与应急响应逐渐转变为志愿者的服务和满足脆弱人群的精细化需求，修订草案所侧重的款物占比越来越低。他还表示，突发事件的应对还包括事前，即日常的防灾减灾工作，这也是社会组织更多发挥作用的领域，应列入应急慈善范围内。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何国科告诉财新，不同部门对于社会力量在应急救援中的定位存在认知差异。此次修法把社会力量定义为辅助力量，因而更侧重款物募集、发放等内容。他建议，在已有条款外，补充应急募捐的豁免条款。他举例说，灾害救援时，一些原本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如大学校友会等也会开展募捐，需考虑在应急状态下，对相应条件予以豁免，以起到支持善举的作用。

金锦萍认为，修订草案增设的应急慈善专章并未完全切中要害，关键应明确慈善组织在突发事件应对中能否以及如何发挥作用，而不仅仅是款物募集、备案等。具体包括：原本非从事应急领域的慈善组织是否能临时被免于原先的组织目的限制，及时加入到应急行动中来；若相关政府部门对慈善组织募集的款物予以征收，慈善组织可否以公共利益为由抗辩；以及在应急管理机制中，慈善组织可否有一席之地。

网络慈善补空白

互联网时代，网络慈善成为慈善领域的主要路径。网络慈善不仅包括法定的互联网平台募捐活动，也包括其他各种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的慈善募捐与慈善服务等行为。根据中国社会保障学会2020年10月底发布的《中国网络慈善发展报告》，2019年有108.76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活动，网络募集的善款超过54亿元，较上年增长68%；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社会各界通过互联网募集善款18.67亿元，参与人次达4954万。

高速发展的网络慈善，带来不小的监管挑战。根据现行《慈善法》规定，民政部可遴选指定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为慈善组织提供募捐信息发布服务，至今已有30余家平台。2020年的执法检查中，有慈善组织反映，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对慈善项目的执行成本、管理费用等要求比法律法规更加严格，限制了募捐渠道；个别互联网平台收取委托费用且比例过高，影响了实际筹款效果。

个人求助如[水滴筹](#)等互联网服务平台兴起，诈捐、骗捐风波不断，被质疑透支社会爱心。有业内观察者直言，民政系统对上述个人求助平台可谓左右为难：“水滴筹”“轻松筹”等为商业机构，按理不归民政系统监督，也不在《慈善法》规制范围内；但一旦出现问题，事关公共民生，民政部门又不得不出面回应、解决——在个人求助工具权责边界不明的情况下，谁来规范、怎么规范已成难题。

在修订草案中，网络慈善并未如执法检查报告建议的那样设置专章。谢琼解释道，不同于应急慈善，网络慈善是慈善行为在线上的呈现，对网络慈善的规制应该融入到各个章节中，如慈善募捐、慈善服务、监督管理等，网络只是呈现场景和技术支持。

修订草案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区分了慈善信息平台 and 互联网募捐服务平台。草案规定，国务院民政部门建立健全统一的慈善信息平台，提供公开募捐方案备案、慈善信息发布等服务。国务院民政部门指定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提供信息展示、捐赠支付、捐赠使用情况查询等服务。

事实上，2020年10月的《修法建议》就表示，《慈善法》设立网络募捐平台的原意是建立信息发布制度，推动信息公开，可是在执行中演变成统一信息平台备案募捐信息和在指定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并接受该平台募捐服务并行，建议进行调整。《修法建议》还表示，网络募捐平台的“指定”，将本该以市场准入方式推进的互联网募捐服务也纳入到政府行政委托服务的框架，不仅导致平台成本由谁支付成了问题，而且直接影响互联网募捐市场能量的释放。

“这些修改是一种进步，但步子迈得过于谨慎。”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公益慈善与非营利法治研究专家马剑银表示，募捐服务是一种市场性公共服务，募捐服务平台可看作为慈善组织提供服务的中介，“指定”程序妨碍了募捐服务的市场建设，应明确“指定”的行政许可性质，按照《行政许可法》来设计募捐服务平台市场，适度竞争、鼓励创新，促进扩大募捐规模。何国科则认为，民政部可以指定网络募捐平台，但应允许互联网企业定期申请。

根据修订草案，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不得向慈善组织收费，不得在公开募捐信息页面插入商业广告和商业活动链接。这一改动引发了关于平台可持续发展机制的讨论。

谢琼认为，目前网络募捐平台发挥作用有限，原因在于支持力度不足。她表示，这类平台的商业广告行为是应该明令禁止的，但能否收取服务费用有待探讨。实践中，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上的服务种类和内容多样，应允许平台在提供基本服务的基础上对慈善项目和慈善组织进行合规遴选，在避免恶意商业利用的同时，鼓励平台发挥自身优势为慈善组织提供优质的个性化服务。自2016年开始运作的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现状显示，只对信息平台提义务与责任，而忽略其权利与运营成本的考虑，会使信息平台方缺乏发展动力与积极性。她建议，应对平台上的服务内容进行评估后，赋权明责、分类规制，区分平台无条件提供、选择性提供以及经营性提供的不同服务，以调动平台的服务积极性，促使平台活力而有序地发展；如果不能合理收取服务费，平台将面临如何覆盖运营成本以及提高服务质量的问题。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志云告诉财新，网络募捐平台的硬性成本包括服务器、数据库等硬件投入，以及软件开发、系统运维和安全评估等方面。不同于互联网公司和商业机构，民间背景的基金会发起网络募捐平台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很少有捐赠人愿意支持类似平台的发展，如果没有直接捐赠的支持，就只能依靠管理费的结余进行投入”。

备受争议的个人求助也写入了修订草案。修订草案在附则中规定，个人为了解决本人或者家庭的困难向社会发布求助信息的，求助人和信息发布人应当对信息真实性负责，不得通过虚构事实等方式骗取救助；网络服务提供者应承担求助信息真实性审查义务；对个人求助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管理规则，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何国科透露，2016年《慈善法》刚通过时，全国人大曾明确个人求助不受该法调整，导致民政部门无法监管，其他部门监管也难以进行，只能靠平台的自律和一次次的舆情监督。因而此次修法一启动，个人求助入法的呼声最高。

个人求助入法的共识形成不易。谢琼坦言，立法工作机构、学界和业界曾召开过多场研讨会论证，并专门撰写建议报告。争议在于，有观点认为，《慈善法》规定的慈善行为针对非特定人群，但个人求助时已知晓受助人信息，属于互助。在谢琼看来，以往大多认为个人求助属于个人权利，法律不应过度介入，但在网络时代，朋友圈的转发与再转发使得个人求助具有了公开募捐的性质；同时，部分个人网络求助平台的不规范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已触及大众对慈善事业的信心与信任。权衡之下，规范已成为网络个人求助发展的必须。“既然要管，就抓关键点、明确平台和信息发布者的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如何对个人求助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查？何国科表示，这在实际操作中或难以实现，求助者的财产、病情等信息，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参与才可能核查清楚，网络服务提供者很难做到实质性审查，具体的规范仍需进一步制定。

个人求助外，何国科认为，公益营销也应纳入法律规制范围。当前不少“网红”打着公益的旗号开展网络直播，社会关注广泛，但是否有实际的捐赠、支出并不明确，同时也缺乏相应的机制和法律责任条款对此进行规范。

监管与促进求平衡

《慈善法》立法之初确立的“大慈善”理念，涵盖扶贫济困、扶助老幼病残、救助自然灾害、促进教科文卫体等事业发展、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和改善环境等多种公益内容。但在实施过程中，民政部门作为慈善事业主管部门，难以承担慈善涉及的税务、教育、卫生、环保、应急管理等多个部门的协调工作。学界曾呼吁设立国家慈善委员会，改变民政部门监管慈善的职权缺陷与职能不足。

《修法建议》提出，基层慈善事业面临有法不依却又无法可依的法律真空局面。《慈善法》一方面规定较为原则化、缺乏实操性，另一方面在立法时宽泛地赋予了民政部门监管慈善事业的权力，使其在部门立法与执法方面享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民政部门为了便于管理，往往制定或执行一系列管制型的政策措施，对其行为，《慈善法》缺乏规制。另外，政府各部门之间在监管方面存在缺乏协力、重复监管、反复监管、加重监管，也是原因之一。

针对上述问题，修订草案提出建立慈善工作协调机制。其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建立慈善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督促和指导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慈善事业扶持发展和规范管理工作。修订草案还规定，工信、公安、财政、税务、审计、网信、银行保险监管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健康、体育、应急管理、生态环境、医疗保障等行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相关行业慈善活动的指导、管理和服

何国科表示，慈善事业的发展并非仅是民政部门的责任，需要各个部门都参与进来，协调机制的建立或有助于破解监督力量不足和监管过度的双重困境。“当监管责任都依赖监管力量有限的民政部门时，后者只能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他认为，协调机制能够调动各部门参与，是落实《慈善法》的重要内容。

在监管措施方面，修订草案新增约谈负责人、工作人员等手段，明确了对其他慈善活动参与者的会同调查机制。在法律责任方面，修订草案重点完善了募捐活动违法的法律责任，增加吊销公开募捐资格证书等处罚方式，提高法律的约束力和威慑力。

多位学者告诉财新，在强化监管和法律责任的同时，修订草案对慈善事业的促进措施仍应加大力度。

财新了解到，个人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曾一度被纳入考虑，但正式提请审议的修订草案未写入相关内容。现行《慈善法》明确了企业捐赠所得税减免，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均在审议中呼吁，应当对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捐献免税额度发出明确信号。郑功成说，以往企业捐赠所得税减免额度是利润的10%，个人所得税的捐赠免税额度是30%，企业与个人之比为1:3。后来《企业所得税法》作了修改，企业免税额度提至12%，且可结转三年，累计达36%，但个税免税额度仍未发生变化。“政策信号变成了更鼓励企业捐款，这显然不符合激励慈善捐赠的普遍规律”。

在修订草案中，事关慈善组织切身利益的税收减免待遇也仅有原则性规定。何国科表示，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和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由财税部门分管，有着复杂的审批流程。他多次在民政系统内部会议上呼吁，打通慈善组织的资格认定，即被认定为慈善组织后就自动享有前述两项资格，“这是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一项关键政策和措施”。

宫蒲光在审议中也表示，现行法规定慈善组织要开展公开募捐和享受税收优惠，必须要获得公开募捐资格、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和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三个资格分别由民政、财政和税务、财政与税务及民政审批认定，程序复杂、手续繁琐、周期长，很多从事慈善活动的社会组织望而却步，有的就放弃了公开募捐和享受优惠政策优惠的权利。

他建议，应将这三个资格进行联审联批，由民政、财政和税务等部门组成一个联审机制，申请公募资格的同时，免税资格和税前扣除资格实行一并申报、一并审批。

多年呼吁未能落地的原因或在于部门认知的差异。何国科表示，财税部门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时，首先考虑财税安全的问题，由于对慈善组织缺乏了解，加之慈善组织本身专业性、规范性不足，在一些研讨会上，曾有财税部门人士担忧，给予相应税收优惠政策后，是否会导致捐赠人和慈善组织通过这些优惠政策逃税。

金锦萍表示，这类偏原则性的促进措施需与税法联动，在各税种单行立法中体现出来，避免《慈善法》的相关规定流于纸面。马剑银担心，大量促进措施如果没有后续操作指引，是否能够真正落地就要打上问号，同时要警惕写入法律中的促进条款成为限制性监管的依据。

深层次问题何解

1月13日下午，年过七旬的《慈善蓝皮书》主编、《修法建议》执笔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团在一场研讨会上直言，社会组织整体发展速度，甚至被慈善组织拖慢了。

2017年至2021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慈善法》实施后，全国社会组织总量继续保持增长，但增长幅度逐年下滑，从2017年的8.4%滑落至2021年0.9%，部分县级民政部门尚未受理过慈善组织登记认定；其中，慈善组织登记认定数量仅占全国社会组织数量的1%。总量偏低外，慈善组织的结构还出现失衡，约七成被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为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占比最低。

“慈善组织登记认定总量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修法建议》认为，由于缺乏配套法规，民政部门登记认定慈善组织的自由裁量权过大，门槛过高，阻碍非营利组织登记的双重管理制度实际上依然存在；民政部门在执法中习惯于管控的传统思维；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未能及时出台。

另一让人忧虑的情况是，《慈善法》实施六年来，慈善捐赠数额并未见大幅提升。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按照民政部统计公报中的捐赠数据计算，2017年至2021年社会捐赠年均增速为9.5%，而2011年至2015年这一数字为8.4%，“扣除特殊时点后，两个数据相差不大”。不仅如此，2021年民政部指定的30家互联网募捐平台仅募款近100亿元，占同年社会组织捐赠收入总额不足10%，而大病平台仅一家的捐赠收入即超过了100亿元。

社会捐赠增幅不大或囿于公募资格的认定。现行《慈善法》规定，依法登记满两年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决定。慈善组织符合内部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的条件，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书；不符合条件的，不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并书面说明理由。《修法建议》认为，慈善组织从非公募转向公募缺乏统一标准，主要取决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实践中，大量慈善组织不能自行开展公开募捐，只能与具有公募资格的组织合作募捐，这也给具备资质的公募组织提供了寻租空间。

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翟雁从事慈善业超过30年，她告诉财新，其所在的基金会注册登记时未遇到困难，但业务范围被要求仅限于扶贫济困等传统内容，难以发挥机构专长从事志愿服务行业发展。除每年接受民政部门的年检、监督，“许多时间用于应付各类检查、沟通和会议”。她担心，原本应该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慈善法》无法对慈善组织起到促进作用，使得慈善事业与《慈善法》成为两层皮。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对财新表示，近三年因疫情产生的民生问题凸显了对公益慈善服务尤其是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需求，但慈善组织和公益捐赠数量增速却有所下降。要解决这一问题，在修订《慈善法》基础上，还应配套修订三大条例，即《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在相应政策法规中明确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在公益慈善中的主体地位，最大化减少限制性条件，加大政府培育扶持和购买服务力度，才有可能建立起良性的公益慈善生态环境。

财新注意到，修订草案对前述慈善组织登记认定、公开募捐资格等关键问题并未涉及。

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的前景仍不明。马剑银表示，虽然近年来民政部门进行了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改革，确立了可以进行直接登记的四类社会组织类型，同时也对直接登记社会组织强化了行业管理部门职责，但由于行业管理部门比业务主管单位更为宽泛，使得改革结果“换汤不换药”。

金锦萍表示，修订草案弥补了上次立法时慈善组织认定的时间差问题，《慈善法》公布后至实施前原本无法被认定为慈善组织的有望获得认定。但修订草案将慈善组织的定义由“非营利组织”改为“非营利法人”，实际上限缩了认定范围，使不具备法人资格的非法人社团或之后有可能被认定为慈善组织的慈善信托等拒之门外，缺乏面向现实和未来的生长空间。

在公开募捐资格方面，修订草案将申请公开募捐的观察期由两年缩短至一年。何国科告诉财新，他多次呼吁直接赋予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但民政部门担心这会带来更大的监管责任。一家具有公募资格基金会的人士告诉财新，《慈善法》规定，公开募捐方案应在民政部门备案，但实际操作中，审批制替代了备案，在“慈善中国”平台上提交募捐方案后，需等待后台审批方能拿到备案号。

“我们希望《慈善法》修订能够解决最重要的方向性问题，即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杨团表示，需厘清法律上的慈善和社会认知的慈善，才能执行好这部法律。

版面编辑：李东昊

最新财新周刊 | 经济触底之后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1月30日第04期

中国经济从防疫政策放开后“J曲线”底部走出的时间快于预期，后续复苏节奏如何？居民和企业能否快速走出“疤痕效应”？如何应对人口总量趋势性下降？



2023年1月19日，南京，春节将至，市民在一家大型超市内购买商品。在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2022年12月经济数据中，表现最超出预期的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图：泱波/中新社

文 | 财新周刊 于海荣

尽管2022年四季度先后经历了大规模严格防控和防疫措施的全面放松，中国经济在年末表现出较强的韧性，超出市场预期。

国家统计局2023年1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初步核算，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21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不仅低于年初确定的5.5%左右的增长目标，也低于2020年—2021年两年平均5.1%的增速。国家统计局用“国民经济顶住压力再上新台阶”来概括全年表现。

“经济运行总体稳定，经济增长快于多数主要经济体。”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1月1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相比较国际主要经济体，中国3%的GDP增速是一个比较快的速度。他称，德国已经公布了2022年经济实际增长1.9%；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美国、日本2022年GDP增长都不超过2%。

相比全年增速，市场更关注的是，中国2022年四季度GDP 2.9%的同比增速，远超市场预期。此前财新对14家国内外机构的调查中，经济学家对2022年四季度GDP同比增速的预测均值为1.8%，预测区间为0.8%—2.9%，即2022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实际增速达到预期上限。不过，当季GDP季调环比增速为0，远低于2017年以来同期1.6%的环比均值，反映出经济仍然受到较大冲击。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表示，2022年四季度经济实际表现和预期差距较大，原因可能在于：一是疫情防控措施优化后，中国经济从“J曲线”底部走出的时间比预期更早；二是季度GDP核算以生产法为基础，加总各行业的增加值得到，相对于需求，2022年四季度生产端受疫情的影响要小些，通过观测需求侧的高频指标可能低估了中国经济的恢复速度。

目前，越来越多的市场人士和政府官员开始认同，中国可能已经快速经历过全面放开后第一波疫情高峰。国务院副总理刘鹤1月17日在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年会上表示，中国防疫政策调整转型总体平稳顺利，经过了一段高的感染，现在大部分社会成员已经恢复了正常状态，达峰的时间和恢复正常的时间是比较快的，“从某种意义上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在2022年12月中旬防疫政策调整后，瑞银、野村、摩根士丹利等外资机构纷纷上调对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快速渡过感染高峰后，2023年1月中旬，中金、国泰君安等原本预期较高的国内机构也开始上调预期至5.4%—5.5%。2023年中国经济实现整体性好转将是大概率事件，关键在于复苏的节奏。

疫情三年居民累积的超额储蓄，将推动居民消费修复到何种高度？能否如刘鹤所期望的“回归常态”？在宏观好转的大背景下，资产负债表受损的微观企业能否快速走出“疤痕效应”？2022年中国人口总量自1962年以来首次下降，如何应对人口红利减弱、老龄化挑战加剧？这些都是中国经济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超预期来自何处

中国国内防疫政策在2022年12月7日迎来全面放松，随后感染人数激增，市场原本预期12月经济数据全面下滑，但最终数据显示，工业生产、消费表现均好于预期，基建投资依然稳健，房地产活动在低基数和各项扶持政策推动下降幅收窄。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表示，2022年四季度和12月增长好于预期主要是由于消费和服务活动在疫情暴发冲击下依然比市场预期更有韧性。

各项增长数据中，表现最超出预期的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8%，降幅收窄4.1个百分点。而此前的财新调查中，经济学家对这一数据的预测均值为降幅扩大1.4个百分点至7.3%，预测区间为-11.0%至-4.3%，也就是说12月消费走势与市场预期相反，不降反升，且高于预测区间上限。

从消费类型看，2022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幅收窄，主要是由商品零售修复带动的，当月商品零售同比下降0.1%，高于11月5.5个百分点；餐饮降幅扩大5.7个百分点至14.1%，显示疫情防控措施调整后，商品消费开始反弹，但感染人数增加对接触性的餐饮消费短期冲击较大。

商品消费中，药品和汽车是主要推动力。全面放开后，短期内各地感染病例激增，12月中西药品消费同比增速跃升至39.8%，高于上月31.5个百分点，汪涛估算称，在整体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增速回升的4.1个百分点中，药品消费贡献了0.5个百分点。

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比超过10%的汽车消费，2022年6月—10月增速一直维持在两位数左右，11月短暂转负后，年末再度转正，同比增长4.6%，高出上月8.8个百分点。中金公司宏观研报称，这主要是由车辆购置税减半政策退出前的抢购所导致。

此外，与疫情宅家囤货相关的，12月粮油食品类消费同比增长10.5%，高于前值6.6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化妆品类、金银珠宝类等升级类消费和纺织服装等出行相关消费同比降幅高达两位数。

不仅是消费，2022年末固定资产投资表现也略超预期。2022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1%，高于2021年0.2个百分点。

据**中信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程强测算，2022年12月当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1%，较前值提高2.3个百分点。其中，基建投资增长10.4%，虽较前值降低3.5个百分点，但仍实现两位数增长，显示在稳经济、稳投资政策的支持下，重大项目持续落地，保持足够韧性；房地产投资当月同比下降12.2%，低基数和“保交楼”系列政策推动降幅收窄7.7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速则较上个月回升1.2个百分点，达到7.4%。

中金公司宏观研报认为，2022年年末制造业投资改善，或受制造业设备更新改造再贷款和高新技术企业设备购置增值税加计扣除政策年底到期影响，企业加速推进投资项目。

与内需回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2年12月中国出口同比降幅继续扩大至9.9%，连续两个月创2020年3月以来新低。其中，对美国和欧洲出口同比降幅分别达到19.5%和17.5%，明显弱于总体出口，对东盟出口则增长7.5%，对出口仍有一定支撑。汪涛认为，鉴于发达经济体需求放缓，未来数月对东盟的出口可能会随之放缓。近期发达国家制造业新订单、新兴市场新出口订单等调查数据并未出现明显反弹的迹象，预计短期内出口仍将同比下跌。

出口和内需此消彼长，导致2022年四季度经济增长动能切换。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四季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正转负，下拉GDP增速1.2个百分点，2020年二季度以来首次为负；2022年前三季度这一贡献率为27.4%，拉动GDP增长1.1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超过100%，拉动GDP增长3.9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第三季度的52.4%下降到6.9%，仅拉动GDP增长0.2个百分点。

在内需回暖的带动下，2022年12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低于上月0.9个百分点，但好于财新调查0.4%的预测均值。钟正生认为，工业生产走弱，一是新冠感染人数增加后，在影响工业生产的同时，也可能让一部分从业人员提前返乡；二是内需恢复处在初期，叠加出口交货值同比继续回落，工业企业订单需求总体不强，企业生产意愿可能主动降低。

这与就业变化相呼应。2022年1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逆季节性回落0.2个百分点至5.5%。康义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农民工返乡、部分劳动者感染后在家里调养休养，对劳动的参与意愿较低，当月劳动参与率下降1.1个百分点。

超额储蓄能否推高消费？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放开后感染人群逐渐“阳康”，近期出行相关高频数据明显反弹。2023年1月前两周，18大城市地铁客运量、百城交通拥堵指数从上年12月中旬的低位大幅反弹。春运返乡客流虽有自驾分流，低于疫情前，但较前两年明显修复。瑞银等多家机构认为，大多数地区放开后第一波感染高峰可能在2022年12月底至2023年1月初出现。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表示，事后来看，2022年11月、12月分别是消费和工业生产的谷底。从地铁客运

量、整车货运流量等高频数据来看，自2023年1月起，工业和消费均在修复过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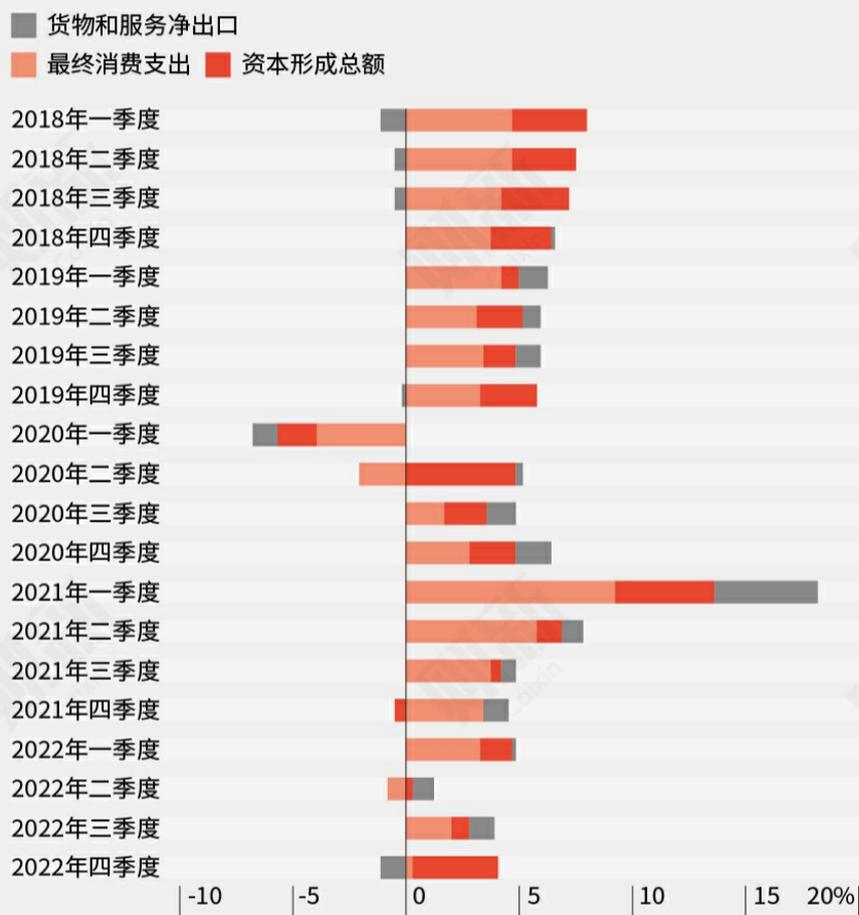
“疫情冲击下生产走弱，但内需指标开始回暖，这是一个颇为积极的信号。”钟正生认为，2022年12月消费特别是商品零售迅速修复，让我们看到了消费作为内循环引擎的提升空间。

瑞银在2023年春节前对1000名消费者的“把脉消费”调查显示，受访者中的84%计划在春节假期探亲访友，60%计划休闲旅游，20%的受访者计划商务出行。由于调查在2022年12月中下旬展开，正值许多大城市新冠感染的高峰期，受访者线下消费意愿仍然低迷，但是线上消费意愿强劲。瑞银称，鉴于自调查以来大多数人可能已经感染并康复，春节期间实际线下活动可能比调查结果更为强劲。

此外，调查中有46%的受访者预计2023年家庭收入有望较上年增加，比例高于预计家庭收入将减少的受访者（13%），平均预期增速为8.2%，高于2022年春节前后的两次调查。得益于收入预期稳健，41%的受访者预计全年消费将较2022年增加，并且出现了从线上消费转向线下的初步迹象。

净出口贡献转负

2018年以来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对当季经济增长的拉动



资料来源：CEIC

居民收入放缓 消费倾向下降

2014年以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累计实际增速及消费倾向变化

■ 人均可支配收入 ■ 人均消费支出 / 消费倾向 (右轴)



消费预期的好转叠加疫情期间积累的超额储蓄，让部分市场人士对2023年消费抱有较高预期。

近期“超额储蓄”成为市场讨论的热点，这与2022年新增居民存款的快速增长直接相关。根据央行数据，2022年全年，住户存款增加17.84万亿元，比2021年多增加7.94万亿元。

财新梳理机构观点发现，不同机构对超额储蓄的定义和计算方式存在差别，规模也相差较大：既有简单以住户存款多增金额来计算的“超额存款”，2022年达到7.94万亿元；也有以居民部门存款余额减去居民部门贷款余额得到的居民净存款来计算，比如招商证券测算称，2022年前十个月，净存款增加了9.3万亿元，接近过去十年居民净存款增加的总和；还有机构将当前居民存款中储蓄水平超出潜在水平（2019年均值）或平均储蓄倾向的部分视为超额储蓄，华泰证券估算2020年—2022年居民部门累计超额储蓄达到3.6万亿元，约为2021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8.2%，中金公司的估算则是三年超过4万亿元，相当于居民最终消费的9%左右。

对2022年近8万亿元的“超额存款”，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认为，其来源大致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真正意义上的超额储蓄，即居民减少消费、预防性储蓄上升，估计规模在1.5万亿元左右；二是居民部门调整资产配置后的“存款回流”，包括房地产风险上升，购房减少，规模在3万亿元左右；以及金融市场波动，导致理财产品赎回而增加的超额存款2.5万亿元左右。

2023年这些超额存款或储蓄能释放多少，又有多少会转化为消费需求，能推动消费回升到何种高度？

“居民超额储蓄的形成，根源在于风险偏好极度收缩。”民生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周君芝认为，2023年居民超额储蓄能否释放，关键在于居民部门风险偏好能否被有效激活，而非取决于简单的消费场景是否有所修复。

疫情以来，由于收入预期下降和避险情绪上升，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持续下行。2020年以来，居民收入增速明显放缓。扣除价格因素，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2.9%，略低于同期GDP增速，远低于疫情前2013年—2019年7.1%的年均增速；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则实际下降0.2%。以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的消费倾向，已经从2019年的70.2%降至2022年的66.5%。

央行调查也显示，疫情以来，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比波动上行，到2022年四季度达到61.8%的历史峰值，远高于2020年一季度疫情暴发时的53%，而疫情前这一占比最高值为47.6%。

全面放开后，消费倾向能否快速提高？国盛证券研报考察了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地区防疫措施放开后的居民行为变化称，虽然储蓄率从高位回落，但仍然明显高于疫情前。2023年随着疫情影响减退，国内经济大概率趋于弱复苏，居民预期和信心有望边际恢复，推动储蓄回落；但考虑到目前居民信心处于历史低位，恢复正常也需要时间，2023年储蓄率平均水平可能仍高于疫情前。

罗志恒也认为，趋势上，2023年总体消费将迎来明显恢复；结构上，服务消费的弹性将高于商品消费。然而，受制于居民收入增速、消费意愿、贫富分化等因素，2023年消费或仍低于潜在趋势水平。

华泰证券则相对乐观。其宏观研报称，从海外经历看，消费需求在重启后两个季度左右开始会升至甚至超越疫情前水平，中国消费回升节奏可能更快，预计2023年清明期间出行人数恢复至疫情前九成左右，全年消费同比有望增长10.1%。

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提醒，鉴于额外增加的居民存款相当部分来自购房的减少，以中国居民的习惯，这部分省下来的存款不大可能会被用来消费，而会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被逐步用来作为购房支出。而且银行存款的上升在居民中间是高度不均等的，一些中高收入家庭的存款确实因为消费渠道受限而上升较快，这部分积压的存款在疫后也确实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费掉，但很有可能被用到境外而非境内，拉动的是海外的经济而非国内的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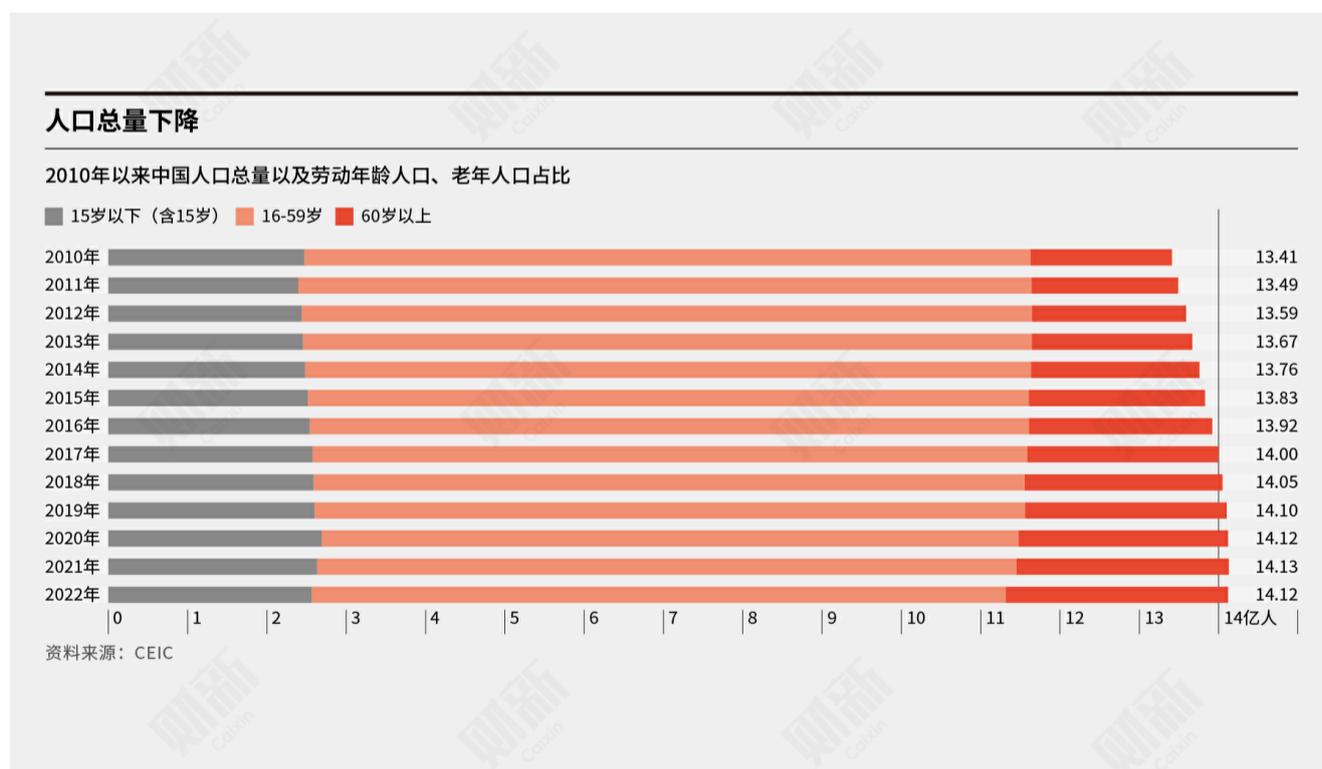
考虑到超额储蓄更多集中在高收入群体，周君芝认为，超额储蓄的释放将沿着消费和投资两条路径展开，激发出的资产配置（例如股票、地产等）弹性或将强于消费，东部沿海城市、高能级城市地产修复弹性或强于其他地区，消费修复节奏顺序或为出行链消费（旅游、航空、酒店等）、高端消费（金银珠宝、白酒等）、大众可选消费（服装等）、地产后周期消费（家具家电、建材等）。

挑战仍然不减

在2022年基数较低的情况下，31个省份设定的2023年GDP增长目标仍然较为稳健。据财新统计，与2022年相比，仅有海南、新疆、重庆、黑龙江四省份上调了2023年增速目标，下调了预期的省份为21个，幅度在0.5个—1个百分点。多家市场机构根据各省份2021年GDP占比加权计算称，2023年各省份GDP加权目标增速为5.6%，低于2022年0.5个百分点。谨慎的背后，是防疫措施全面放开后，中国经济面临的短中长期挑战依然严峻。

根据海关总署的测算，当前中国出口国际市场份额为14.7%，连续14年居全球首位。在2023年全球经济下行、海外经济活动重启带动产业链供应链加速调整的大背景下，中国出口可能遭遇需求和份额下行的双重制约，内需稳增长中的重要性提高。

在提振居民消费之外，企业经营活动能否回归常态也至关重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用“宏观反弹、微观困难”来概括2023年的经济形势。他称，经过三年疫情冲击之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压力已经非常大。疫情期间中小企业的贷款余额逆势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因素作用的结果。大多数企业通过增加负债度过困难时期，资产负债率上升意味着将来经营活动的空间会随之收缩，而且杠杆率高了，现金流压力或风险也会增加。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也认为，与过往经济上升期不同，疫情以来企业资产负债率攀升并非其主动加大负债引起的，更多的是资产较快收缩的被动结果，本质上已形成“资产负债表受损”。随着疫情冲击的消退，微观主体资产负债表的受损进程或将终结，但离实质性扩张还有明显距离，尤其以“保交楼”“还旧债”为主要任务的房企更是如此。

2021年以来，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维持在两位数左右，既缘于2020年的低基数推动，也与出口高增长和设备更新再贷款等政策扶持有关。钟正生认为，2023年制造业投资将面临出口下行和产能利用率较低的双重压制：一方面，2022年高出口依赖度行业贡献了制造业投资增量的一半以上，随着出口放缓压力进一步显现，可能将向相关制造业行业的投资传导；二是2022年四季度制造业产能利用率降至75.8%，比前五年同期低2个百分点，此前两年制

制造业投资的韧性持续超预期，这会逐步形成产能，因此2023年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或将进一步下移。

在此背景下，他建议，2023年需要在诸如绿色低碳、智能制造、自主可控和汽车产业链等重点领域，发挥政策的支撑撬动作用，释放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投资需求。

除了这些中短期挑战，中国经济还面临人口总量趋势性下降这一中长期挑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95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年末人口比2021年末减少85万人，自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人口下降。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萍萍撰文称，2022年中国人口总量略有下降主要是由于出生人口减少：一是因为育龄妇女持续减少，2022年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21年减少400多万人，其中21—35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减少近500万人；二是受生育观念变化、婚育推迟等多方面因素影响，2022年育龄妇女生育水平继续下降。

市场普遍认为，中国人口总量下降已成趋势。这是继2012年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即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下行后，中国人口结构发生的又一次重大变化。人口数量红利持续衰减，可能带来潜在增速下降，迫切需要加快相关改革提高生育意愿、激活人口质量红利来对冲，同时需要为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做好准备。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近年来一直呼吁，要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这需要促进人力资本公共投资的均等化，均衡配置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资源，缩小不同人群在获得受教育机会、受教育质量方面存在的差距。同时，加大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完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重点补上低收入人群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的短板，拓展低收入人群横向和纵向流动的渠道，促进机会均等。

在应对老龄化方面，最大的挑战在于社保制度的可持续性。财政部部长刘昆2022年12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财政社会保障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时表示，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抚养比不断下降，随着参保人平均领取待遇年限的延长，社会保障制度的安全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一些地方社保基金存在“穿底”风险。

他称，从2018年到2021年，全国财政社会保障资金累计支出14.88万亿元，年均增幅7.4%，高于同期全国财政支出增幅3.8个百分点，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4.9%提高到16.6%。其中，中央对地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累计5.89万亿元，年均增幅8.9%，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比重从18.3%提高到20%。同期全国各级财政累计安排养老保险补助支出7.77万亿元，其中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3.07万亿元。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未来除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推动社会保障政策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防范过高承诺、过度保障，社保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一些既定的改革，比如延迟退休、提高领取养老金待遇的最低缴费年限等，都需要加速推进。

版面编辑：肖子何

专栏 | ChatGPT的影响不容小觑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1月30日第04期

ChatGPT可能带来的失业规模和速度将比物理自动化浪潮更大更快，最不容易被替代的或许是需要共情和原创性的工作



面世仅一周，ChatGPT就吸引了100多万用户，它被用来编写计算机程序、作曲、游戏，还被康奈尔大学学生用于律师执业资格考试。图：Lionel Bonaventure/视觉中国

文 | 巴里·艾肯格林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经济学教授

2022年人工智能赢得更广泛的认知。总部位于旧金山的OpenAI 11月发布的ChatGPT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引发极大关注，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面世仅一周，ChatGPT就吸引了100多万用户，它被用来编写计算机程序、作曲、游戏，还被康奈尔大学学生用于律师执业资格考试。学生们发现它可以写出能评为B等的论文，教授们也发现了这一点，但比学生慢了一拍，这让人大为震惊。

ChatGPT远远算不上完美，它所提供的答案是否可靠，取决于它用于训练的来自互联网的信息。它如何使用这些信息则取决于它所受的训练，其中包括监督式学习，换句话说，就是从人类提出并回答的问题中学习。ChatGPT对潜在答案分配的权重来自用户对其回复评分的反馈。数百万用户在每次提出问题时都会被要求为ChatGPT所做的回答作出评价，点击赞成或反对。正如老师的反馈可以帮助B等学生写出A等质量的论文一样，ChatGPT最终也可能获得更好的成绩。

这样的人工智能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哪些任务可以在极少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完成。如果人工智能能够通过律师考，那么有什么理由不让它去写案情诉讼摘要或提供法律建议呢？如果人工智能可以通过行医执照考试，又有什么理由不让它去提供病情诊断或提供医疗建议呢？

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ChatGPT可能带来的失业规模和速度将比物理自动化浪潮更大更快，被淘汰的岗位将不仅限于体力劳动、低技能和低工资岗位。目前，尚不清楚人工智能将无法模拟哪些人类特质（如果有的话）。这些特质是人与生俱来的，还是可以后天习得的？

最不容易被替代的工作或许是那些需要共情和原创性的工作。

共情是理解和分享他人感受和情绪的能力，它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和理解，这正是社会互动和情感健康的基础，在困难状况下和艰难时期，共情的价值尤为凸显。可以想象，人工智能可以在人脸识别技术的帮助下学习识别与它对话者的感受，但显然还不能做到像夫妻那样分担、感受对方的痛苦。

对共情能力是否可以培养和传授，目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一些人认为共情是由大脑中无法人为刺激或控制的镜像神经元触发的。共情是我们可以自然感受到的但并非可习得的东西。因此，我们中的一些人天生比其他人更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也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情绪反应是可以传授的。曾在全球知名的哈佛大学医学院教学医院麻省总医院工作的Helen Riess于2011年创办了一家专门机构，帮助培训临床咨询师。如果这样的培训真能有效，那就会有更多的人可以从事需要共情能力的工作，免受技术自动化的冲击。但是，如果人类可以习得情感共鸣，为什么算法不能呢？

原创性的工作指的是做出以前没被做出过的东西，比如创作一幅全新的画、打造一件艺术作品或者撰写一篇专栏评论。原创性不同于创新性，后者更多地是将已有元素以新颖的方式结合。

OpenAI推出的另一款产品绘画生成器DALL·E，能够依照文本描述（如“一幅苹果画”或“留着胡子的‘蒙娜丽莎’”）去生成复杂的图像。这已被用于设计杂志封面等工作，在艺术家中引起恐慌。但这些作品是基于包含大量文本和图像的大型数据集得出的，算原创作品吗？

从完全原创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作品的角度，那些富有原创性的艺术家或许没什么好害怕的，但是绝大多数人真的能分辨原创的高质量艺术品与AI创作的、在圈内人看来质量不那么高的作品吗？

同样，对原创性是天生俱来的还是可以后天习得的，目前也未有共识。答案很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

我们应该为此而担心吗？在ChatGPT中输入“撰写一篇关于AI的800字评论”，然后自己去体会评判吧。□

版面编辑：肖子何

最新财新周刊 | 写字楼承压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1月30日第04期

需求疲软、空置率上升、租金下滑，而供应端正在放量，多城写字楼租赁市场面临重压，转机要看下半年



2022年9月11日，北京，望京写字楼群。目前中国写字楼市场整体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即便是最优质的一线城市市场，也已呈供过于求的走势。

文 | 财新周刊 牛牧江曲

“在经济回暖的支持下，2021年成为中国办公楼市场有史以来需求增量最为强劲的年份之一。头部企业在其中发挥了引领支撑作用，来自科技、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在全国各个主要城市保持活跃”——市场机构[仲量联行](#)在发布于2022年二季度的报告中如是描述。

然而正是从2022年二季度开始，上述写字楼租赁需求强劲的态势急转直下。截至当年末，全国主要城市写字楼市场多个关键指标全面大幅下滑，且逼近历史低位。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即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是全国甲级写字楼规模前列的城市，其中上海甲级写字楼体量最大，达1510万平方米，北京和深圳的存量也都超过千万平方米。但2022年，四城写字楼空置率均同比增长。

曾经“一房难求”的北京中关村区域，写字楼空置率迅速上升。上一年还“招兵买马”的互联网科技企业，2022年二季度突然转冷，大量企业从市场扩张转向降本增效，缩减或整合租赁面积、退租成为降低经营成本的基本手段。有头部科网企业甚至以万平方米为单位大规模退租。大企业的剧烈收缩，也导致了产业链上大量相关中小微企业跟进收缩甚至关停倒闭。过去一年，北京甲级写字楼净吸纳量同比大降超过九成，创历史新低。

广州写字楼空置率则罕见地冲破两位数，从7.6%几近翻番到14%，且十年来首次全年净吸纳量为负；而深圳的空置率则从19%扩大到22.8%。综合市场观点，一般认为“20%空置率”已是城市写字楼过剩的“红线”。

“2022年是广州实体经济最艰难的一年。”广州一家商业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对财新举例称，过去多年，广州CBD（中央商务区）珠江新城的写字楼出租率通常维持在95%以上，但到2022年末该数据回落至90%左右。

2022年一至四季度，北上广深写字楼租金亦逐季下跌。据财新统计，到2022年末，四城的写字楼租金平均下跌3.6%，其中下跌幅度最大的是广州，其次是北京。

空置率上升、租金下滑、净吸纳量大减，目前已是多城市写字楼租赁市场的共同特征。更糟糕的图景还在省会及二三线城市，南京、武汉、长沙、西安、郑州、沈阳、天津等城市空置率超过30%，青岛等个别城市的写字楼空置率甚至超过40%。

从数据上看，目前中国写字楼市场整体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即便是最优质的一线城市市场，也已呈供过于求的走势。

从概念上看，写字楼的吸纳量，指的是一定周期内的净新增租赁面积，为写字楼的新租及扩租面积与退租及缩租面积之间的净差。写字楼租赁是典型的to B（面向企业）业态，其租户均为大中小型企业，因此吸纳量是衡量写字楼市场需求度的重要指标，反映的是企业活跃程度，可谓经济兴衰的“窗口”。净吸纳量为负，意味着租户退租面积超过新租面积，市场呈收缩态势。

“2022年市场最大的痛点是没有需求。”第一太平戴维斯华北区交易及咨询服务业务负责人、高级董事温书阅

称。

纵观2022年四个季度的走势，写字楼市场走势与疫情波动契合，如上海二季度受疫情冲击，写字楼租赁交易明显下跌，三季度复工复产后市场有一定程度的复苏，但四季度疫情防控挑战加大，租赁交易再次回落。

而市场仍有大量新增供应等待入市，如本已过剩的深圳市场，新增写字楼供应即将抵达历史高峰；北京未来四年的新增供给量将超过常规需求近半；多个二线城市也将进入供应增长期。

前有存量待消化、后有供应新增，写字楼市场渴盼市场回暖、需求反弹。但多家机构均认为，企业租赁市场在2023年上半年回暖的可能性不大，随着稳增长、稳楼市政策渐序出台，经济逐步复苏，写字楼租赁的整体需求有望在下半年看到转机。

市场急转

“2021年底我们做研究预测的时候，机构和业主都觉得形势一片大好，北京写字楼市场终于迎来了整体回暖。2022年一季度市场表现也很好，我们也认为预测对了，但谁也没想到进入二季度突然掉头向下。”一名市场研究机构华北区人士称。

2022年，北京全市甲级写字楼净吸纳量为8.13万平方米，较2021年的101.9万平方米大降92%。其中，二季度和四季度出现了净吸纳量为负值的情况，分别为负1万平方米、负1.2万平方米。

上年基数较高，是北京2022年写字楼净吸纳量同比大幅度收缩的原因之一。2021年上半年，互联网企业大面积扩租，北京写字楼市场曾创造超百万平方米的吸纳量，为近十年来最高。但据财新计算，2012年至2021年的十年间，北京甲级写字楼的年平均净吸纳量约为51万平方米，仍远高于2022年的不足10万平方米。

单季度吸纳量为负，在北京写字楼市场的历史上并不常见。上一次出现单季度净吸纳量为负，还是在2020年一季度新冠疫情暴发之时。财新根据市场机构数据统计，2022年是北京写字楼市场过去17年中净吸纳量最低的一年。

尽管北京2022年写字楼市场的净吸纳量最终维持正值，但贡献基本来自一季度，二季度开始市场吸纳水平断崖式下跌。第一太平戴维斯的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北京写字楼净吸纳量为9.5万平方米，而二、四季度均为负值，三季度仅0.84万平方米。

市场需求走低，导致写字楼空置率持续上升，租金水平亦持续下调。据戴德梁行统计，截至2022年末，北京甲级写字楼空置率为16%，环比和同比分别上升1.4和1.5个百分点。该空置率水平处于历史高位。另据高力国际数据，北京同期净有效租金环比下降1.7%至331.1元/平方米?月。

高力国际中国区办公楼服务部董事总经理严区海认为，北京写字楼市场整体疲软，主要因为前期的疫情防控持续影响市场活跃度，企业预期普遍保守，在办公租赁上维持降本增效策略，扩张意愿不足。

上海、广州、深圳也出现了同样趋势。由于统计覆盖面积差异，各机构统计的写字楼指标存在差异，但从整体数据来看，其余三个一线城市也都出现了净吸纳量减少、空置率上升、租金下降等情况。

广州的变化尤为明显。由于新增供应量相对较少，广州写字楼空置率在四个一线城市中最低，长期保持在10%以下。而2022年，广州全市写字楼空置率冲破两位数，同比大增6.4个百分点至14%。

空置率高升的背后是净吸纳量的大幅减少。2022年，广州写字楼的净吸纳量为负1130平方米，十年来首次录得负值。戴德梁行数据显示，在过去十年里，广州全市甲级写字楼平均每年净吸纳量为32.1万平方米。

上海亦如是。世邦魏理仕的数据显示，2022年，上海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同比上升0.9个百分点至17.5%；平均租金报价则在277元/平方米?天的基础上，下降了2元。上海写字楼净吸纳量也同比大跌58%，至54.5万平方米。

四个一线城市中，深圳的写字楼空置率最高。戴德梁行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深圳甲级写字楼空置率为22.8%，创近五年新高；全年净吸纳量同比大跌67%，至22.2万平方米。

企业扩张退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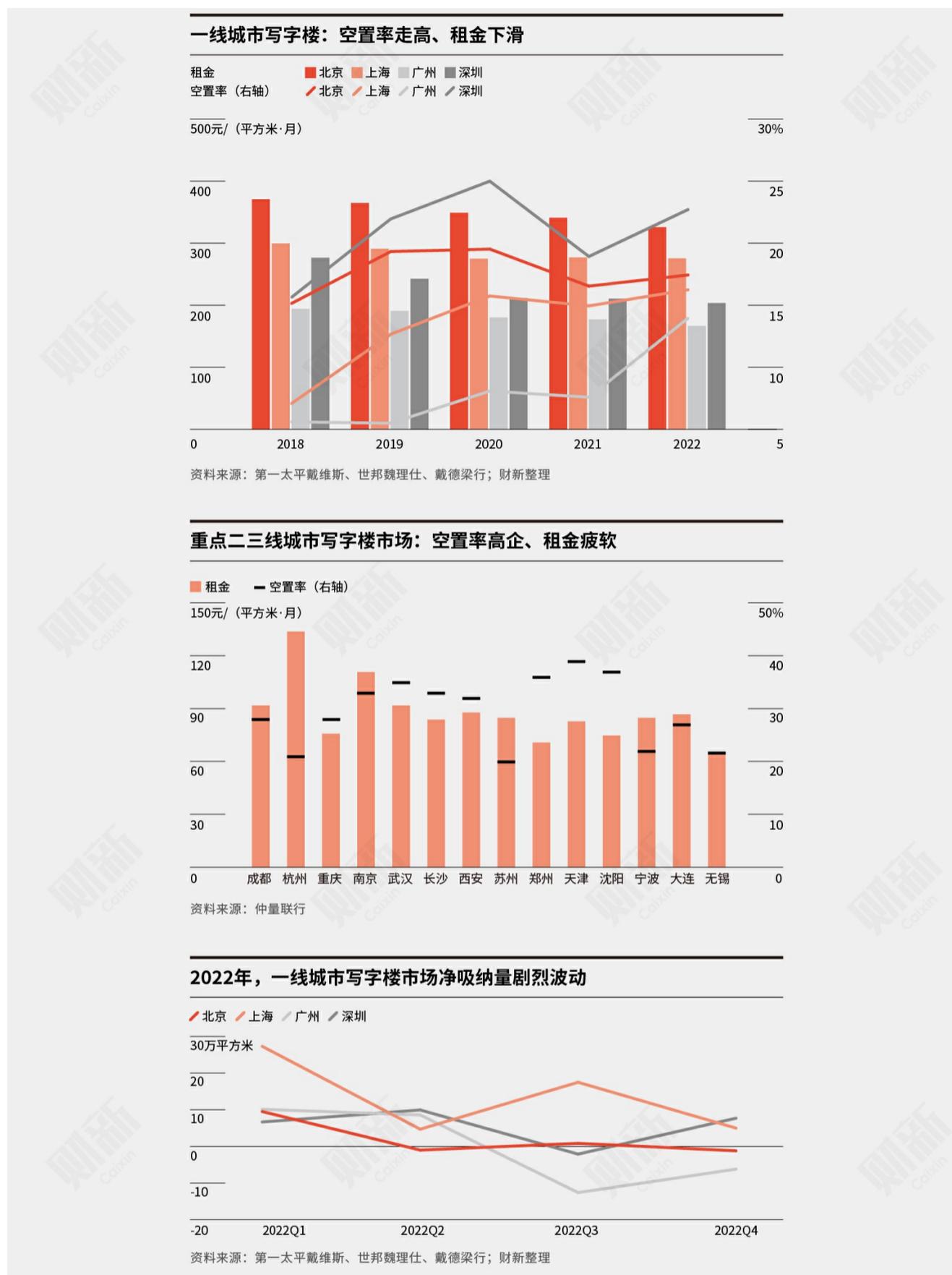
写字楼市场关键指标下行背后，是企业人员和业务减少、租赁需求萎缩。在北京市场，过去占据租赁大头的互联网企业快速腾退，拖累整体市场表现。

金融行业和互联网科技行业一直是北京写字楼市场的主力租户，两大行业集中分布在金融街和国贸CBD，以及中关村和望京酒仙桥区域。其中，金融街和中关村历来是北京写字楼市场租金最高、空置率最低的区域，空置率长期处于5%以下，经常“一房难求”。[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大厂和林林总总的中小型互联网公司、创业公司集中在中关村区域；望京酒仙桥区域亦聚集着[美团](#)、[阿里巴巴](#)等大型互联网公司。

2020年和2021年，新冠疫情刺激线下需求向线上转移，互联网科技行业顺势扩张，在北京大规模扩租，反超金融行业成为北京写字楼市场上绝对的成交主力。在2021年北京写字楼全年租赁成交中，有超过四成来自互联网科技

行业，较2020年增长8.9个百分点，这一成交比例创历史新高。

但2021年下半年以来，教育部门“双减”政策出台，大量在线教育企业迅速缩减业务规模，例如字节跳动彻底砍掉了此前一度快速扩张的教育业务线。此外，包括反垄断、数据审查等监管压力层层加紧，互联网行业整体进入降本增效期，缩减租赁面积、合并整合租赁工区成为降本手段之一。



例如，美团2021年在北京亚奥片区租下了8万平方米写字楼，成为当年三季度市场最大单笔成交；进入2022年，美团陆续在望京酒仙桥片区退租了约3万平方米的写字楼。

“中关村写字楼的空置率冲到两位数，这在过去是非常罕见的。”一名市场研究机构人士称，“几乎所有互联网大厂去年都在退租，而‘腰部’企业也有不少退租。”

根据戴德梁行的统计，截至2022年末，北京五大核心商圈和其他新兴商圈中，望京酒仙桥区域和中关村区域关键指标调整幅度最大，其中，空置率分别同比大增12.3个百分点和9.01个百分点至20.8%、14.6%；每平方米月租金均下降超过20元。

戴德梁行首席政策分析专家、北区研究部主管魏东称，互联网平台企业裁撤部门、减员，“空置率上来了，租金就掉得非常明显。近五年，中关村的空置率一直维持在5%以下，但近几个季度互联网企业边际整合，导致市场

有较大调整”。

除了五大房地产中介机构监测覆盖的甲级写字楼，乙级和丙级写字楼等细分市场的需求更不乐观。通常在市场下行期，区位越好、品质越高的物业韧性越强，租金和需求更抗跌；而乙级和丙级写字楼的需求更多来自中小企业和初创型企业。

“2022年，写字楼市场和企业情况明显变差了。”在北京海淀区及昌平区从事了近十年商业地产租售的经纪人吴伟告诉财新。吴伟主要从事中小企业租赁，带看成交的区域覆盖北清路、上地、回龙观等片区，这些区域聚集着大量互联网科技、教育、贸易等行业企业。

据吴伟观察，过去一年，他所在区域的写字楼租金普遍下降了一到两成；经其服务成交的写字楼租赁单量同比降低约两成，加上市场租金降低和企业租赁面积减少，“我的2022年业绩降了40%。”他说。

为争夺有限的客户需求，业主们还通过各种方式变相降价。吴伟透露，近期写字楼业主普遍会延长免租期。在他带看成交的租赁单里，“有些甚至给了两个月的免租期”，而2022年同类商办物业业主给租户的免租期普遍只有10至20天。

戴德梁行也在报告中称，业主为减轻租赁压力，纷纷采取精装交付、增加免租期和降低租金等条款来吸引租户。

一些小微企业已悄然离场。“很多是做贸易的，疫情期间哪儿都去不了，生意开展不了，撑不下去就不干了。”据吴伟估算，2022年成交客户中，约六成是从较大的办公室搬迁至较小办公室，或从租金较高的地方搬至较低区域；仅约两成是改善型，即换到面积更大或更优质的写字楼。

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美妆品牌公司联合创始人对财新称，公司在4月到6月因疫情封控遭受重创，运营和下游工厂均处于停滞状态，连续三个月的营收同比下降近九成。复工复产后，公司所在写字楼业主同意给租户增加2.5个月的免租期。

上述公司联合创始人称，当时考虑过退租部分面积以降低成本，但由于租赁合同仍在存续期内，退租要额外损失违约金，目前暂未退租，但不排除合约到期后缩小租赁面积或换至成本更低的区域。

与北京类似，深圳甲级写字楼需求收缩的主要行业亦是互联网科技。高力国际指出，2022年深圳写字楼市场需求主要来自受疫情影响较小的保险、证券等金融类企业，而部分前期扩张较快的互联网公司业务收缩、办公空间需求减少，并进一步影响上下游关联企业需求。此外，各写字楼的小型企业退租也颇为常见。

戴德梁行指出，2022年，在深圳甲级写字楼的市场需求中，物流业、制造业和医疗保健业比重提高，而建筑和房地产业、文化娱乐业比重下滑。

广州和上海的写字楼市场在疫情反复影响之下，整体需求也出现萎缩。[戴德梁行广州公司](#)总经理罗进良在接受财新采访时称，2022年一季度，广州甲级写字楼还延续着2021年的活跃态势；二季度，由于上海疫情暴发，很多总部位于上海的广州企业“按下暂停键”，也拖累广州写字楼租赁市场的成交量下滑；三、四季度广州本地疫情不断，自10月起新增感染者数量不断上升，社会流动性降低，致使写字楼需求更加疲软。

供应放量

2022年12月初，新冠防控政策全面放开，经历一波疫情集中冲击之后，整体经济需求必然迎来反弹，那么写字楼租赁市场会否随之回暖、何时回暖？

2022年12月下旬，仲量联行向北京60余名办公楼业主和租赁代理方收集问卷，结果显示，各方对市场快速回暖仍持观望态度。参与调查者普遍认为，疫情政策优化将有助于市场活跃度恢复，但其积极影响不会即刻体现在办公楼市场，需求和租金的修复仍需要时间。

供需格局将决定写字楼市场的基本面与走势，当前市场需求仍十分疲软，而大量新增供应却即将入市。由于疫情影响，多个城市原本计划于2022年入市的写字楼项目延期。这部分新增供应将于2023年进入市场，叠加计划于2023年入市项目，全国写字楼市场将新增大量供应。

高力国际预计，2023年至2024年，上海写字楼市场年均新增供应超过160万平方米，由于大量新增供应入市，租金还将继续承压，写字楼市场直至2024年末才可能温和回升。

深圳的新增供应则将抵达历史高峰。第一太平戴维斯的数据显示，2023年深圳全市将有17个新项目入市，约为市场带来145.3万平方米甲级写字楼供应。北京2023年将新增约74万平方米供应，未来四年共计约有350万平方米的新增供应渐次入市，年平均新增供应在70万平方米至80万平方米；相比之下，过去十年的北京年均净吸纳规模约在50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北京写字楼市场未来四五年的供给都将严重过剩，市场压力巨大。

目前业界对城市写字楼是否过剩，尚无统一的判断标准，但若以深圳历史写字楼空置率水平和城市对商业供应量的感知为基准，“空置率长期超过20%”或可看作是城市写字楼过剩的表现。

上述市场研究机构人士则称，实际上，在一线城市的市场操盘手心理预期中，写字楼空置率超过10%就可以划定为一条“过剩红线”，即通常出租率在90%以上（空置率低于10%），业主方才会比较好过。

住宅用地紧缺，是深圳一直存在的短板，但商业用地却相对过剩，当地“重商业、轻居住”的供地思路饱受社会诟病。2019年下半年，深圳住房市场新一轮涨价潮开启后，主管部门下决心调整土地供应结构，压降商业用地供应量，给宅地腾挪空间。

为此，深圳近年来多次通过“商改居”来平衡土地供应、增加住宅用地。2020年7月，深圳市发文明确未来供地思路，拟通过调整用地结构、提高居住用地比例等方式保障供应，具体措施包括鼓励提高居住用地开发强度、“商改居”等。

一线城市已是全国最优质的写字楼市场，其余二三线城市的写字楼租赁市场去化形势更为严峻。

据仲量联行于1月17日发布的《中国40城办公楼市场指数》报告，多个省会城市写字楼空置率均超过30%。在本轮房地产市场全面下行之前，省会二线城市的楼市持续火热，各地政府土地出让量大。此外，这些省会城市普遍规划了诸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园区等招商引资新区，这些新兴区域往往也规划了大量的商服用地。

随着这轮释放的商服地块逐渐开发入市，可以预见的是，上述二线城市的写字楼供应量进一步加大、市场更加承压。

根据世邦魏理仕的报告，随着北龙湖等新片区大量写字楼即将交付，郑州甲级写字楼市场新增供应已进入增长期；西安和成都的写字楼市场也即将进入集中供应高峰。

再如武汉，截至2022年末，写字楼空置率已达35%，但据克而瑞的报告，预计2023年武汉还有15个优质项目入市、带来高达138万平方米的新增供应。2023年至2025年，武汉写字楼供应将持续维持高位，总供应量超370万平方米。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看，中国写字楼市场出现过两次开发和投资高峰，即2003年—2004年、2010年—2014年，其间写字楼的开发投资额和新开工面积增速均高于住宅。2016年之后，写字楼开发投资额增速低于住宅，但除了2018年、2021年和2022年，其余年份依然保持正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市场研究机构华北区人士称，2022年四季度，部分较成熟企业已在寻求退租，但并未体现在当季统计数据中，预计这些租户的退租还将影响2023年一季度的市场表现。

王婧对此文亦有贡献

版面编辑：肖子何

最新财新周刊 | 多年生稻能否带来农业革命？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1月30日第04期

胡凤益团队创制培育的多年生稻入选《科学》杂志评出的“2022年度十大科学突破”，该技术是如何炼成的？它会像杂交水稻一样成功吗？



2023年1月，景洪田间实验站，胡凤益团队的20余人在播种新材料的同时，要把之前种下的稻苗先拔出来。这些低世代材料有着强壮的地下茎，每过两季就要重新种植，否则地下茎会串在一起。图：王克柔（下同）

文 | 财新周刊 王克柔

春季播种，移栽、插秧、施肥浇水、除草灭虫；夏秋之际收割，机器轰隆隆碾过田里的稻桩，第二年再从过头来过。这是我们所熟悉的水稻种植过程。但这一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生产方式，或将因农业科技的进步而发生改变。

2022年11月7日，云南大学农学院的胡凤益团队在国际顶刊《自然》杂志子刊《自然-可持续性》上发表论文《多年生稻的可持续生产力与生产潜力》，并同步发表了研究简报《多年生稻变革促进可持续农业》，介绍其团队利用非洲野生稻和亚洲栽培稻杂交获得的一种多年生稻PR23。该品种首次种植后可重复收获，次年无需重新播种、育秧、犁田和移栽等，仅需田间管理和收获两个生产环节，可大大节约生产成本、减少劳动力。目前PR23一次种植后可保持4年共8季的稳定产量，且4年总产量与常规稻持平，4年之后其产量才逐渐下降。

仅仅一个月后的12月15日，另一份国际顶刊《科学》发布“2022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中国科学家的多年生稻技术名列其中，成为全球农业领域唯一入选的研究成果。一同入选的还有美国韦布望远镜（JWST）升空探究宇宙奥秘、人类首次进行小行星人为撞击防御实验等。《科学》评价这项研究成果是“基于种间杂交培育多年生粮食作物领域的里程碑事件”。

“东西得到认可，我们当然还是很高兴的。”53岁的胡凤益对财新回忆说，入选《科学》年度突破是“意外之喜”。他们在评选结果发布前已收到《科学》发来的邮件，发布当天他们一直等到凌晨，“就是希望能第一时间看到报道”。

胡凤益团队在这条研究道路上已经持续耕耘了20余年。2004年，胡凤益所在团队因找到了控制长雄野生稻地下茎的显性基因，获得云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2017年，团队申请的“利用长雄野生稻地下茎无性繁殖特性培育多年生稻方法”，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2018年，多年生稻技术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列为当年的“国际农业创新技术”。

在一系列荣誉的背后，只有亲历者知道，这条艰苦的科研路走过了多少曲折坎坷，历经多少次关键的选择，往往还需要一点运气的加持，才能得见曙光。

从一年生回到多年生

人们所熟知的水稻也被称为“亚洲栽培稻”，它是禾本科稻属植物。现有研究表明，亚洲栽培稻起源于普通野生稻，后者分为一年生和多年生两种，其中多年生野生稻主要生长于深水的沼泽、湖泊和沟渠地带，异花授粉，茎呈匍匐状，有高度位分支须根，无曲型地下茎，通常为营养繁殖，野蛮而热烈地生长。

1万多年前，人类开始对野生稻种进行驯化，选育出适于种植且能够填饱肚子的品种，并最终演化为我们今天规模化生产的水稻——没有野生稻盘根错节的地下茎网络，每一株稻苗都规规矩矩地在种植者划好的方寸之地生长至成熟，收割之后来年重新撒种。在水稻的基础上，人类还驯化出具有耐旱性的一种土壤生态型稻谷——旱稻，也

被称作陆稻。



上世纪90年代，陶大云从泰国带回长雄野生稻的原种，这些原始材料到今天仍然茂盛地生长着。



长雄野生稻和栽培稻的低世代后代有着如先祖一样粗壮的地下茎，不加控制的情况下，地下茎会在短时间内向四周延伸。

这一漫长的驯化过程，在成功获得栽培稻的同时，也使其丢失了一些野生稻的优秀性状，关键的一点就是多年生性。从多年生变为一年生的好处显而易见：农民的生产效率提高，水稻的生长周期变得可控，帮助人类实现了“吃饱”的基本需求。但其弊端也不容忽视：不停歇的翻耕，以及种子、农药、化肥等用量加大，使得土壤结构被破坏，养分失衡。尤其进入工业化时期后，全球人口急剧增长，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人类对土地的索取变本加厉，恶性循环由此开始。

早在上世纪初，就有人提出恢复农作物多年生性的设想，以免于重复耕作，达到保护土壤的目的。随后陆续有科学家尝试培育多年生小麦、高粱作物。1976年，美国遗传学家韦斯·杰克逊在堪萨斯州创立了一个名为土地研究所（The Land Institute）的非营利组织。他希望开发一种以多年生作物为基础的农业系统，“既具有草原的生态稳定性，又具备与一年生作物相当的粮食产量”。

1989年，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正式提出发展多年生陆稻的计划。水稻是喜温作物，想让稻苗具备多年生性，意味着它要熬过寒冷的冬天，而栽培稻自身稻桩上的腋芽根本无法忍受冬季的寒冷和干旱环境，其祖先普通野生稻的匍匐茎亦是如此。科学家由此将目光转向其他野生稻。根据目前的研究，稻属包含2个栽培种和22个野生

种，有6个野生种与亚洲栽培稻、非洲栽培稻同属AA基因组，其中一种名为“长雄野生稻”的野生种引起育种学家的注意。它广泛生长于热带非洲，有着长长的柱头，具备自交不亲和、异花授粉和地下茎发达等特性。随后，国际水稻研究所的专家开始将长雄野生稻与栽培陆稻杂交，试图获得具有多年生宿根特性且高产的新陆稻品种，减少陆稻的种植成本，有效防止坡地土壤的冲刷流失。

在中国，同样有一批科学家早早就萌生了发展多年生稻的设想。1977年，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李勤修曾尝试将广西柳州野生稻和栽培稻的后代与长雄野生稻继续杂交，并在当时获得了具有地下茎的子一代，期望在此基础上选育出宿根杂交稻，实现“一次制种无性繁殖用多年”的目标。

1988年，从贵州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硕士毕业的陶大云，进入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工作。他向财新介绍，最初他的研究课题是陆稻，随着研究的推进，他愈发感受到束手束脚，“合适的杂交材料并不多，而且对于栽培稻的起源和基因层面的了解太少，搞起育种来就很不自由”。他也由此将目光转向了野生稻。1991年，胡凤益从西南农业大学农学系毕业后也进入云南省农科院，加入了陶大云所在的课题组。随后，两人开始了近20年的合作。

“走一条新的路”

研究多年生作物有两个基本思路：一是像祖先一样从头驯化野生种，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加快驯化进程；另一个则是使野生种的多年生性在栽培稻中稳定表达，培育出同时具备二者优势的后代。

陶大云和胡凤益选择了第二条路。胡凤益回忆说，那时候做研究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没有可借鉴的成功案例，所有的都是靠我们自己摸索得来的，真的是在走一条很新的路”。

要使野生稻的多年生性在栽培稻中稳定表达，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第一个问题是去哪里找合适的亲本。到目前为止，除了较为常见的普通野生稻，中国尚未发现其他AA基因组的野生稻种。陶大云介绍，他1991年开始陆续从国外引入稻属AA基因组内的几个野生稻种，将其与不同品种的亚洲栽培稻进行杂交，做了大量实验，但进展甚微。由于存在一定程度的生殖隔离，野生稻与栽培稻的杂交后代会出现胚珠败育现象，无法存活。另一方面，这些引进的野生稻在云南的温度条件下生长缓慢，“很多根本都不抽穗，没办法做杂交”。

转机发生在1996年。那一年陶大云前往泰国农业大学进修，泰国的气温较云南更适宜稻的生长，泰国国家种质资源库也有着丰富的稻种资源。陶大云获得了长雄野生稻的稻种，却仅种出一株稻苗，甚至没有地下茎。他回忆，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日本学者，意外看到了该学者种植的一盆长势良好的长雄野生稻，其稻苗原种是由日本国立遗传研究所从非洲收集而来的。这让陶大云燃起希望的火苗，经日本学者的同意，陶大云分出其中一株稻苗进行培养。一段时间后，这株稻苗依靠无性繁殖扩增到10余盆，并抽出了稻穗。他立即着手做起杂交实验，以长雄野生稻为父本，母本则选择了一种泰国栽培稻RD23。陶大云尝试使用胚挽救技术推进子一代的形成，令人惊喜的是，此前胚珠败育的问题由此得到了解决。



胡凤益正拿着2023年早稻记录本在地里查看，这样的工作他已经做了20多年。



胡凤益团队为新一年的实验做准备。今年他们准备了1万多份育种材料，要在春节前全部播种结束。

胚挽救是指对由于营养或生理原因造成的难以播种成苗或在发育早期阶段就败育、退化的胚进行早期分离培养，将胚转移至实验室中使其成苗。这项技术现在已是植物体外培养领域最为成熟的技术之一，在植物育种尤其是果树育种领域应用广泛。但在上世纪末，国内会使用这项技术的人并不多。胡凤益告诉财新，到现在能够利用胚挽救技术培育出幼苗的成功率也仍然是个位数，通过这项技术获得栽培稻和长雄野生稻杂交子一代的成功案例在全球也不过10例，技术的应用、实验者对技术掌握的熟练程度以及胚本身的发育程度，都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这个技术本身不难，但没有这个技术，这一步就跨不过去。”他说。

陶大云的实验成功了，1997年他成功培育出具有地下茎的子一代，并将长雄野生稻的原种和子一代都带回云南。据2006年《西部大开发》杂志的一篇报道，当时陶大云课题组的成果遭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质疑，法国专家认为，“有地下茎的子一代一定不是真正的杂种”。1998年，国际水稻研究所派出专家到昆明，专程查看陶大云和胡凤益团队培养的子一代幼苗，这才真正确认了长雄野生稻与亚洲栽培稻的远缘杂交实验取得成功。

这是陶大云和胡凤益团队取得的首个阶段性成果，但还只是万里征途第一步。从1997年开始，胡凤益承担起了研究长雄野生稻的任务，同期他申请了西南农业大学和国际水稻研究所的联合培养研究生，研究方向是“野生稻有利基因的挖掘利用”。

2000年，胡凤益前往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在那里他学习到彼时最先进的作物分子标记技术。千禧年后，全球育种进入了分子技术育种的全新阶段，农作物选育时间大大缩短。通俗来讲，分子标记技术类似于GPS全球定位技术，能够较为准确地定位到所需基因在生物DNA中的位置，由此可以通向种质资源有利基因发掘、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重要性状分子机制解析和物种进化研究等多个方向。

借助分子标记技术，胡凤益对长雄野生稻的地下茎基因进行了分子定位，初步明确其地下茎生发的遗传规律。胡凤益发现，有两对显性互补基因（*Rhz2*、*Rhz3*）控制着地下茎的有无，此外他还定位到十余个影响地下茎丰度的数量性状位点QTLs，包括控制地下茎数量、长度和分支数等。这些理论研究成果为利用长雄野生稻地下茎无性繁殖特性培育多年生稻提供了理论支撑。

2002年底，胡凤益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长雄野生稻地下茎分子定位和遗传研究》，2004年，该研究成果获得了云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此后数年，胡凤益继续深入长雄野生稻地下茎基因的秘密，寻找与性状表达关系更紧密的位点，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分子标记筛查流程，这个过程持续了十余年。

2009年，张石来考上云南农业大学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研究生，成为胡凤益的学生。那时胡凤益和陶大云已经来到做研究的岔路口，两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陶大云继续着野生稻的基础研究，希望能进一步解决杂种不育的问题；而胡凤益则选择沿着长雄野生稻地下茎基因继续探索，将野生稻的多年生性真正转移至栽培稻，并使其稳定遗传下去。他由此组建起一个新团队。

张石来回忆，新团队建立之初，只有胡凤益、张静和他三个人，他是惟一的学生。2010年下半年，结束了研一

课程的张石来被派到海南南繁育种基地，那里有团队的三亩田，种的都是长雄野生稻与栽培稻的子一代及其自交的不同世代。张石来记得，他们的试验田正对着的就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团队的实验基地。彼时他还只是刚走上科研路的学生，“特别羡慕他们的实验条件，都是当时最好的”。

育种攻关成功

如果说此前陶大云和胡凤益等人在实验室花了近20年打磨好上战场的武器，那接下来的育种工作才是真正走上前线。这是一场漫长的战斗。张石来介绍，当时他们在海南南繁基地做了大量的杂交实验，再从创制的材料中选择出更接近育种目标的。“你要人为创造出变异来，才有选择的可能性，就是变异加选择。”那段时间张石来每天天一亮就去田里，搬一个小木凳坐下，用剪刀剪下母本的花药，再人工授粉，套袋，做上标记，接着重复这些步骤，直到做完三亩田里的材料。到现在，虽然已经有了诸如无人机帮助授粉等更便捷的技术手段，很多科研工作者仍然在用这种纯手工方法做着田间实验。

和水稻田里整齐划一的栽培稻不同，野生稻在普通人眼里就是长势茂盛、难以除净的野草。野生稻和栽培稻的很多杂交后代也是这样，它们有粗壮的地下茎，但地上稻穗结实率非常低，远看去就如同疯长的野草。胡凤益回忆，当时有路过的当地人或其他实验团队曾指着他们的实验材料称：“你们这哪里是在做科学研究，完全是在种草，种出来这点稻谷还不够你们自己吃，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这种观点确实给了他们不小的压力。胡凤益解释，他们研究多年生稻的核心在于其越冬性，因此当年种植的水稻要等越过冬季之后看是否重新萌芽，才能算是一个周期。这一来一回就是两年时间，“它是一个很耗时的工作，别人做水稻也许花10年时间，相应的我们要花20年的时间”。

让长雄野生稻的地下茎基因在杂交后代中得以稳定表达，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但也只是多年生稻遗传改良的初步。于胡凤益而言，他们更长远的目标是育成根（茎）聚集、可稳定越冬、产量和质量都有保证的符合现代农业生产规律的稻种。长雄野生稻本身的地下茎粗壮，纵向延伸和横向延展都很强势，这是它在残酷的自然选择中得以存活的保障，但对农业生产来说则是障碍，过于发达的地下茎会使得水稻越界疯长。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MAS）的应用在这一时期起到了很大帮助，在自交和回交过程中，研究者不断用标记进行跟踪，选出茎节更短密的后代，形成宿根（茎）集聚性状。

科技攻关的过程中，有不少同行的团队因无法取得突破而失败。上世纪90年代末，四川省农科院的李勤修此前期望的目标未能实现，他认为：“由于高产与越冬性不能兼顾，以及后代很难纯合、多年生性评价时间很长等多方面原因，很难培育出高产的宿根稻。”几年后随着李勤修去世，该研究项目也随即终止。

胡凤益后来反思，为什么这些前辈会失败，“其实他们的想法很好，但囿于当时的理论和技术水平，限制了他们发展下去”。他觉得做研究也存在“天时地利人和”，有时候还需要一点运气。

2010年晚稻收获之后，张石来在一堆材料中看中了编号为PR57的实验品。“它有地下茎，同时结实表现也不错。”张石来让帮工把这株材料留下，但工人却误把PR57当作实验废弃物丢到了田边的水沟里。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张石来后来又去田边找到了这株PR57，并带回了实验室。

就是这株PR57的自交后代，后来成为团队第一个通过审定的水稻品种——PR23。“当时我也没想到它能成器，我只是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因为你失败的次数多了之后，也不会太在意哪个一定能成，其实也看不准。”张石来说。

张石来相信，如果当时没有捡回那株PR57，他们育成第一个品种的时间会推迟，但只要坚持下去，仍然会做出来。“我从2009年开始接触那些材料，实际心里还是觉得在我所了解的行当里面，我们做的事是有意义的。虽然当时也看不到一定能做成的希望，但还是会想要坚持下去，或者说没有更好的策略的时候，你就按原计划走。”研究生毕业后，张石来留在了胡凤益团队，继续做多年生稻研究。

2015年开始，胡凤益团队收到的好消息变多起来。那一年，他们第一次从头测序组装了长雄野生稻基因组，对长雄野生稻地下茎遗传网络的了解更进了一步。同年，经过连续12代的自交，团队初步选育出PR23、PR24、PR25和PR107等多个多年生稻品系；2016年，这些品系在云南西双版纳州和玉溪市等地进行适应性种植测试；2017年起，多年生稻在云南省12个市（州）、76个县（市、区）累计种植1.34万公顷，另在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广东、广西、贵州等省份，及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泰国、孟加拉、伊朗、乌干达、科特迪瓦、塞拉利昂等国家进行试种。

2017年，胡凤益成为云南大学农学院的院长，整个团队也转移到云南大学。2018年，PR23通过了云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并正式命名为多年生稻23（PR23），它成为全球第一个通过远缘种间杂交育成功并且可商业化生产的多年生粮食作物品种。

PR23属于粳稻，分蘖和多年生性强，宿根（茎）集聚，生育期适中，有着相当不错的抗病性，且与当地一年生常规水稻品种产量差异不显著，年度间和季节间的产量差异也不显著。此后的品种PR25和PR107也于2020年通过云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2021年，“利用长雄野生稻无性繁殖特性选育多年生稻的方法及应用”这一研究成果获得了云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从田间到餐桌的距离

2023年1月上旬，胡凤益、张石来以及研究团队的20余人聚集在西双版纳景洪田间实验站，紧锣密鼓地安排着新一年的工作。他们准备了1万多份材料，排种、催芽、播种，这些都要在过年前完成。

1月的西双版纳日间温度宜人，播种的那几天天气晴朗，下午甚至有点热。老师、学生和帮工穿着靴子、戴着遮阳帽一早下田。播种前已催好芽的稻种长出了细长的白色尾巴，被均匀播撒在一个个划好的小方格里。再过20天左右，这些种子就会变成一茬茬青色的幼苗，开始生命的轮回。

玉罕是实验站所在地的村民，今年51岁，已经在景洪基地工作了10年，大家都喊她玉姐，她不仅是胡凤益团队的助手，也是整个团队的管家。胡凤益打趣说，学生们每天喊玉姐的名字不下30次。玉姐所在的村子里，种水稻的人并不多。“种水稻根本不赚钱啦，大家要不就出去打工，要不就种种玉米，或者去镇上卖烧烤。”玉姐说。

水稻是当今世界三大粮食作物之一，为全世界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提供口粮。中国约60%的人口以大米为主食，其生产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但在云南景洪，种水稻不赚钱，是农民们的共识。目前留在农村种水稻的多是老年人，对他们来说，插秧、耕种、田间管理和收割都是繁重而难以承担的工作。在云南的梯田地区，机械化农业生产也根本无法实现。当地人喜欢种植一种经济作物——迷你糯玉米，一年能收三季，卖的价格也比水稻要高。

胡凤益是云南玉溪人，生于农家，从小就知道农耕有多辛苦。他将多年生稻技术定义为一种轻简化的稻作生产方式，希望能够以此改善农村地区大龄农民耕作劳累的情况。

胡凤益团队2022年11月发表于《自然-可持续性》的文章表示，根据他们的实验，对比PR23与普通一年生水稻，二者第一年所需的肥料、幼苗和其他成本基本相同，通常为每公顷17000多元。但在接下来的每一年，多年生水稻的管理成本都是原来的一半，每公顷土地还能减少68—77天的劳动时间。在每个再生周期中，种植多年生水稻可以节省58.1%的劳动力和49.2%的投入成本，每亩约减少600元的成本。在实验的四年多时间里，PR23平均每公顷共产出6.8吨稻米，略高于一年生水稻，但在第五年产量明显减少。“我们现在能做到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拖后腿，同时又能维持多年生性，减少劳动成本，还能改善土壤状况。”胡凤益说。

胡凤益团队的研究发表后，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研究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生态人类学家Clemens Grünbühel评价多年生稻是“一个潜在的游戏改变者”（a potential game changer），这也是胡凤益所期待达成的目标。他介绍，在上世纪50年代，矮秆基因掀起第一次“绿色革命”，而后袁隆平发现的雄性不育天然株又将全世界带入了杂交水稻的新时代，“这些基因都不是与质量或产量直接相关，雄性不育甚至对植物本身来说是缺陷，但它们都从底层真正改变了水稻生产的模式”。他希望多年生稻也能引发一场新的农业革命。

2022年，PR23被列入中国农业农村部向农民推荐的29个品种名单。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会立即买账，多年生稻要从试验田走向市场和消费者的碗里，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相比一年生水稻作物，多年生稻可越冬，但也意味着它对土地的“专属使用权”，无法像其他地区在种水稻的同年种植其他经济价值更高的农作物，实现一年多季轮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多年生稻的推广带来阻碍。

另一方面，减少翻耕对土壤是一种保护，但对水稻却增加了感染病虫害的风险。土壤生态系统越完备，越有可能吸引鸟类、老鼠和昆虫，也会有更多杂草滋生，而这也意味着除草剂的用量可能随之增加。此外，水稻始终是热带作物，即使具备越冬性，目前也难以在冬季温度跌至零下的北方存活。

这些问题还需要研究团队一个个去攻克。胡凤益团队已陆续开始多项实验，包括研究不同海拔高度对多年生稻的影响，多年生稻在不同地区的适应性，多年生稻对毒害元素（铝和镉等）和营养元素（磷、锌和铁等）的解毒或转运代谢机制，以及多年生杂交稻。“我们希望在保证多年生性这个前提之下，去研究更加高产和优质的杂交稻品种。”其团队成员张毅说。



云南大学曼拉试验站，胡凤益团队的试验田。

2021年，胡凤益团队与[华大集团](#)合作，成立了[深圳华大云谷科技有限公司](#)，其主推品种是团队研发的云大26号水稻，该品种目前正在审定中。借助华大基因的力量，胡凤益团队所培育的PR107于2022年通过了乌干达的登记认定，这意味着PR107可以在乌干达进行商业化应用。

据华大基因多年生稻项目负责人张强介绍，他们在云南大学曼拉实验站所在的曼拉村流转了1000多亩土地，用于种植“云大26”。谈到该品种的商业推广，张强表示并不那么容易，老百姓往往更倾向于种植市场认可度更高、更有保障的传统杂交稻。他们目前设想在曼拉村建成一个大型多年生稻产业中心，“既是示范基地，也是繁种和生产基地”。

2019年初，胡凤益团队在曼拉村建立了另一个实验基地，与景洪实验站海拔高度差达到600多米，车程50多公里。如果说景洪实验站是团队的育种基地，曼拉实验站更偏向于大型技术实践基地，胡凤益团队的师生在这里进行配套田间管理技术的实验。曼拉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村落，也是当地有名的旅游景点，村里住着500多户傣族居民。村里的一名会计经营着一家土特产店，门前挂着多年生稻糯米专卖店的招牌。据他介绍，“云大26”在店里卖得很好，许多来村子参观游玩的人都会买回去尝一尝。□

最新财新周刊 | 理财净值化步入深水区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1月30日第04期

迈入以净值化管理为主要特征的2.0时代，银行理财产品体系应如何更精准地与投资者需求相匹配？理财子公司应如何优化资产配置？



2022年是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元年，也是银行理财首次直面市场波动考验的一年，其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文 | 财新周刊 王石玉 范浅蝉 王力为

刚刚过去的2022年，是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元年，30家理财子公司积极抢占市场份额，超过95%的理财产品实现净值化。

这一年，也是净值化后的银行理财首次直面市场波动考验的一年，面对股市与**债市**波动，其表现似乎并不尽如人意。

银行理财市场面临的第一次大考，是2022年3月股票市场大跌，彼时银行理财产品破净（指理财累计单位净值跌至1元以下）率超过8%，不过由于理财产品以固收类为主，偏重债券，而权益资产配置较低，因此冲击波很快退去。

到了2022年11月，考验更为严峻：理财产品重仓的债券市场“跳水”，并引发“债市调整→理财净值下跌→遭遇赎回→被动抛售→市场继续调整→理财净值继续下跌→继续抛售”的负反馈，高峰时理财产品破净率超过20%。

如今，理财“赎回潮”暂时平息，但所暴露的银行理财净值化管理中的诸多问题值得关注。

在这两次市场波动中，理财产品投资者接受了最直观的市场教育。一位投资者无奈地表示，积蓄在理财里放了半年，“只赚了四杯奶茶”。但多位业内人士认为，也不能一味地让投资者“受教育”、承担风险，理财产品的再定位、理财机构自身的革新也至关重要。2023年，如何从“规模冲量”转向理财子公司产品和管理能力的提升，引起业内人士的深度思考。

“我们作为理财行业的机构主体，在能力建设上的‘自我革命’也是十分现实的课题。”在2022年12月底的“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年会”上，[交银理财](#)董事长张宏良坦言，尽管理财产品在量的增长上突飞猛进，但质的改善却难有公认的突破，全行业在相当程度上共同演绎着“同质化特征下的规模扩张”。

根据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数据，2022年上半年理财产品规模稳定增长，截至6月底理财产品存续3.56万只、存续余额29.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8%。

但在最后两个月的“赎回潮”下，理财产品规模有所收缩。据中信证券明明债券研究团队测算，2022年11月、12月理财市场存续规模分别环比下降4.57%和7.53%，两个月合计下降3.7万亿元；进入2023年，理财存续规模环比降幅收窄，截至1月10日，存续规模为27.31万亿元，较2022年12月底下降1.44%。

最近几周，为了应对净值波动下的“赎回潮”，中长期、可用摊余成本法的封闭型产品成为多家理财子公司的“新宠”。

重返摊余成本法会成为2023年银行理财产品的主流方向吗？迈入以净值化管理为主要特征的2.0时代，银行理财产品体系应该如何更精准地与投资者需求相匹配？理财子公司应如何优化资产配置？在参与者众多、竞争激烈的资产管理行业，银行理财如何找准差异化的定位和优势？这些都是需要全行业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封闭式产品回潮

最近一轮“理财赎回潮”，缘于2022年三季度以来市场流动性边际收紧、“稳经济”政策频出等因素所带来的“债熊”。据[华泰](#)研究统计，在2022年12月下旬理财净值回撤高峰时，银行理财破净率曾一度达到26%。直到2023年1月中旬，此轮回撤风波才渐渐平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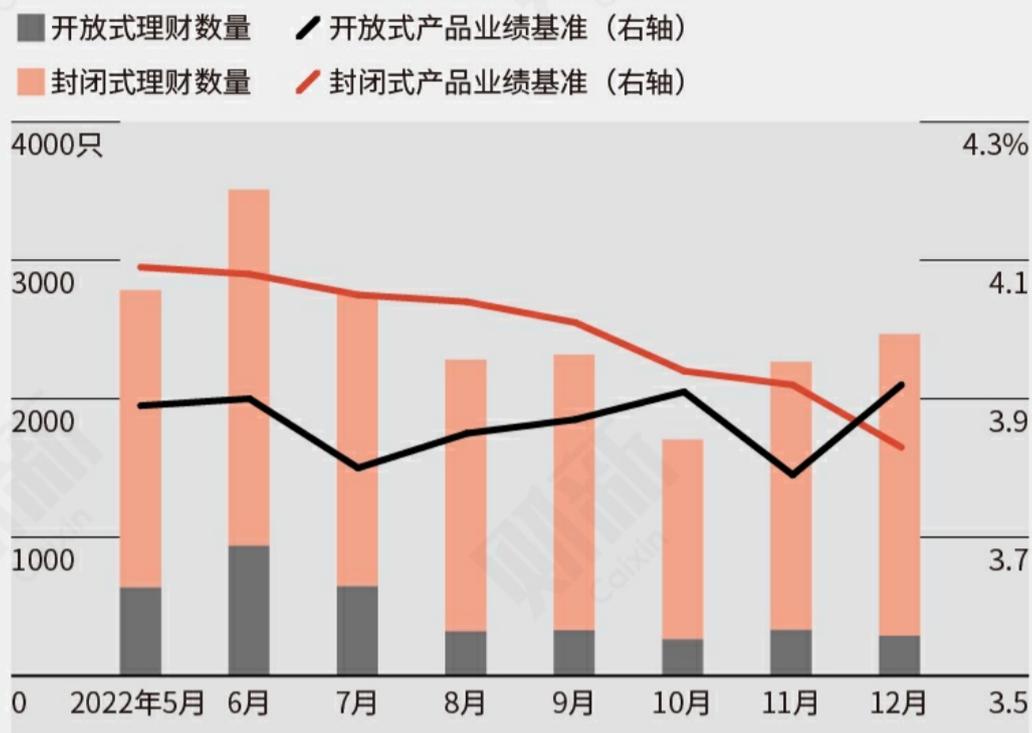
这样的成绩单“吓”得不少风险偏好低的投资者抓紧赎回。“虽然现在赎回相当于是认亏了，但还是赶紧预约了。”一位购买了R2级别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无奈地表示，“现在财是越理越少，实在不行还是存定期吧。”

“投资者对银行理财产品的信心受到了很大损伤。”[华夏理财](#)总裁苑志宏坦言，“我们观察到，近期虽然债市稳定甚至有一定幅度的反弹，但银行理财的净赎回还没有结束，背后就是原来银行理财这种本金安全、收益稳定的市场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被颠覆。”

为应对短时间内的流动性压力、稳定投资者信心，多家理财机构选择从产品端入手，迅速调整了推新策略，重点宣传中长期限、“平抑波动”的封闭型产品和“活钱理财”等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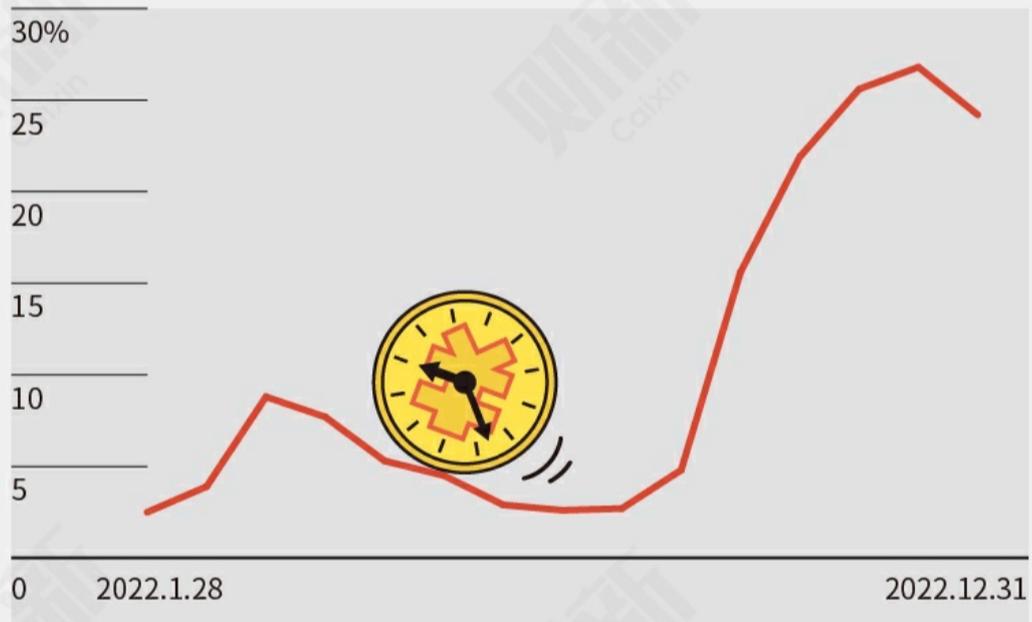
据[普益标准](#)统计，2022年12月全市场共新发封闭式理财产品2180只，比11月增加242只，较债市波动前的10月增加了近740只。从产品期限来看，12月新发理财产品中，6—12个月期限产品最多，占比约46%，1—3年期限产品次之，占比近30%。

近八个月理财产品新发数量与业绩基准变化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

理财产品破净比例暂时触顶企稳



资料来源：华泰研究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认为，理财机构在短期内转为新发封闭式产品，或有便于采取摊余成本法估值的考量。“原来由于滚动存续方便，也有利于形成品牌效应等原因，理财公司更青睐于发行定开式产品，但是目前定开式产品已无法使用摊余成本法估值，净值波动较大。因此，部分原定新发的定开式产品可能转变为封闭式产品，以便应用摊余成本法估值。”

在净值化转型之后，大部分理财产品使用市值计量法进行估值，所得净值直接与中债或交易所等第三方市场价格数据挂钩，直接反映市场波动。而摊余成本法则将估值对象的买入成本按照票面利率或商定利率、买入时的溢价与折价等因素折算，平均摊销并每日计提收益，相当于将其到期收益率平摊至期限内的每一日，从而达到“平抑波动”的效果。

苑志宏指出，在资管新规的三年过渡期内，支撑着银行理财规模维持稳定增长的基础之一，也是摊余成本法的广泛应用。

此时再度将摊余成本法作为支撑理财市场规模的“速效药”，主要因为“赎回潮”余波未歇，2023年一季度还将集中迎来一批“破净”理财产品的到期与开放日。据[华安证券](#)固收团队统计，2023年1月“破净”理财产品的到期规模占当月到期理财产品的5%。

“估值方法变动，体现了金融机构顺应市场形势、对封闭式产品投资策略的一种阶段性调整。”交银理财相关部门负责人解释道，封闭式产品的形态部分规避了流动性风险，不存在强制性的存续期内变现要求，其间的资产交易可以更多地体现投资策略。“在目前的市场形势下，运用与产品期限匹配的资产，部分规避投资期内利率风险、市场风险的影响，可能是更有利于现阶段市场的一种投资方式。”

一家股份制银行理财子公司有关负责人也对财新表示，摊余成本法有利于降低产品净值波动，增强客户投资体验，更受银行理财客户青睐。

明明分析，前期理财投资者信心受损严重，不理性赎回加剧，对净值低波动的理财产品需求增加；各大型理财子公司也希望通过发行摊余成本法产品来吸引投资者，缓解规模下滑的趋势，“摊余成本法理财产品短期内确实可能成为市场风口”。

不过从长期来看，多位市场人士认为，用摊余成本法还是治标不治本，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即使采用摊余成本法估值，也只是从会计层面进行了处理，等到债券真正亏损的时候，该损失的还是会损失的。”[瑞银A股](#)非银金融行业分析师曹海峰对财新分析道。

明明也认为，净值化仍是大势所趋，监管方面也不太可能对市值法“松口”。他认为，采用摊余成本法估值的产品由于期限长、流动性受限、理财投资者接受程度不足等因素，预计不会成为市场主流，“更多是净值化转型阵痛下的临时安慰剂”。

一位国有大行理财子公司人士解释道，选择发行摊余成本法估值或市值法估值产品，其实体现了投研部门对于市场走势的阶段性判断。“市场表现不好时，用摊余成本法估值确实显得这个产品收益稳健，但如果市场上涨，这类产品的收益率就打不过其他市值法产品了，收益率没有那么有竞争力。”他认为，从理财子公司层面来说，还是需要“全链条”布局产品。

理财产品体系亟待细化

与欧美财富管理市场相比，中国的银行理财市场下沉更加明显，低净值的“零钱”投资者参与度更高；且由于资管新规落地之前多年的“刚兑”传统，不少理财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显著偏低。

“理财的投资者范围很广、市场潜力巨大，但挑战在于，这部分投资者对于净值化产品的风险认知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一家合资理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对财新表示。

目前银行理财市场的绝对主流就是个人投资者。据《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2年上）》（下称《报告》）披露，从风险级别来看，R1（低风险）与R2（中低风险）级别的产品仍然是银行理财产品投资者最为青睐的产品，是超过九成投资者的选择；从期限来看，投资者更偏爱“T+0”产品，即随时可以赎回的开放式产品，投资者占比超过56%，近87%的投资者更愿意选择1年期限以内的理财产品。

尽管“保本保收益”的口号已经彻底淡出了银行理财产品的说明书和营销话术，但对大部分普通客户来说，多年来一直将银行理财产品作为“存款替代”的投资观念，一时间难以打破。

迎合投资者的需求，固定收益类产品成为银行理财的绝对主力。根据《报告》的数据，至2022年6月底，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存续余额27.35万亿元，同比增长20.22%，在全部理财产品存续余额中的占比从2019年末的78%上升至93.83%。固收类理财主要配置债券（59%）、现金及银行存款（17.89%）、同业存单（7.61%）。

一位资深债券投研人士表示：“这几年债券牛市，吸引了大批存款资金，但其实很多投资者对于‘固定收益’的含义，还是停留在‘保收益’的误解上。”

“理财产品本身的净值化转型已经完成，但是大众理财投资者心态上真正接受净值化还在路上。”[光大理财](#)总经理[潘东](#)对财新表示。

此次债券市场波动带来的净值调整，确实给不少投资者“上了一课”。不过，多数理财子公司人士表示，理财机构也要从自己身上寻求突破。潘东就强调，做好投资者陪伴、有温度的投教是理财机构的责任，“不能简单粗暴地让客户自担风险”。

除了加强沟通和投教，理财产品体系的优化也被不少业内人士置于“待办清单”榜首。[民生理财](#)总裁张昌林直言：“我们现在不得不重新审视，理财产品的管理者对于净值化转型的理解，和广大投资者、理财客户的理解，究竟是不是一致？我们对于理财产品的定位以及产品体系，是不是理财投资者所需要的？”

当前的理财产品体系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客户与产品的分级不够细致、匹配不够精准。例如，张宏良指出，“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不够清晰”，现金外的绝大多数产品均定位于二级（稳健型），产品说明书较少体现产品风险差异度，也使得同属二级（稳健型）的同类产品形态净值表现（净值增长、净值稳定）差异甚大。

与此同时，银行理财产品本身具有更加“保守”的属性，因此风险评级的标准与公募基金等具有财富管理属性的产品之间并不互通。“比如宽基指数这类产品，公募基金一般定义为R3，如果是理财子公司，就会是R4。”前述合资理财公司CEO对财新解释道。

张宏良也指出，银行理财产品在资产负债匹配管理方面，没有真正做到根据不同客户对于风险收益的要求，灵活采用权益阶梯仓位策略、CPPI避险策略或TIPP避险策略，对底层资产的变现天数和变现损失比例等流动性风险逐项计量并分层管理，进而结合客户风险偏好、负债资金特点，实现资产负债的有效匹配。

此外，理财产品体系还存在期限结构失衡的特征。目前，中国理财市场的投资者格外注重短期流动性，因此理财产品基本以开放式、中短期产品为主；然而大部分理财客户又同时具有风险厌恶的特点，这又导致固收类理财的资产配置以更长期限的债券为主；最终的结果是，客户对于流动性的需求与理财产品底层资产之间不得不期限错配。

前述股份行理财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若投资者能长期持有理财产品，在资产负债匹配度管理上，理财子公司将拥有更充裕的空间进行增厚收益的操作。

对于客户短期、高流动性的投资需求，则可以通过现金管理类产品满足。[工银理财](#)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现金管理类产品在严格监管的背景下逐步回归“现金”本源，是低风险偏好、高流动性偏好投资者较为合理的投资选择之一。

潘东认为，未来理财产品的期限结构应当呈“哑铃状”。行业目前大量发行的日开或短期持有期产品未来应当成为“哑铃”中间的细杆，长短端产品则是两端，分别满足短期限较低收益和长期限较高收益两种需求。“在短端，要着重通过适当比例的现金管理类产品和低波动产品满足投资者‘绝对风险厌恶’，中国市场的投资者其实很需要这类产品，也不需要多高的收益率；在长端，理财产品要帮助客户穿越周期。”

此外，潘东还设想，可以通过产品设计帮助投资者规避市场波动下的“恐慌操作”。“如果客户自己没有办法有效择时，可以避免向他们发售随时择时的产品。”她解释，“比如，将来针对容易恐慌性赎回的投资者，销售端主要提供现金管理类或者一定封闭期的产品，以及定期定投的模式。”

曹海峰也认为，当前中国的财富管理是以产品为中心，“海外投行的财富管理业务，资产配置权基本不会交到散户手里，一定是在投顾手上，从而让（客户）获得长期收益”。

但是对国内尚在起步阶段的理财子公司来说，如何配置自己手中的客户资金，并且同时保证流动性与收益，正是当前面临的考验。

提升资产配置能力

“理财产品的广大投资者对低风险、中短期产品的青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理财产品的投资配置和风险偏好。”张宏良称。

从理财产品的结构来看，2022年6月末，开放式产品仍是绝对主流，占理财产品募集总金额的95%以上；资产配置以固收类为主，投向债券类资产的余额占总投资资产的67.84%，其中信用债占48.07%，利率债占5.19%。

在张昌林看来，“之所以给短期产品配置久期较长的债券、用高风险敞口博收益，还是因为目前理财客户对短期理财产品的风险定位和预期收益有较大的偏差，理财机构在市场博弈中不得不作出相应选择”。

前述股份行理财子公司有关负责人也分析称，为匹配理财客户诉求，理财机构普遍以“绝对收益”作为主策略进行投资运作，其资产配置集中在债券，且交易方向高度一致，而国内债券市场在面临群体性产品赎回时，尚缺乏足够的流动性，亦缺少有效的对冲工具用于稳定产品净值。

[兴银理财](#)总裁汪圣明认为，在国内金融市场，绝对收益在资产构建上的选项不多，“理财机构不得不选择有一定票息价值的固收资产，特别是在标准化的信用债市场上”。

一位理财子公司风控部门负责人表示：“以前可能还会做一些非标（资产），可以借此提高理财产品的收益，像过去房地产项目的年化收益率可能会达到8%、9%，现在肯定没有那么高了。其实，整个市场也是缺资产。”

如何通过合理配置和交易来控制风险，成为理财子公司在债市交易中的一个弱项。一位公募基金债券投资人士此前对财新表示，理财子公司脱身于银行系统，投资思路仍然偏向配置型思维，“债券就是买入并持有，只会买不会卖”。

张宏良也表示，为了追求收益达到偏高的业绩基准，固定收益类产品的投资杠杆、久期安排往往呈现“死多头”的特征，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的考量被严重弱化。

汪圣明进一步指出，未来不能仅从客户的收益预期角度出发去构建资产，“更应该自上而下从宏观风险因子来做资产配置的方案，这样就会有更宽阔的空间和视野来处理类似产品流动性这样的微观问题”。

同时，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风险管理也至关重要。某城商行理财子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财新表示，在市场风险管理方面，要重点强化产品净值波动监测和风险水平的计量评估。从资产端看，做好对于资产组合或单个资产的风险指标设计、监测和风险计量，评估风险因子波动带来的资产价值波动；从产品端视角，重点计量监测产品净值波动、大幅回撤和极端损失等，评估产品风险收益水平，形成对前端产品设计、投资组合管理的有效支持。

相比固收类投资，理财子公司的权益投资能力更显捉襟见肘。“和传统公募基金相比，理财子公司的权益类投资和个股筛选确实有短板。一般银行理财选择权益投资的行业时，会用ETF作为工具，也会用一些特征比较鲜明的公募基金来做筛选。”潘东坦言。

前述合资理财公司CEO也表示，理财子公司的权益资产投资还是以公募基金委外的形式为主，自己投资权益在机制、薪酬、人才等方面都有掣肘。

与理财子公司脱胎于银行、承接了母行大量非标资产不同，合资理财公司没有存续产品转型的压力，也没有偏好债权类资产的路径依赖。

“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轻装上阵。”[汇华理财](#)董事长刘慧军介绍，现有产品中并没有非标债权投资，全部采用市值法估值，产品全为净值化产品。

截至目前，已有五家合资理财公司获批，其中已发行产品的有四家，并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化发展之势。2021年5月开业的国内第二家合资理财公司[贝莱德建信理财](#)，已发行产品包括了早先发行的两只混合权益类产品，一只养老金产品，以及2022年7月发行的两只固收类产品。

2022年8月成立的[高盛工银理财](#)则聚焦于量化权益投资策略、跨境投资策略、创新另类策略，11月发行了其首只产品，主打量化权益策略。

最早成立的汇华理财，还发行了两只R4风险级别的混合类产品，未给出业绩比较基准，以权益资产配置为主、债券资产为辅。刘慧军在2021年11月接受财新采访时表示，仅有混合类的业绩是公开每日更新的，“我们通过发行这个产品，希望向市场表示汇华是有主动管理能力的，包括在权益类产品上”。

合资理财公司对权益配置的看重，与外资看重的在中国市场投资权益获得超额回报的潜力有关。根据贝莱德统计的主动管理型基金在各国跑赢股指概率的数据，在中国，一年内跑赢沪深300指数的概率约为17%，但三年、五年的概率达98%，十年高达99.6%；而在美、欧、日等成熟市场通常难以跑赢。

“中国市场可以说是量化投资的天堂。”2023年1月6日，贝莱德建信理财总经理范华在一场演讲中称，这缘于中国市场交易活跃、流动性好、投资标的多。“量化投资的结果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是投资团队、投资理念、投资流程，这些都与数据科技以及投研人员不断的迭代能力有关系。”

不过，目前理财客户对合资机构及产品的接受度尚不高。高盛工银理财的第一个产品在[工行](#)私人银行渠道发行，启动发行时间恰逢2022年10月底A股跌至本轮低点，但募集规模仅1.5亿元。从投资的角度看，这一时点接近于抄底。

高盛工银理财首席执行官王旭阳坦诚地说：“我们更着眼于长期的市场机遇和表现，也保持着跟很多客户的沟通。很多人在初始发行阶段没有买，尚在观望，但是他们一直在关注我们的净值，通过理财顾问在跟踪这一产品的运作情况。”

理财要成为公募基金吗？

“从短期来看，银行理财的‘蛋糕’变小了。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者回流到存款，近期银行的储蓄存款增长得非常好；风险偏好较高的这些投资者就转向公募基金了。”苑志宏坦言，原先的银行理财投资者正在逐步分化，根据自身风险收益偏好重新“用钱投票”。

资管新规实施之后，曾经“泾渭分明”的理财市场与公募基金市场有了合流之势。公募基金市场化较早、规则制度完善，是中国资管市场中较为成熟的参与者。这是否意味着，公募基金产品将成为“后净值化时代”银行理财的“路标”？

在监管标准方面，大部分业内人士期望看到当前这两大资管产品在监管层面上的“断层”能有所弥合。“现在银行理财、公募基金、信托、券商都在做资产管理，它们的资管业务是不是应该有统一的标准？这也是亟待监管方面考虑的。”现为一家大型外资金融机构中国负责人的一位前监管人士说。

202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资管新规，意在逐步拉齐各类资管主体的监管标准。但由于当前银行理财和公募基金分别归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监管，除了“净值化”的底线实现统一，监管层面仍有诸多细则尚未打通。

潘东认为，从利益分配、信息披露与评价等方面，目前中国资管行业各类机构间的监管规则尚未完全拉平，这

对投资者做跨产品类型的比较构成了一定障碍。

在税收政策方面，当前公募基金享有一定特殊税率待遇，理财等其他资管产品则暂时没有。

“很多机构客户买理财子公司的类货基产品，会要求我们的投资收益比公募基金投资收益高好几十个基点，就是因为买理财子公司的产品无法免税。”一位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人士也表示。

此外，[平安证券](#)研报指出，征税标准可能影响机构的投资风格。公募基金的债券转让价差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会导致公募基金投资风格更偏交易，这也正是公募基金成为债市最活跃投资者的重要原因。

另外，相较于公募基金，获客渠道的竞争也是理财子公司面临的一大挑战。较银行代销有更大折扣、对投资者来说体验更好的[天天基金](#)和[支付宝](#)等第三方平台，尚不能代销银行理财产品。此外，混合类理财产品由于银保监会的“双录”要求，目前还无法线上购买。

刘慧军介绍，汇华理财的混合类产品需要[中国银行](#)的客户前往中行的线下网点购买。“现在年轻客户感觉去柜台有点麻烦，下一步我们看看能否在满足合规要求的情况下，让客户投资我们的产品更加便利。”

但呼吁理财与公募基金“并轨”，并不意味着两者走向同质化。[农银理财](#)总裁段兵认为，此前大型银行理财子公司往往定位于提供全品类产品的全能型理财公司，“但是随着市场逐步扩容，差异化的战略定位尤其重要”。

对在权益投资方面可以与公募基金“一拼”的合资理财公司来说，目前其产品模式仍然走了“公司品牌”的路线，虽然人才、薪酬体系市场化，但是不同于公募基金，合资理财公司并不倚赖明星基金经理。

汇华理财的股东方、东方汇理北亚区行政总裁钟小锋表示，汇华理财致力于铸造风控、产品、销售、合规等全方位竞争力，而不是单靠明星基金经理吸引资金流入。东方汇理多年的发展，靠的就是各个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力，“靠的是飞机的动力，而不是靠飞行员耍杂技”。

“外资（做投资）都是蛮体系化的，以高盛资管的风格，更重视建立基于规则的投资策略。”王旭阳介绍，这就像更强调制定飞机飞行的包线，也就是飞行范围和飞行限制条件。“高盛不是一个英雄主义的文化，很讲究整个团队的配合。”

而对于缺乏长期权益投资传统的大部分国内理财子公司，以债券资产为代表的固收类投资仍是基本盘。

“中国市场中，大量普通的投资者还是需要稳定和持续收益的产品，所以银行理财要以绝对收益导向的产品为主、追求较低波动，我觉得这是不会变的。”潘东指出，“在护住基本盘的基础上，可以再去补短板、增强权益投资的能力。”

在固收类产品的获客与资产配置方面，与银行体系一脉相承的理财子公司也有一定优势。“依托母行，我们对于债权资产和非标资产的挖掘更有优势。”前述国有大行理财子公司人士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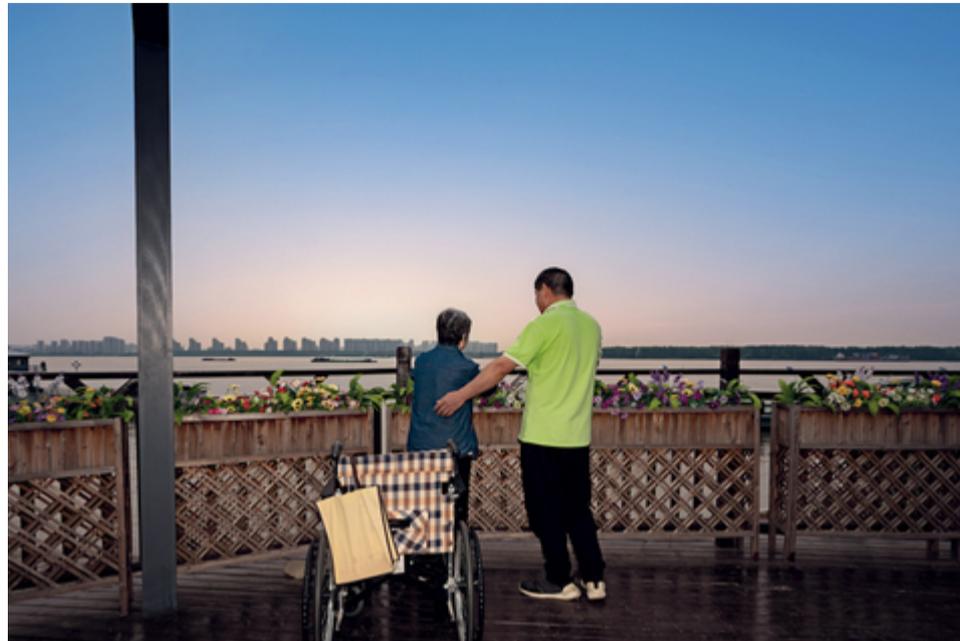
“中国也许并不需要理财行业变成另一个公募基金行业。”潘东说，“这可能就是财富管理行业的正常生态，不同的管理人有不同的生态定位，差异互补。”

版面编辑：肖子何

最新财新周刊 | 险企养老社区开启大洗牌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1月30日第04期

监管新规出台后，大型险企因具备相应的资质和实力获得正式入场券，而部分中小型险企或将出局



截至2021年末，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突破2亿，占比达14.2%，正式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自2013年起，保险公司就陆续投资兴建养老社区；在过去两年间，这一步伐有所加速。

文 | 财新周刊 吴雨俭

自2013年起，保险公司投资兴建的养老社区陆续亮相；在过去两年间，国内保险行业布局养老社区和养老地产的趋势更是有所加速。

作为保险行业的新兴事物，保险公司销售保险产品对接养老社区服务（下称“保险+养老社区业务”）面临的挑战之一，是险企未来是否能够为消费者兑现此前承诺的硬件和服务。

日前，银保监会向各地银保监局和人身险公司下发了《关于规范保险公司销售保险产品对接养老社区服务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强调保险公司应当“立足主业”“量力而行”，同时建立与养老社区服务方之间的防火墙。

这是监管部门首次就保险公司开展“保险+养老社区业务”立规。

业内人士分析称，《意见稿》将养老社区定义为保险产品的一项增值服务，这意味着监管部门对险企开展养老社区这项创新业务给予了肯定，在强调保险公司应与社区服务方建立防火墙的同时，实质上也把该权益及其交付纳入了管理范围。

此外，监管部门在《意见稿》中通过设立较高的资格门槛，将能够开展该项业务的机构限定在了实力较强、更为稳健的大型险企，要求其提升养老社区服务能力和水平、开展与能力相匹配的服务，这也意味着此前不少已投资养老社区的中小保险公司或将出局。

“《意见稿》既防范了风险，又肯定了保险业发挥‘产品+服务’的独特优势，对真正开展养老产业、秉承长期主义、资产负债比较匹配的险企来说是很大的利好。”一名在大型险企负责养老投资的高管表示。

未雨绸缪

“保险+养老社区业务”，是指保险公司销售保险产品，向购买相关产品累计缴纳保费达到一定金额的投保人，提供入住养老社区权益等增值服务的业务。

依照民政部的养老规划，中国的养老服务体系为“9073”：90%的老年人口依靠居家养老，7%依靠社区养老，3%依靠养老机构；其中“保险+养老社区业务”目前所服务的人群多集中在这3%，虽然占比看起来不高，但在中国庞大的老年人口基数上，仍然是个巨大的市场。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突破2亿，占比达14.2%，正式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2022年至2035年前后，还将有3亿人陆续步入老年。接近监管的人士告诉财新，截至目前，市场上已有27家保险公司推出了“保险+养老社区业务”，其中既包括泰康、太保、国寿、太平这样的大型险企，也包括合众、恒大、君康、前海、华夏、生命人寿等中小型甚至是问题险企。

以业内最早起步、规模最大的泰康保险为例，截至2022年底，泰康之家已实现全国27个核心城市31个项目的布局，12地13家社区已开业运营，服务在住居民超过7000位，养老床位达到6.8万张。据财新了解，泰康养老社区已

险较大，所以这类公司需要收缩相关业务；同时也给市场释放一个信号，避免有些机构靠着大肆圈地建养老社区卖保单、收保费，现在看起来一片繁荣，今后的风险难以控制。正因如此，《意见稿》把对险企的门槛和资质要求定得相对严格。”他表示。

前述负责养老投资的高管指出，包括问题险企在内的中小型险企，开展养老社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一是资产负债端的不匹配。不少公司销售的产品都是三到五年的短期理财型保险，尤其是对重资产模式来说，存在“短钱长投”的问题。

二是投入的资金量及其对于险企自身的影响。相对于大型保险公司上千亿元的投资体量，上百亿元甚至数十亿元的资金额度对中小保险公司来说都伤筋动骨，其中的潜在风险不可小觑。

三是不少地产背景的险企建设养老社区，只是配合地产板块做一些附加项目，并非专门提供养老服务。“现在主业都出了问题，副业就更不行了。某‘地产系’险企的养老社区项目已经出现了停工现象，什么时候才可以兑现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院长助理、教授王国军曾在《保险公司布局养老社区的风险与应对》一文中指出，保险公司建设与经营养老社区面临七大风险，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市场风险和保险风险。

所谓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利率、权益类资产价格、房地产价格等不利变动而产生的风险。由于保险公司在养老地产上的投资动辄几十亿、上百亿乃至千亿元，形成的不动产面临着房地产市场价格降低的风险。对采用重资产模式的保险公司而言，市场风险更是不容小觑。

而保险风险，是由于赔付水平、费用水平等实际经验与预期发生不利偏差而产生的风险。王国军表示，人口预期寿命的快速增长，意味着保险公司捆绑养老产品带来的长寿风险，可能会远超产品设计时的预期，未来的死差损将对其偿付能力带来较大的冲击。此外，“保险+养老社区业务”还面临着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这些风险的防范，均对保险公司的实力提出了要求。

以起步较早的合众人寿为例，在养老社区业务上，该公司可谓“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基于大股东[中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地产背景，合众人寿早在2010年便作为业内“吃螃蟹的人”在武汉开工建设了公司首家养老社区，后于2013年开园；2011年，合众人寿提出千亿工程，计划在十年内斥千亿元在全国打造26个大型养老社区；后因自建养老社区的重资产模式承受较大运营压力，2016年起又开始通过股权收购养老院，采用轻重资产结合的模式。除此之外，合众人寿也在海外市场频频发力，是全国首家投资收购海外养老社区的保险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在开展养老社区业务近十年后，合众人寿目前拥有武汉、沈阳、南宁3家自建自营大型养老社区，前后投资收购国内7家养老院及国外56家养老社区，总计66家养老机构；并收购了分布在美国17个州总计56家养老社区。虽然公司的总资产规模已达1500亿元，但合众人寿的养老社区业务在业内难言形成气候。前述负责养老投资的高管评价称，合众人寿的问题主要出在负债端，保险的销售能力不够强、资金规模也不够大；加上其养老社区建设于较为偏远的郊区，反而曾经因为业务持续性和销售误导等原因，收获了不少客户投诉。

数据显示，合众人寿在武汉首发的优年社区至今尚未进入盈利阶段：2021年该社区期末净资产为5.1万元（资产5960.62万元、负债5955.45万元）、营业收入5513.35万元、净亏损1727.11万元；反而是海外的两家养老子公司贡献了利润：Summin Union Life Holdings, LLC净利润0.36亿元；Cindat Best Years WT (US) LLC净利润1.38亿元。

令人唏嘘的是，合众人寿2022年三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显示，合众人寿当期的净资产为36.76亿元，风险综合评级为C类，并未达到《意见稿》中对险企开展养老社区的门槛要求。

如何“量力而行”

在设立门槛的同时，监管部门也对保险公司提出了“量力而行”的要求：开展与公司资本实力、经营管理能力相匹配的养老社区服务。业内人士指出，近两年受疫情影响，部分保险公司在销售养老保险时会绑定养老社区入住权，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认可，但保险公司提升运营服务能力、保证未来兑现能力则成为关键。

由于保险公司在销售保单后，距离客户真正行权入住养老社区，通常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保险+养老社区业务”的模式也如航空公司一般，存在“超售”现象，即卖出的保单数量高于保险公司拥有的床位数。

对此，《意见稿》提出，保险公司应充分考虑影响养老社区服务供给能力和客户入住需求的各种因素，建立测算模型，形成销售保险产品规模与养老社区服务供给能力相匹配的约束机制，通过分类测算和压力测试，确定合理的规模区间。

不过，究竟什么是合理的规模区间？保险公司可以建几家养老社区、提供多少张床位？一张床位到底卖几张保单合适？《意见稿》对这些问题并未予以明确规定，而各家公司目前的实践也互不相同。

据前述养老投资高管推算，泰康的超售比例约为1：20，即1张床位对应了20张保单；而太平为1：10、太保为1：5。以泰康为例，其目前已经行权选择入住养老社区的人数仅在10%左右，即卖出去的10张保单中只有1张保单客户入住了养老社区。这一数字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爬升。

“一张床位到底是收7000元还是8000元？这1000元的差价可能就会决定养老社区项目的盈亏。然而目前险资开展的养老社区还没有走完一个周期，整个行业也缺乏相关的经验数据，只能在其间进行动态调整。”一名保险行业分析师表示。

有业内人士向财新透露，在最初召开的行业内部座谈会上，监管部门对开展养老社区业务曾提出过较为严格的要求，比如应如何计提准备金等细节，但此次下发的《意见稿》中仅做了原则性规定。

前述参与政策制定的人士也向财新指出，《意见稿》并没有对保险公司在养老社区模式下应当销售多少保单作出“一刀切”的决定，而是要求险企根据自身的实力情况、建设养老社区和后续床位提供数量等因素建立模型测算。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在关于养老社区入住情况的预测上，互相制衡的条件太多了，包括人口老龄化、寿命和健康状况等，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不能简单地看一张床位匹配多少张保单，就判定保险公司保单卖得是多是少。因此，监管部门要求公司建立模型进行压力测试，同时也提出机构需要为此提供风险保障的支撑，比如计提准备金、鼓励股东提供后续的资金支持等。”他表示。

根据《意见稿》，保险公司应当充分测算销售产品与养老社区服务兑现可能出现的违约赔偿责任，计提违约风险准备金计入当期成本，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鼓励保险公司通过恢复与处置计划、股东承诺等，明确股东能够对该项业务的长期稳健经营提供必要支持。

养老社区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到底有多大？不同保险公司、不同地区、不同项目的表现差别巨大，泰康的成功也难以简单对标复制。

一方面，监管提醒保险公司要注意自己的兑现能力；另一方面，部分保险公司的养老社区面临入住率低下的问题，占用了保险资金但缺乏收益。即便是大公司如[平安](#)，也经历了战略转折。

“平安也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平安最开始在浙江桐乡整了1000多亩，后来又在云南西双版纳搞了2000多亩，都是三、四线城市，也没拉动多少保费，把[马明哲](#)搞伤心了就不弄了。后来一看泰康卖得风生水起，又决定继续做，但目前只在深圳蛇口落地了一个1万平方米的小项目，最近在广东佛山又做了一个1万多平方米的项目，对应的保费门槛1000万元起步。如果不是平安，一般的中小险企也很难承担起这样的战略风险，加上现在土地成本又比十年前高出不少，选址也很需要技巧，一年能拿下两块地就不错了。”前述养老投资人士表示。

[平安人寿](#)康养事业部总经理王宇科在此前采访中表示，自平安推出高端康养产品以来，带动相关保费收入已超200亿元。继佛山项目之后，“颐年城”“逸享城”项目将逐步拓展到广州、上海、北京、杭州以及武汉、苏州等城市。

《意见稿》规定，保险公司投资建设养老社区，应当按照资产负债匹配管理原则，综合考虑保险业务发展和资产配置规划、养老服务市场情况，以及未来变化趋势、投资成本和收益等因素，审慎作出投资决策，并符合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的监管规定。

强调风险隔离

根据《意见稿》的定义，“保险+养老社区业务”是保险公司销售保险产品时提供的一项增值服务。

一名参与行业内部座谈会的人士表示，近年来，保险业利用“产品+服务”的模式在养老、健康和医疗等方面越走越宽，两者之间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意见稿》将养老社区定义为保单的增值服务，意味着监管部门实质上将保险公司提供的这类权益及其交付纳入了管理范围，这也是未来行业和监管部门面临的新课题和新挑战。

“保险公司是卖保单的持牌金融机构，现在去卖养老社区，实际上并不属于牌照范围内的事情。之所以采用‘保单+权益’模式，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个权益只是作为保单的绑定，而非写到保险产品条款中的刚性承诺。所以《意见稿》强调风险要隔离、责任要区隔。与此相对应的，就是避免销售误导，因为前期的保单销售和权益卡赠送，跟后期的履约和交付存在时间差，十年后险企的高管不在任上了、业务员也离职了，所以提前做好准备、做好信息披露和纠纷处理机制是非常必要的，这在《意见稿》中也都有体现。”前述参与行业内部座谈会的人士同时表示。

根据《意见稿》，“养老社区应当独立运营，确保风险隔离”：保险公司通过投资建设方式运营养老社区的，应当以设立专业养老子公司的形式提供养老服务，并按照保险资金投资重大股权的监管规定执行；保险公司应当在公司治理、交叉任职、业务经营和财务管理等方面与专业养老子公司建立有效的隔离机制，防止风险交叉传染；此外，保险公司应对养老社区服务方进行充分的评估和审核，事先明确养老社区服务提供方式、合作时限、服务质量要求、违约赔偿责任等内容，并构建有效的风险隔离机制。

目前，国内养老社区的主要参与者包括保险公司、地产公司和养老服务机构等，其中险企和房企是最主要的两大参与者。

险企开展养老社区的优势，在于保险资金天然具备的长久期特征，与养老的长周期相匹配。在国内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等金融工具没有切实进入养老领域之前，保险资金几乎是惟一能与养老产业的长周期较好匹配的资金；同时还可以缓解险企“长短错配”的压力，降低资产负债的持有期缺口。此外，保单销售与养老服务也可以

相互促进推广：如国寿、泰康、太平等已有千亿元规模的总应缴保费收入，对保单销售和培育绩优营销队伍也具有较强烈的积极作用。

[太平洋保险养老投资管理公司](#)课题组的研究显示，投资养老社区是一种低回报、长周期的项目。盈利构成主要包括四个部分：一是发行养老分红险及其他特定场景险种（如健康险）所带来的保费运作收益；二是持有不动产的公允价值增值；三是养老社区的运营收益；四是押金或会籍卡沉淀资金的投资收益。

业内的普遍经验是，入住率若达到65%—70%，一个养老社区便可通过大额押金、会籍费、日常经营性收益达到项目自身的盈亏平衡或资金平衡；若不考虑土地及不动产的折旧摊销，一个成熟的养老社区达到盈亏平衡通常需要至少六至八年，真正实现可观盈利要在十年以上。

从总体的回报口径计算，单城市城郊大型活力社区基本回报为3%，若规模化精细化运作可提升至约3.2%，再考虑大健康（康、养、医）多业态协同或可进一步提升至3.5%—4%的水平，对城郊地区的不动产增值收益保守估计在0.5%—4%的水平，在主业协同理念下通过养老社区为保险销售带来2.9%—3%的增益，合计6.9%—11%的年回报率。

如果以价格及服务客群将养老机构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目前市面上保险公司提供的养老社区多定位于高端客群，门槛在200万元保费以上（旅居除外）；更高的如平安保险，针对高净值客户保费门槛1000万元起；此外合众人寿针对中端客户，门槛较低，为30万元。

保费门槛的高低也与保险公司的运营模式相关。目前，养老社区的运营模式主要分为重资产模式、轻资产模式、轻重结合模式。其中，重资产模式即保险公司自投自持自建自营，如泰康、太保等，所需资金规模大、投资周期长，但易于管理并保证项目质量；轻资产模式多采用租赁及与第三方合作的方式，优势在于短期内不会占用大量资金、资金回流较快，因此中小险企如大家保险、[光大永明人寿](#)、[百年人寿](#)等，多采用轻资产或轻重结合方式布局养老社区，但该模式收入较低、利润较薄，物业持有人稳定性较弱；合众人寿、太平保险等则采取轻重结合的模式入局。

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尤其是重资产运营模式，本质上是一项不动产投资。而此前，不少保险公司甚至包括一些大型险企，都存在着借养老之名搞房地产业务，或是以出售长期甚至永久居住使用权的方式变相开发住宅的行为。不过这一现象已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中央巡视组曾问责并处罚了部分险企，近年来已逐步走向规范。

此次《意见稿》中也再次明确，保险公司开展“保险+养老社区业务”，要遵循“四个不得”，其中一条即为“不得以养老社区投资为名，投资开发和销售商业住宅”；同时《意见稿》还提出，保险公司应注重构建和完善多元化、差异化养老社区服务，着力提升护理型养老社区供给能力。

除此之外，监管部门还针对目前养老社区问题较为集中的投诉，对消费者保护作出规定。《意见稿》中明确：保险公司不得对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养老社区服务方、服务受益人等各方的法律关系、权利义务表述不清晰，对服务提供不确定等风险缺乏消费者保护措施；不得在销售过程中不如实说明或夸大养老社区服务内容和标准，出现销售误导、未严格履行告知义务等行为。

版面编辑：肖子何

专栏 | 中国经济在转型中复苏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1月30日第04期

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制已逐渐清晰，可称为“制造业升级的举国体制”；要想让这个循环不断做大，金融机制必不可少



山东东营，一家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赶制一批太阳能光伏电池组件订单。随着经济发展长期规划的出台，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制已逐渐清晰，可简称为“制造业升级的举国体制”。图：视觉中国

文 | 石磊
吸引子科技董事长

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回顾过去20年，中国经历了两种重要的经济发动机制。2002年至2008年，出口外贸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在国际贸易循环中，中国是最大的净出口方，美国为最大的净进口方，中国又把贸易盈余赚取的外汇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再度借给美国：一方面维持了美国的购买力，推动美国形成更大的贸易赤字；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再度投向中国，以获取中国经济成长的收益。

全球化循环最初的驱动是跨国要素的高效利用，又受到国际金融循环的加强。这种明显的正反馈循环，会吸引更多的主体和资源，令该循环规模快速增长。

在这个循环中，中国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得以提高，美国的资本收益得以提升，但劳动力的国际竞争令美国居民部门的实际收入并未明显提升，而美国房地产和次贷市场的泡沫化发展又令居民部门杠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于是，这个受损部分成为整个循环系统的脆弱点，并在2007年至2008年以次贷危机的形式被引爆，还引发了十年后的国际摩擦。

原有机制被破坏后，2009年至2020年，中国进入到以房地产为经济动力的时代：房地产开发商从地方政府购得土地，把房子卖给居民；居民通过金融机构把未来二三十年的现金流以贷款的形式购买房产，并带动相关消费；资金转移给开发商，再部分转移至地方政府和建材商。这时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结构和居民部门所处生命周期位置，容易拉动房产升值，并带动土地不断增值；地方政府通过土地的增值和抵押融资，推动城镇化进程。

在这个循环中，正反馈机制来自房价和金融，看上去财富和消费快速增长，但系统的脆弱性不断增加，支付代价的是居民中的年轻人和新“城里人”。当负债不高、收入增长较快、人均住房面积紧张时，房地产循环有发展空间；但现在，居民负债已超过年可支配收入的110%、收入增速下降一半、人均住房面积水平较高，这样的系统脆弱性较高，模式难以持续。

“房住不炒”的政策导向打破了循环，临界点始于2021年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紧缩：一方面迫使金融机构转向，另一方面令居民部门对投资房地产的情绪冷静下来，打破了房价和金融的正反馈机制。2022年四季度，政策转向托底，系统性风险明显下降，但房地产反馈循环仍在缓步瓦解。目前的脆弱点是地方财政，这个脆弱点需要中央财政牢牢托住。

随着经济发展长期规划的出台，笔者认为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制已逐渐清晰，可简称为“制造业升级的举国体制”。以央企引领产业集群、以“专精特新”的民企探索在产品市场和技术市场的创新，既努力满足国内市场对更多好产品与更高服务的需要，也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开放竞争中力求自主可控。美、德、日、韩的技术孵化与产业升级之路都是这么走出来的，只要不脱离市场，参与国际竞争，这个循环有利于提升效率。

与以往不同，此循环既有需冒险探索的部分，也存在需大规模运营的部分，既需要资本市场对冒险探索的股权

提供估值和融资，也需要债务或REITs市场支持，以实现低成本运营和便利的资产周转。

要想让该循环不断做大，而非单方面消耗政府资源，就必须设计一个正反馈机制，金融机制必不可少。金融中介需要调动全社会力量，而非传统的间接融资，这就需要财富管理与资管行业的发展。当前中国居民总财富近70%集中在房地产上，若无财富管理行业将其部分转化为金融资产，那么居民或成为房地产循环瓦解的主要受损方，这会对改革形成较大阻碍。

“制造业升级的举国体制”通过不断的正反馈，呈现报酬递增式发展，将逐步把房地产循环瓦解释放出的要素吸收，向“绿色化”与“数字化”转型，这就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的经济结构演化。□

版面编辑：肖子何

回溯 | 一周回溯 (《财新周刊》2023年第04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1月30日第04期

开卷 | FIRST PAGES

一周回溯



1月22日，农历癸卯兔年开始，至2024年2月9日结束，因“闰二月”缘故，全年共有384天。不仅如此，这个兔年有两个立春，即“一年两头春”，也称“双春年”。



1月16日至20日，第53届世界经济论坛(WEF)年会在瑞士达沃斯小镇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并访问瑞士，其间，于18日与美财政部长耶伦会面。



1月1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欢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中美双方正就有关具体安排保持沟通。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2月5日访问中国。

1月25日，44岁的克里斯·希普金斯就任新西兰总理。1月19日，时任总理阿德恩宣布辞职；22日，希普金斯当选新的工党党魁。希普金斯曾任议员、教育部长、卫生部长、新冠疫情应对部长、公共服务部长和警察部长等职。



克里斯·希普金斯

1月17日，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人选名单公布，共2172名。其中，中共委员852名，占39.2%，非中共委员1320名，占60.8%。56个民族都有人选进入全国政协。平均年龄56.6岁。大专以上学历2037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共125名。

1月14日，国务院任命郑雁雄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1月11日，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宣布更换俄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联合部队总指挥，由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出任。



格拉西莫夫

1月17日，德国总理朔尔茨任命下萨克森州内政部长鲍里斯·皮斯托留斯为国防部长，取代此前辞职的兰布雷希特。



皮斯托留斯

1月23日，日本通常国会开幕，会期150天，如无延期，将于6月21日结束。国会开幕当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发表施政演说。

1月9日至15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西方七国集团(G7)五个欧美成员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和美国——进行了开年访问。



阮春福

1月17日，由于多位副总理、部长违反规定，造成严重后果，需承担领导责任，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意阮春福辞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家主席职务；18日，53岁的越南国家副主席武氏映春出任国家代主席。



武氏映春

1月17日，国务院任命孙业礼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孙业礼同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曾任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党的二十大新闻发言人。



1月14日，伊朗前国防部部长阿里-礼萨·阿克巴里因“为英国从事间谍活动”被执行死刑。该事件引发伊朗与英国新一轮争端。



1月25日起，中国驻美国使领馆恢复领事证件大厅对外办公，除签证、公证和认证申请，护照、旅行证申请及养老金资格审核可通过“中国领事APP”线上办理，无需到证件大厅办理。

1月16日起，非香港居民将一律不获提供免费接种新冠疫苗。非香港居民如有需要，可经提供自费疫苗接种服务的私营医疗机构接种新冠疫苗。

1月14日，中国探月航天IP形象太空兔正式对外公布名称，中文名：“兔星星”；英文名：“To star”。

1月15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恢复运营。初期，广州、深圳地区往香港西九龙方向日均开行跨境高铁动车组旅客列车38.5对。

1月17日，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205元和195元。



1月21日，美国蒙特雷帕克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1人死亡、9人受伤；23日，旧金山湾区半月湾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7人死亡、1人受伤；23日，奥克兰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



1月18日，据外媒报道，一架直升机在乌克兰基辅附近坠毁，包括乌内务部长在内的18人死亡。

1月15日，辽宁省盘锦浩业化工有限公司烷基化装置在维修过程中发生泄漏爆炸着火事故，造成13人死亡、35人受伤。国务院安委会已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

版面编辑：李东昊

前瞻 | 2月12日，一个新的“国际日”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1月30日第04期



根据联合国大会在2022年12月20日通过的一项决议，2023年2月12日，全球将迎来首个“防止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国际日”。图：视觉中国

文 | 财新周刊 徐和谦

根据联合国大会在2022年12月20日通过的一项决议，2023年2月12日，全球将迎来首个“防止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国际日”。这一国际日的设立，旨在提高对暴力极端主义威胁的认识，并加强这方面的国际合作。

根据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设立这一国际日的有关决议，所有联合国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学术界和媒体等均应邀以适当方式纪念该国际日，包括为此开展教育和提高公众认识的活动，并分享这方面的最佳做法。

在2022年12月20日针对设立这一国际日的决议进行表决时，共有154票赞成、0票反对、4票弃权。弃权的国家包括白俄罗斯、刚果、马达加斯加、俄罗斯等四国。决议最终获得通过。

向联合国大会引入这一决议的伊拉克代表在介绍该决议草案时说，伊拉克是受恐怖组织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他称，目前决议的优先事项，是提高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加强国际合作。他还强调，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不能与任何宗教、国籍或人群联系在一起。

这份决议重申，联合国各会员国承诺采取措施，旨在消除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各种条件；遵守各会员国根据包括国际人权法、国际难民法和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承担的所有义务；强调会员国及其各自的国家机构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负有首要责任。决议着重指出，政府间组织、民间社会、学术界、宗教领袖和媒体在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决议还明确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认为恐怖主义是无可辩解的犯罪。

联合国会员国、《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下的各实体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将以适当方式纪念该国际日。因执行这一决议而可能产生的一切活动费用应由自愿捐款支付。

值得注意的是，选择投下弃权票而非赞成票的俄罗斯代表，在表决前解释说，这一议案的协调人在没有考虑其他提案或进行广泛讨论的情况下就欲将其通过，并批评决议案文对恐怖分子的界定采取了所谓“坏的和不太坏的”的双重标准。

投下赞成票的古巴代表则发言说，某些国家打着所谓打击恐怖主义的旗号，对主权国家的人民实施侵略行为，公然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这是不可接受的。古巴还借此机会谴责某些国家因政治动机而采取的单边行动，反对操纵“恐怖主义”标签，使之成为反对其他国家的工具。

埃及代表警示，目前对暴力极端主义仍没有一个具共识的定义，也缺乏一个明确的法律框架来管理国际和国家层面的暴力极端主义。

版面编辑：李东昊

国风 | 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想卖1000万辆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1月30日第04期

文 | 财新周刊 安丽敏

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预计同比增长约40%至1000万辆，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将达到四成。

2023年1月12日，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长张永伟作出上述预测。渗透率是指新能源汽车在新车整体销量中所占比例。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共销售688.7万辆，渗透率为25.6%。中国主管部门先前制定目标，即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在2025年达到20%，在2030年达到40%。现在，2025年目标提前三年在2022年超额完成。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预测，2030年目标也会在2023年提前实现。

行业内对2023年销量有多种预测，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最为乐观。另一家行业机构即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认为，2023年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将达850万辆。汽车主要分为乘用车和商用车两大类。瑞银中国汽车行业研究主管巩旻预计，2023年新能源乘用车会达到880万辆左右，渗透率约为37%。

[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判断，2023年新能源汽车销量为900万辆。[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相对保守，他认为2023年新能源汽车销量约为820万辆，同比增速不到30%。

张永伟称，2023年新能源汽车市场确实面临挑战，比如实施14年的新能源汽车补贴在2022年12月31日终止，对车企来说意味着单车成本上涨1万余元。在补贴政策退出前，部分消费需求先行透支，经销商也积攒了较大库存。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新能源汽车上牌量为535万辆，占新注册登记汽车总量的23.05%。公安部披露的上牌量，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销量之间有150万辆的差异。公安部的数据更加精准。这些不利因素需要时间来消化。

张永伟认为，推动新能源汽车增长的积极因素更多。他指出，国家政策层面仍然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新能源汽车免征购置税优惠措施延续至2023年底。此外，企业聚焦智能电动汽车研发，2023年预计会有超过100款新能源车型上市。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列出多个新能源汽车有较大增长潜力的细分市场。二、三线及以下城市会是2023年市场增长重要支撑。从产品结构看，近两年新能源汽车主要分布在高档车和微型车。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认为，2023年15万至30万元区间车型销量占比有望接近一半，即新能源汽车会逐步渗透至基数最为庞大的中端车市场。

商用车会接力乘用车，进入新能源快速发展期。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称，商用车电动化原本存在续航里程瓶颈，换电模式可以部分解决问题。

此外，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指出，超快充等充电设施不断完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大规模上车，都会改善新能源汽车使用体验，间接推动销量持续增长。□

版面编辑：李东昊

心智 | 用仪式开启新年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1月30日第04期



插画 | 董必奇

文 | 蓝玲
安人心智特约作者

日常生活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重复同样的程序，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与同样的人，做着一成不变的事情。倦怠、无趣，时不时地，这样的感受是不是就涌上你的心头？而仪式，让我们对时间与空间有了不同的感受，它超脱了日常的生活，摆脱了平常的束缚，让我们从惯常的行为中解脱出来，就像是一段休憩时光，我们能够停下来，重新审视自己内心的需求，重新感受生活的气息。

自古以来，仪式就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比如，古代的祭祀、祈雨、占卜，都是生活中的大事件，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们遵循固定的程序与模式，每次以同样的流程进行，这些程式深植在人们的大脑之中。人们从中获得了安全、喜悦、安宁，以及对未知的一种确定。

所以你会发现，越是在压力大、缺乏安全感、不确定的时候，我们越会渴望仪式，渴望通过一些确定的东西，消除不安的感觉。就好像，通过某种仪式，破旧的、不好的东西会消除，而美好的事物会出现，崭新的形势会形成，我们就能重启更好的生活。仪式打破了原来的界限，让人们进入新的维度，重构了我们对生活与世界的感知。

什么是仪式？相较于重大的宗教、社会仪式，美国南加州大学市场营销学教授Dennis W. Rook更强调仪式的日常属性，他对仪式的定义，被学者们广泛采用：“仪式是一种表达性、象征性的活动，由一系列依固定次序发生，并常常在一段时间内重复的多个行为构成。仪式行为往往按照固定的‘脚本’来‘表演’，同时包含正式性、严肃性和内在紧张性。”

中国有学者综合相关研究，认为仪式主要包括三点：1.流程式动作；2.象征意义；3.非功能性行为。仪式包含一系列正式、固定、重复的流程式动作或行为，这些动作或行为的象征意义，大于动作或行为本身，所以，它们就没有直接的功能性目的。例如，在电影中，我们常会看到“金盆洗手”这个仪式。“洗手”的目的并非在“洗”，而是要告知众人，这个人将脱离这个行业或领域，从此开启新的生活，不要再因此而打扰。仪式的流程化行为，就是要将这个象征意义传递给参与者。

这么来看，春节就像是一个大仪式，而其中又包含着很多小仪式，延续更长时间，跨越更广空间，在中国人心智中占据了非常重的分量。它强调家庭的概念，传递出吉祥团圆的意义，带给我们温暖与归属。春节，从小年夜、除夕的团圆饭，到初一迎财神、初二回娘家、初三赤狗日、初四迎灶神、初五送五穷，再到元宵节的赏花灯猜灯谜，都有不同的仪式，有不同的流程与禁忌，都代表着不同的意义。

人们为什么需要仪式？Rook认为，仪式行为出于五类原因：宇宙论（如宗教仪式）、文化价值（如文化仪式）、群体学习（如民族仪式）、个人目标（如清洁仪式）和生物论（如求偶仪式）。那么，中国人过春节，既出于文化价值，又出于群体学习，它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历史悠久，因而也具有独特、丰富的文化内涵。

仪式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行为准则，也带给我们归属感。它是一种群体规范，也会情绪感染。群体规范，是一个群体所特有，并为这一群体成员所认同的行为模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情绪感染，是群体内部成员情绪同质化的现象，在独特的场景中，个人的情绪很容易被他人激发，从而，群体内部成员的情绪就相互感染，趋于一致。

就像在春节，我们有一致的行为，游子归家，亲友团聚，作为个体的“我”，融入家庭群体之中，成为“我们”，并从中感受到亲密、安全、信任与归属。这是仪式带给我们的积极情绪。仪式也会带来消极情绪，例如，中国文化

中，“折柳相赠”就是经典的送别仪式，听闻折柳，我们会感受到惜别怀远、离愁别意。

仪式，让我们从“生物人”成为“社会人”，通过它，我们学会与人打交道，建立情感联系。这是因为，集体仪式包含三种要素：同步行为、共享注意和共享意义。

模仿让群体成员的行为一致，而一致的行为成为固定程序之后，又成为很好的学习范本，便于后来的人学习。

共享注意让个人与他人形成对世界的共同感知。共享注意会放大个人的情绪反应，因为对事物的共享注意，会让个人对事物进行更深层次的加工，而对消极或积极情绪信息的更深层次加工，就会增加个体的消极感受或积极感受。所以，群体中的人处于共享注意状态时，就容易出现情绪感染。

意义感是集体想象的“蓝本”，就像神话大师坎贝尔说的，“神话是众人的梦”。仪式创造出的意义，让我们能在一个共同的世界沟通、交流，能爱人所爱、乐人所乐、哀人所哀、憎人所憎。

类似春节这样的仪式，也像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依照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它是每个人心理的一种原始意象：“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哀伤的残余，并且总的来说始终遵循着同样的路线。”

我们渴望春节的年味，就是因为它对我们行为、情绪与记忆的深刻影响，就像现在，如果你能听到鞭炮响，心中就会有烟花绽放，一些特别的记忆，也会被唤醒。

更多精彩请阅读：[【专题】心智](#)

版面编辑：李东昊

天眼 | 尼泊尔坠机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1月30日第04期



图 | Yunish Gurung/视觉中国

当地时间2023年1月16日，尼泊尔博克拉，救援人员在坠机残骸中搜寻。当地时间15日，尼泊尔雪人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尼中部博克拉地区塞蒂河峡谷附近坠毁，失事航班共搭载68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其中包括15名外国人。据该航空公司发言人证实，机上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已遇难。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消息，失事飞机上没有中国公民。据了解，失事航班为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生产的ATR72-500型航班，黑匣子已被发现，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这是尼泊尔3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空难。尼泊尔政府宣布将16日定为公共假期以悼念遇难者。□

版面编辑：李东昊

回声 (《财新周刊》2023年第03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1月30日第04期

财新网友：没有企业家创业，哪来的就业？

[《阿里换代》](#)

恐欲：马云的离去，意味着太多。

[《阿里换代》](#)

Icescream：鼓励社会办医，但民营医院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民众在缺乏专业知识的情况下容易被过度医疗，假如监管不到位，医疗体系改革就不会顺利。

[《抗疫呼唤深化医改》](#)

倔老头：深化改革的前提是把教育与医疗看作国民的基本社会福利，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

[《抗疫呼唤深化医改》](#)

鸡腿：改革无非就是取消特权、补上欠账。

[《抗疫呼唤深化医改》](#)

Jack34：牌照生意，提高门槛是早晚的事。

[《私募基金严进严管》](#)

版面编辑：李东昊

读周刊看视频（《财新周刊》2023年第04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1月30日第04期

芯片行业正由全球化转向“半区域化”。3纳米产线、400亿美元投资，台积电在美国的动作挑动全世界神经——@《财新周刊》《[台积电赴美](#)》，相关视频：[分析：美国重塑其半导体产业并非一夕之功](#)

2月3日，乌克兰政府将与欧盟领导人在基辅举行今年内的首次峰会——@《财新周刊》《[欧乌峰会将举行](#)》，相关视频：[戴蒙：欧洲能源危机可能进一步恶化](#)

版面编辑：李东昊

财新视听内容精选（《财新周刊》2023年第04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1月30日第04期

【华尔街原声】

[联储前官员：美联储不会过早停止加息](#)

【周五晚7点】

[俄启动人民币-卢布工具 继续“去美元化”](#)

版面编辑：李东昊

答疑（《财新周刊》2023年第04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1月30日第04期

联系编辑部：邮箱 newsroom@caixin.com 或电话（010）8590 5000

北京读者 阳鼎：

“地沟油变柴油”技术近期引发热议，这是一种什么技术？

本刊产业新闻部：

近期所谓“地沟油变柴油”即二代烃基生物柴油技术，主要利用废弃食用油（即“地沟油”）、棕油厂污水（POME）等废弃油脂，催化加氢生成氢化植物油（HVO，即二代生物柴油）。相比而言，一代酯基生物柴油（FAME）对原料要求较高，主要利用玉米等植物作物，通过酯交换生产生物燃油，往往会推高粮食需求。

目前市场上八九成生物柴油都是一代技术，具备二代生产工艺的企业较少。贝恩资本亚洲私募股权合伙人兼联席主管竺稼解释称，一大原因在于废料前期处理工艺复杂度大，如地沟油的成本体现在采集、运输与储存，且杂质多，需进行预处理后再进入化工加氢等程序。另一大限制则在于原料。在马来西亚，二代生物柴油原料是POME，即压榨棕榈油过程中所排废水中的油脂，而废水的成本体现在运输，必须就近设厂。

目前，生物燃料的主要问题在于成本和供给规模。生物柴油成本远高于从原油生产的成品油，同时与化石燃料相比，地沟油或POME集运储尚不成系统。

HVO消费集中在欧美。“需求是有保障的，供需关系是不平衡的。”竺稼认为，随着各国对碳排放的重视，会加大对生物能源需求。在供给端，中华煤气的生物质业务平台公司怡斯莱（EcoCeres）是全球第二大HVO和可持续航空燃料（SAF）提供商，近期获贝恩资本投资。

版面编辑：李东昊

《财新周刊》三篇报道荣获第34届中国经济新闻奖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1月30日第04期

2022年12月，第34届中国经济新闻奖评选揭晓，《财新周刊》三篇报道入选，分别是《[认真领会“鱼水论”](#)》，荣获新闻评论类一等奖；《[退休老人再就业](#)》，荣获融合报道类二等奖；《[中植何处去](#)》，荣获监督报道类三等奖。

中国经济新闻奖由中国经济传媒协会主办，每年评选一次，是全国评比达标表彰保留项目，也是全国优秀经济新闻作品评选的唯一奖项。此前，财新报道多次入选。

本届中国经济新闻奖按“新闻报道、监督报道、新闻评论、融合报道”四大类申报和评选。216家媒体推荐了944篇（件）作品参评。

另，2023年1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中国保险业2022年度好新闻”。其中，《财新周刊》报道《[养老险公司重定位](#)》入选“中国保险业2022年度好新闻（媒体组）”，《财新周刊》亦获评“中国保险业2022年度突出贡献媒体”。

《财新周刊》编辑部

版面编辑：李东昊

最新财新周刊 | 直面人口负增长时代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1月30日第04期

很多政策、制度以及社会规范和家庭传统习俗已不适应人口发展趋势

文 | 财新周刊 许雯

“如果问我，人口负增长是一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它只是一个消息，早晚会来的。”对于预料中的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到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教授郑真真这样评价。

2022年，中国人口开启负增长——即便中国近年迅速滑落的出生人口和生育率数据，早已预示这一天的到来，但当靴子真正落地的刹那，依然令舆论震颤，更有不少人直呼“见证历史”。

1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披露最新人口数据：2022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低于全年1041万的死亡人口，人口自然增长率-0.60%，全国人口141175万人，较上年减少85万人。

“几十年来大家都一直在预测，中国人口什么时候会从内在的负增长转换为显性的负增长。”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感叹，除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人口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处在正增长状态，但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逐渐逼近零增长和负增长，2022年如预期中出现人口负增长并不惊讶，但依然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拐点，“我相信在人口发展方面，2022年注定是会被经常提起、写入历史的一个年代。”

多位人口学者判断，中国人口数量已达到峰值。人口负增长是既定的必然趋势，不可逆转，未来可能某一年或某几年伴随增长和反弹，但长期看人口减少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总体看，由于人口负增长惯性内在规律的作用，未来我国人口负增长将是长期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许颖认为，根据出生人口监测数据估算，“十四五”时期中国年度出生人口会有所波动，预计“十五五”（2026—2030年）以后，将进入稳定人口负增长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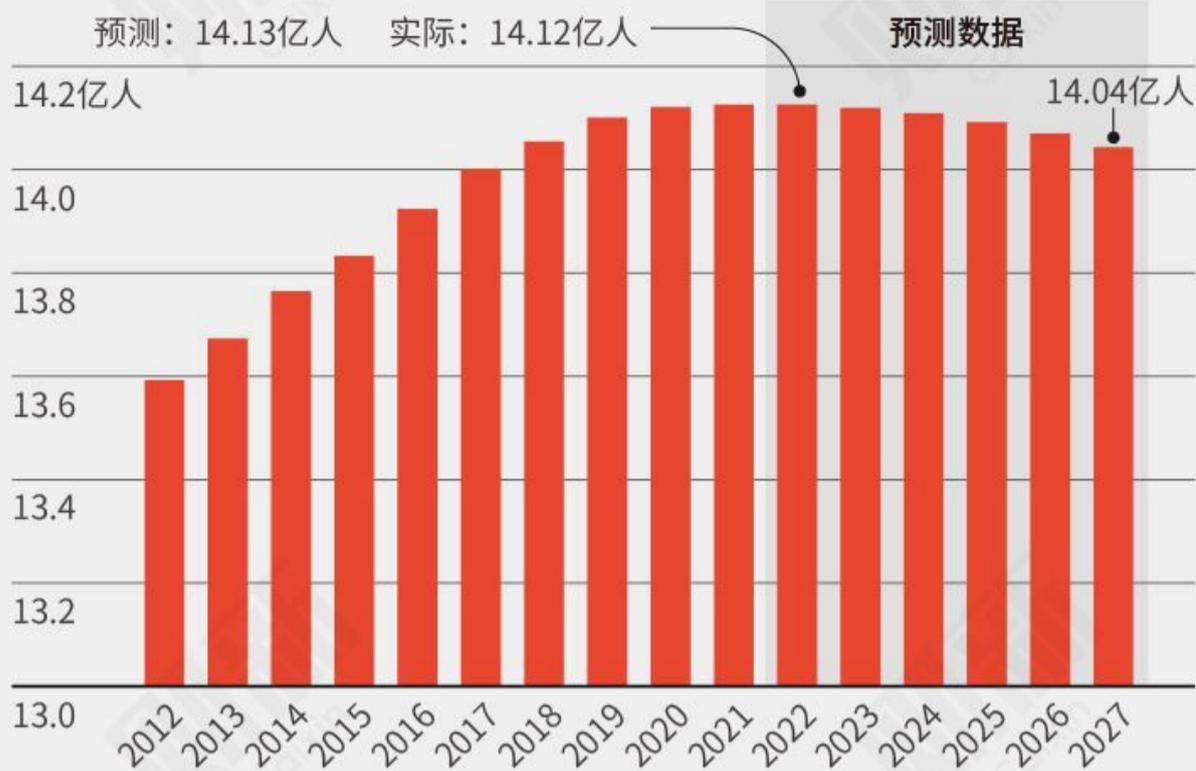


2021年5月12日，北京，家长带孩子在公园里玩耍。低生育率、低增长或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不仅是中国也是全球在21世纪将要面临的挑战。图：Kevin Frayer/视觉中国

专家预计，中国人口负增长短期温和，逐步加速。据张许颖及其团队成员的研究，依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七普”）数据，经过多情景模拟测算，预计“十四五”时期人口年均减少80万，“十五五”期间人口年均减少230万，2031—2040年均减少370万，2041—2050年人口年均减少620万。相对14亿人口，2035年之前中国人口缩减规模较小，减少态势平缓。但长期来看，人口负增长不断提速，预计2050年之后，会出现年均减少1000万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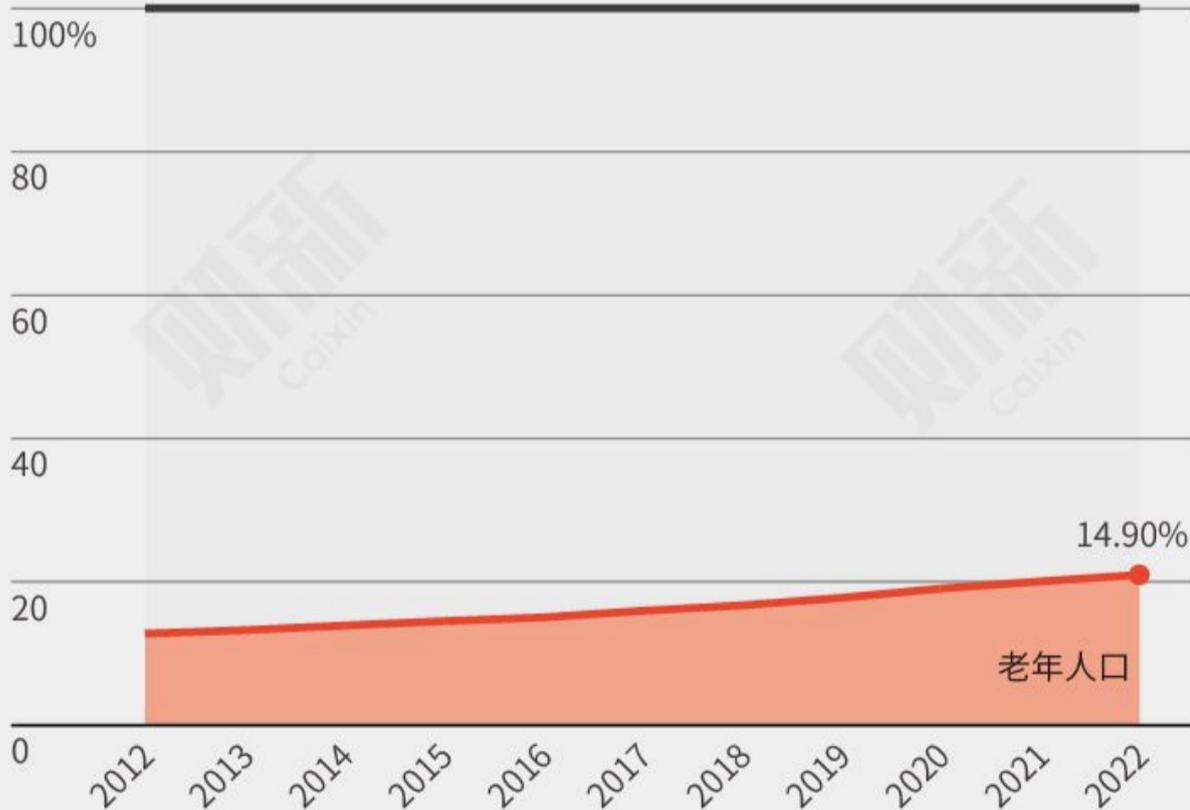
中国未来十年人口或将持续负增长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7年中国人口总数将降至14.04亿人。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新“数字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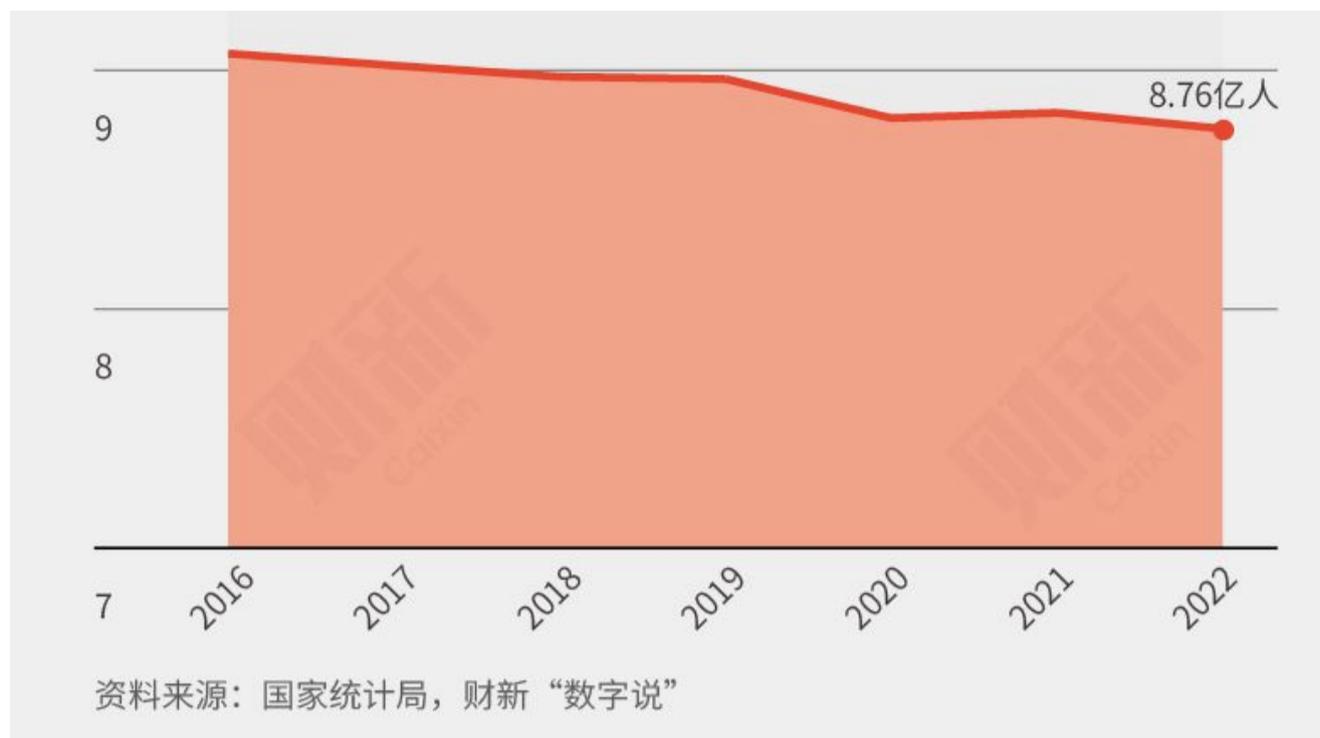
中国近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持续增高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财新“数字说”

中国16—59岁劳动人口近年呈下降趋势

10



伴随人口负增长时代开启，长期看，中国人口总体规模将开始下降。这意味着什么，又将带来什么改变？

出生人口为何持续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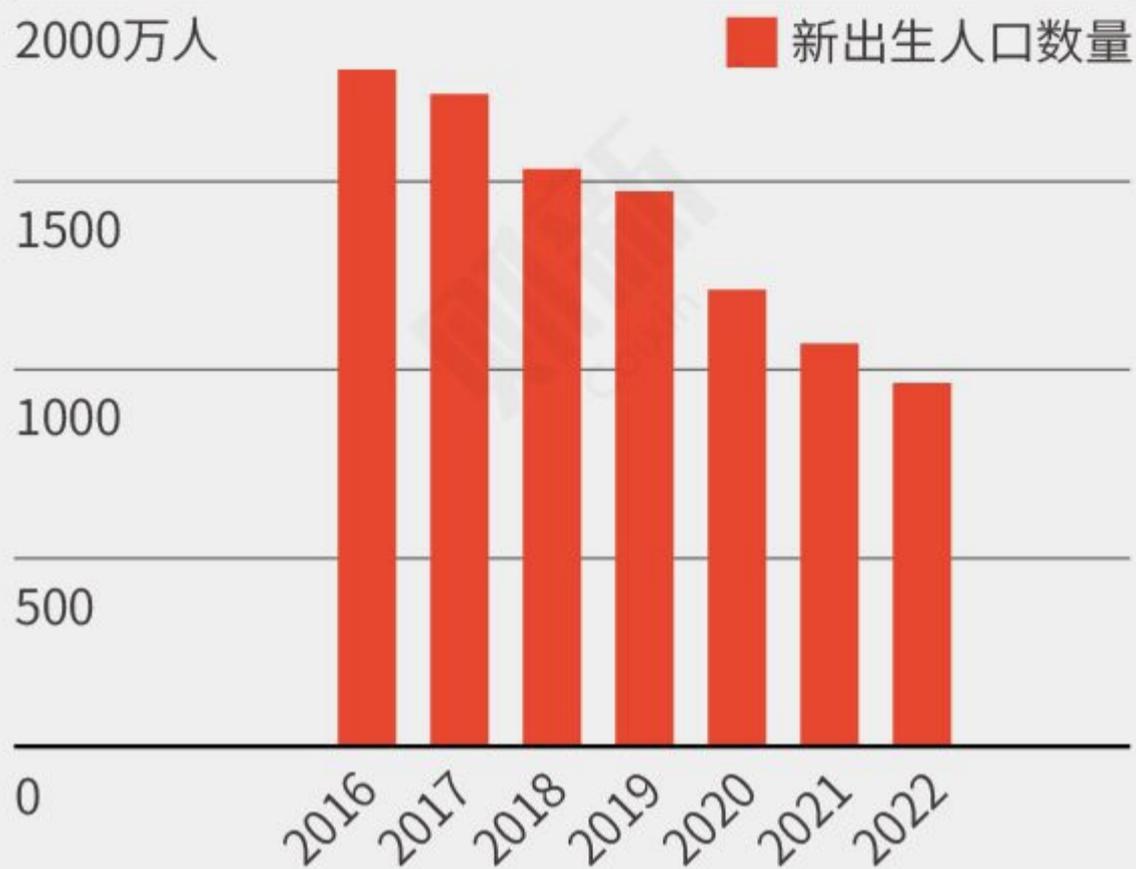
在人口负增长到来之前，中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起已持续走低，至2022年跌破1000万，已不及20世纪90年代初期2000多万新生儿的一半。有学者形容中国人口形势这样的剧烈变化是“人口塌陷”。

究其成因，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卫认为，育龄女性规模不断减少应放在首位。

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的育龄女性规模从2010年以来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从2010年的3.7亿下降到2020年的3.2亿和2022年的3.1亿。2017—2020年，育龄女性人数年均减少567万，其中对于出生人口贡献最大的20—29岁生育旺盛期女性，年均减少540万。这也是上世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的“独生一代”，即常说的“80后”和“90后”年轻女性人数比“70后”明显减少。

2022年新生儿跌破1000万

2022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数量低于全年死亡人口，人口自然增长率由正转负，全国人口较上年减少85万人。



资料来源：财新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女性结婚年龄推迟是另一重要原因。近10年来，女性初婚年龄加速推迟。陈卫介绍，“七普”数据表明，中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由2010年的24岁上升到2020年的近28岁。

这导致结婚女性数量明显下降，进一步减少了出生人数。2010—2020年20—24岁女性已婚比例从32.5%下降到19.6%，25—29岁女性已婚比例从78.4%下降到66.8%。全国结婚登记人数连续8年下降，从2013年的1347万对下降至2021年的764万对，减少了43.3%。其中，初婚登记人数从2386万人下降至1158万人，减少了51.5%。

已婚女性生育率近年也在持续下降。陈卫称，2010—2017年已婚女性生育率基本呈现上升趋势，但是2017年之后转而下降，进一步压低了出生人数。

新冠疫情也对婚育行为产生一定影响，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和出生人数。陈卫认为，在疫情冲击下，很多人尤其年轻人的就业、收入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被迫延后或取消婚育计划，心理健康也受到冲击，例如疫情可能造成孕妇焦虑，导致流产增加。

在前述表象之外，究其根本，导致中国近年出生人口下降的内在深层原因是民众生育意愿低迷。

“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中国妇女的生育意愿可能是全世界最低的，不仅低于西方国家，也低于日韩等生育率极低的国家。”陈卫指出，尽管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但是生育意愿高于更替水平，但中国的生育意愿也大大低于更替水平。

已有诸多研究数据揭示这一结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於嘉等发表的论文《中国居民理想子女数量的宏观影响因素》指出，中国居民的理想子女数量很低，其均值在全球最低范围内。另据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80后”和“90后”女性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82个和1.66个。

这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陈卫认为，中国女性生育意愿较低与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有很大关系。与此同时，中国快速的经济社会变化，对影响生育决策的一系列因素产生很大冲击，其中生育成本的大幅度上升成为最关键的影响因素。

照料负担过重阻碍着家庭再生育意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指出，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养老和抚幼的责任几乎全部回归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加上工作压力，这种预期或现实造成了婚育人群“恐婚”“恐育”的心理，焦虑感被传递和放大。

生育养育孩子的现实经济压力也摆在每个家庭面前。陈卫称，城市不断攀升的房价、越来越高的养育费用、公共托幼服务的缺位和市场养育服务的高成本让家庭“生不起”“不敢生”。尤其是全社会高度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家庭对教育存在过度追求的现象，学区房、课外辅导等精养型的孩子养育方式使得孩子的养育成本非常高。

更无法避而不谈的是，中国女性还在普遍遭受“母职惩罚”。陈卫指出，社会对女性存在“母职+公职”的双重期待，而市场环境对女性不友好，对女性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就业、升职等歧视，一方面加剧工作与家庭冲突，另一方面也带来就业和经济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

经济增长能否持续

无论成因为何，中国人口负增长已成既定事实。“中国总人口和劳动力人口将开始双下降，势必引发人们对经济增长和劳动力短缺的双重担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童玉芬一语中的。

首要的问题是，迈向人口负增长后，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实现持续增长？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厚莲分析认为，短期内，人口负增长的经济影响是温和的；但长远看，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会产生冲击，对经济系统的抗风险能力产生影响，这需要有足够的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劳动生产效率提升和经济治理能力提升来应对不利影响。

他更进一步分析称，人口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的要素，既是消费的主体，又是生产的主体，通过需求侧、供给侧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

从需求侧看，一方面，人口负增长意味着消费的群体规模缩小，对食物、住房等基本需求带来“下降效应”；另一方面，随着消费能力提升、消费结构变化，社会消费需求产生“增长效应”。当增长效应超过下降效应时，总消费需求便不会下降。短期内，人口负增长平缓变动，经济需求依然会不断增长。

从供给侧看，人口负增长并不直接作用于经济产出，而是通过劳动力供给，以及劳动力与资本投入、技术进步等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来影响经济产出。虽然人口负增长时期劳动力供给下降，但经济对劳动力需求也会下降，同时资本投入、科技创新、要素配置改革等形成替代，经济生产能力依然会继续提升。

纵观国际经验，刘厚莲的结论是——人口负增长并非经济衰退的决定性因素，人口负增长与经济增长能够并存。

他和研究团队观察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13个国家人口负增长和经济增长事实。分析发现，这些国家在经历人口负增长时经济依然保持增长，总体表现出经济发展水平高而经济增长率低。例如，对于高收入国家的日本、意大利，经济增长率在1%左右；低收入国家的乌克兰、波黑等超过3%；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不久的匈牙利、罗马尼亚甚至达到5%。另外，部分国家则先出现人口负增长，而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比如，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

“我国正处在跨越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负增长并不会阻止我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刘厚莲认为，从人口负增长后经济仍实现增长的国际事实来看，人口负增长时期的经济增长更加依靠劳动力质量提高、科技创新、要素配置等新动能。

劳动力短缺隐忧

与经济增长并存，另一重担忧在于：今后中国劳动力是否会伴随着人口负增长出现严重短缺和不足？

实际上，中国劳动力下降早于人口下降，已延续十年，它不仅是人口负增长的前兆，且会伴随人口负增长的到来和发展继续下降。童玉芬介绍，2012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达到了10.06亿的峰值，随即开始了持续至今的劳动力负增长，到2021年已经降至9.49亿人，每年大约减少712.5万人。

她预测，随着人口负增长趋势出现和持续，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会继续下降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大概到本世纪中期甚至之后，同时劳动人口内部的年龄结构也会继续老化，如果不考虑国际移民，相当时期内中国劳动力持续减少不可逆转。

劳动力虽然持续减少，但规模依然很庞大。从国际经验看，童玉芬指出，世界其他先行国家发展过程中，没有发现总人口负增长会立刻引起劳动力人口的进一步急剧下降。“我个人认为中国劳动力下降不大会出现劳动力的总量短缺，与其关心劳动力数量会不会短缺，不如更关注劳动力质量。”

如何利用窗口期，更合理地调动存量劳动力，应尽早做打算。童玉芬认为，人口负增长时代，可以通过加快促进劳动参与率来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尤其是老龄人口中的低龄人口在今后一段时间还比较丰富，需要提高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利用率。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段成荣呼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让劳动力自由充分地迁移流动，发挥现有人力资本存量的作用。

具体而言，段成荣分析称，中国地理情况、自然条件和人力资本水平存在地区差异，劳动力、土地、资本在地域空间上配置不均，现实中，劳动力尤其是其中的流动人口，并没有享受到同流入地户籍人口对应的就业、教育、住房、生育、公共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均等服务。这也就使得劳动力并不能充分地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制约了劳动力充分地发挥其自身的人力资本。

据此他认为，在过去传统的人口规模红利已经式微的情况下，必须破除过往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让劳动力自由、充分地跨地区流动。“把现有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和创造能力充分地运用起来，这将是我们将有效应对人口负增长带来的种种问题时，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最重要的举措”。

更长远看，段成荣认为，政策制定者应利用窗口期，提早为劳动力的跨国流动进行制度设计，这也是不少发达国家应对劳动力短缺的解题思路，“比如我们未来可能短缺哪些领域的人才、满足什么条件可以引入。”

政策和社会规范需主动求变

“人口变化是事实，本身不应该是问题，不认识到人口变化会导致什么社会经济后果才是一个问题。”郑真真认为，当务之急在于如何适应人口负增长态势，预期到这种变化可能带来的挑战，制定应对策略。

前瞻性的应对准备尤为重要。郑真真提到，中国的很多政策、制度以及社会规范和家庭传统习俗，都是在人口具有高生育率和年龄结构相对年轻时形成的，已经明显不适应当前人口发展和未来人口发展趋势，需要及时作出调整和改变。

以家庭传统习俗为例，她认为近年兴起的“两头婚”即是传统婚俗因应“独生一代”的嬗变。“两头婚”最早兴起于江浙一带，夫妻双方结婚后通过协商来达成婚姻的平衡，例如孩子跟谁姓、住男方家还是女方家，男女双方或者双方家庭基于平等，达成的一种长期契约。

政策支持应更加积极和超前。面对严峻人口形势，为提振低迷生育率，中国已从抑制性生育政策向支持性生育政策转变。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出台，提出一系列支持生育配套措施，涵盖生育、养育、教育、税收、住房、女性权利，如试点育儿假、研究婴幼儿照护费用抵扣个税等。但短期内，刺激生育效果暂未显现。

时隔一年，2022年8月1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7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围绕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完善生育休假和待遇保障机制等七个方面，完善和落实20项具体支持措施。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发展研究中心茅倬彦认为，中国生育支持政策还在起步阶段，基础较薄弱。各地政策在实施力度、执行难度和落实难度各不相同，政策执行的衔接性以及内容设计的精细程度还有待加强。

茅倬彦提到，近年来中国人口形势出现婚育年龄推迟、同居率上升、离婚率提高等新变化，带来新的生育问题。例如婚育年龄推迟提高了高龄高危孕产妇数量和比重，相应提高了孕产医疗费用，如35岁以上高龄产妇必须做“羊水穿刺”或“外周血游离DNA”检查，平均价格在2500元左右；婚育年龄推迟也使不孕不育问题凸显，增加了不孕不育治疗和辅助生殖技术服务需求和费用。目前医疗保险尚未将这些费用纳入报销范围。

段成荣期待，改善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尤其生育相关的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流动夫妇的生育意愿。他通过对以往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流动的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特别是在中国流动人口的主体乡-城流动人口中，其生育意愿高于城市本地户籍人口。但流动人口处在人户分离的状态，相关服务和措施还不能很好满足他们对于生育的需求，因此流动人口相对较高的生育意愿同生育行为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他认为，通过流动人口的市民化举措，具体来说，让流动人口能够享受到同城市户籍人口均等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完善基于家庭视角的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通过构建流动人口的生育支持、流动女性育后的就业保障以及婴幼儿照料的政策机制，可以把流动人口这一部分没有实现的生育意愿变成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助推生育率的提升。“我曾经大概做过一个测算，把这部分能够真正实现起来，可能有0.1甚至更多一点儿的总和生育率的提升。”

低生育率、低增长或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不仅是中国也是全球在21世纪将要面临的挑战。郑真真认为，中国人口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高速增长转变至即将到来的负增长，这种“压缩”式的变化发生在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无疑会带来更大的冲击力，“人口负增长将是中国的人口现实，未来其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家庭的影响，都不可低估并应及早准备应对。”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三孩来了：形势与应对](#)

版面编辑：边放

随笔 | 君子如玉：忆郭宏安先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1月30日第04期

我清楚记得他说，“好久不出国了，要选个好季节，再去法国，否则就真走不动了。”我说，那我就等着在巴黎机场接你们啦。老郭送我到门口，我们相拥相约，法国见。望着满脸微笑的老郭，谁能想到，这竟是永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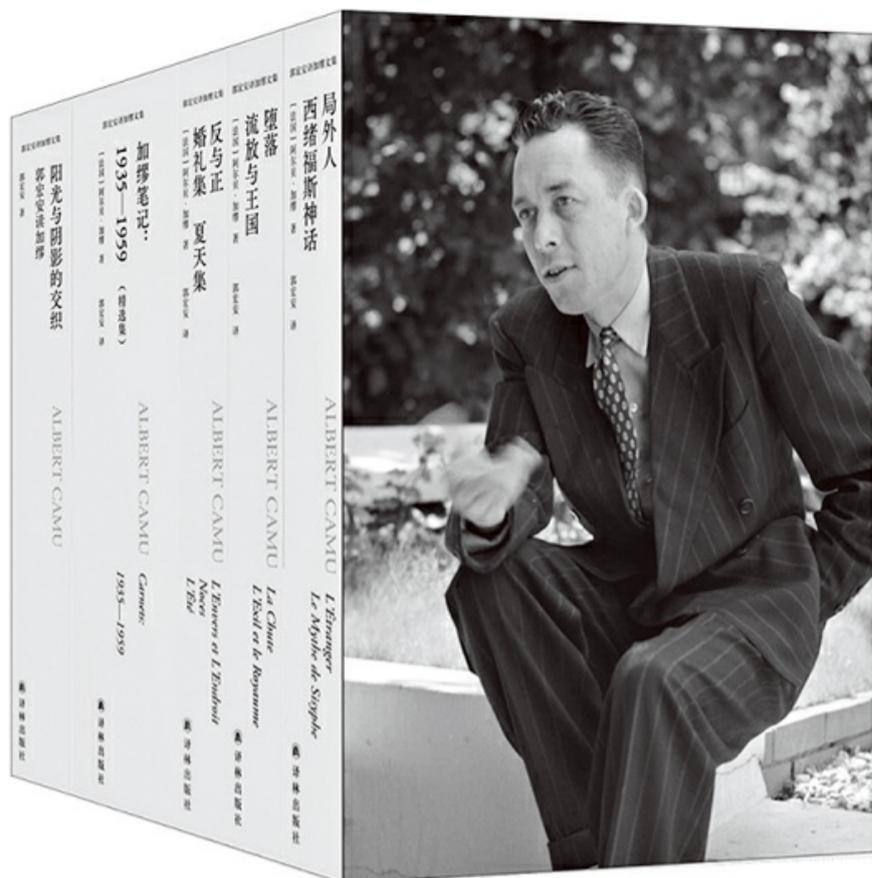


1991年年初，本文作者赵越胜（右）、郭宏安（中）、陈力川（左）在巴黎寓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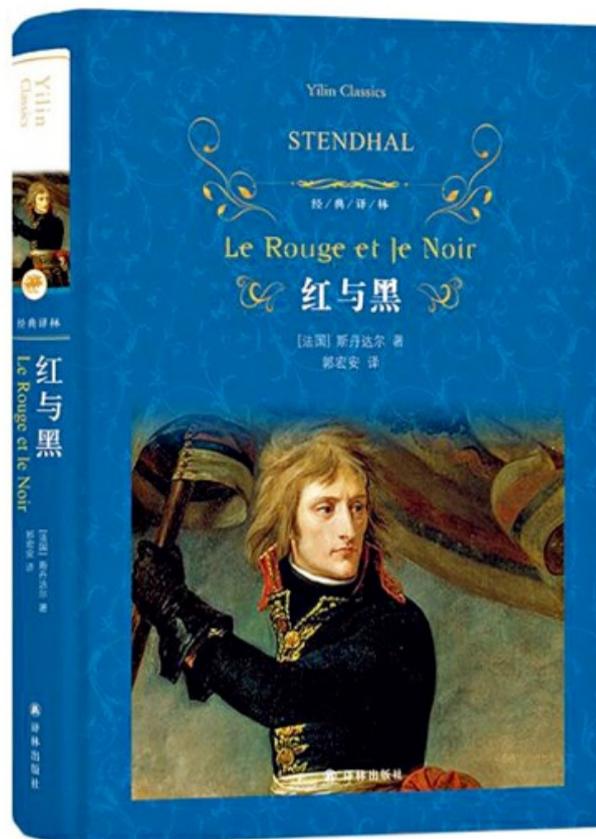
文 | 赵越胜
旅法学者、作家

去年12月初，京城疫情暴起。我惦念北京的朋友，14日早起就拨打电话询问，第一个电话就打给老郭，是他接的。话筒中的声音如往昔一样的从容淡定，说和嫂子两人五天前就“阳了”，现已“阳过”，发了几天烧已退了，只是稍咳，胃纳尚可。他不断重复，没事儿，没事儿。听起来平静乐观，反嘱我在法国要当心，说看报道法国的疫情严重，人心恐慌云云。感觉他的状况真是不错，就放下心，一直再未同他通过消息。今早，蒙眬中听雪说，“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要做好准备，别太伤心。老郭走了。”呜呼！老郭走了，老郭不在了，这怎么可以？！天丧斯人，天丧斯文啊！

我与老郭相识近四十年，在我心中，他是斯文儒雅的象征。说话低声细语，嗓音圆润如玉，嘴角总挂着一丝微笑，双眼满溢着善意。只在陷入沉思时，才流露出冷峻与迷惘的目光。他待人谦和宽厚，极少臧否人物，偶涉评鹭，也不离术业，惟语涉文学，才显出抑制不住的激动。若谈及他挚爱的作家，夏多布里昂、波德莱尔、蒂博代、加缪……抑或谈及他欣赏的文学人物，于连、包法利夫人、阿达拉、西穆尔登、小王子……他会举杯顶礼，浮一大白。其实，外表谦和儒雅的老郭，内心炽热奔放，只是这炽热绽放在《恶之花》的美艳中，宣泄在西西弗斯的执着上，体现于勒南面对雅典卫城的虔敬，栖息在夏多布里昂絮语的墓畔。老郭内心丰盈的情感之流，汇入他所爱的文学大海，它足够浩瀚，能让老郭昂首徜徉。我想这就是老郭推崇斯塔罗宾斯基“自由的批评”的缘由。在没有自由的地方，我们来创造自由。



《郭宏安译加缪文集》（共五卷），阿尔贝·加缪著，郭宏安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6月文集还收入郭宏安研究加缪的文章结集《阳光与阴影的交织：郭宏安读加缪》



《红与黑》，司汤达 著，郭宏安 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10月

我与老郭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末，《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活动中。一次，甘阳要阿坚组织编委会的集体郊游，地点选在密云水库边的红山口村。我帮阿坚操持安排，在聚餐时，我看到了老郭。他见我忙着张罗饭菜，便举一举手中酒杯向我致意，脸上挂着迷人的微笑。旁人在忙着吃，他却看到了我在忙。我也看到他，好一位儒雅蕴藉的君子。走上前去和他打招呼，他自报姓名，郭宏安。这名字我知道，因为甘阳当时组织编委会时说，搞外国文学的人，非请郭宏安不可。但老郭当时在做什么，我一点不知道。谁知老郭对我说，“你评《白轮船》的文章我看了，非常喜欢。我也搞点文学评论。”他说的是我发表在《读书》上的文章《纯洁的自杀》。我当时有点疑惑，老郭不是搞外国文学的吗？那时，我浅薄，对老郭学问的博大精深一无所知。但显然，我们有缘分。他或许喜欢我的文章，而我却喜欢他这个人。

后来慢慢知道，老郭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文革”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文系获硕士学位后，一直没离开社科院外文所，我在哲学所，我们也算是同事。



晚年郭宏安。

郊游结束后返程，阿坚恶作剧，弄了几部手扶拖拉机，送编委会的人去密云火车站乘火车返京。我和老郭上了同一台车，在乡间土路的颠簸中，我和老郭聊天，只记得他告诉我，他也会开手扶拖拉机，是在农场下放时学的。我这才明白，他年长我许多，是老大学生。虽然我们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只差一级，但他绝对是我的兄长。甫一相识，就称他老郭，结果这没大没小的称呼竟延续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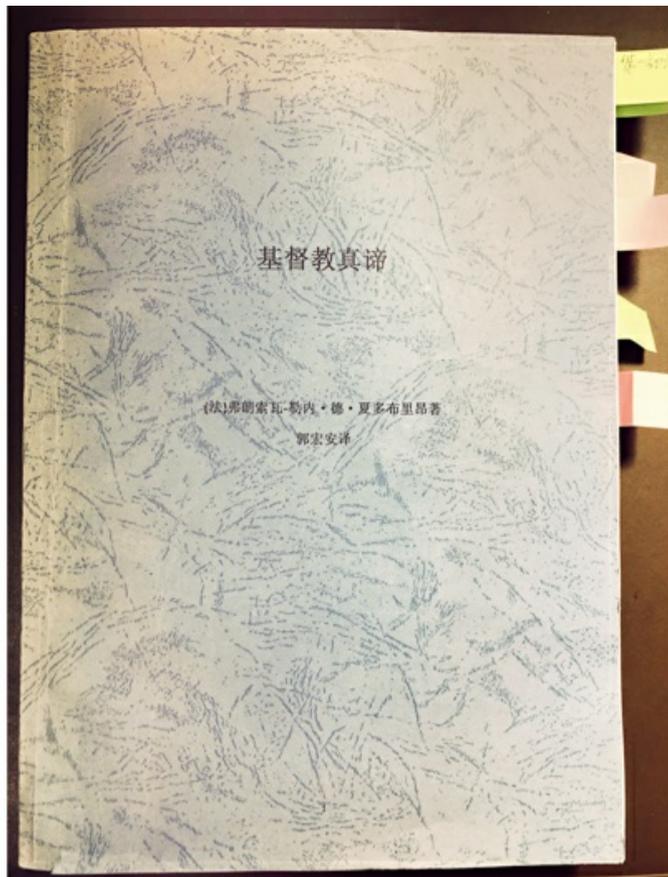
1989年中，老郭到了法国。我在年底也到了法国。想不起来我们是怎么联系上的，但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只是这次是在异国他乡。他当时住在圣叙尔比斯教堂旁的一间公寓里。我初到国外，难免落寞，老郭对我好言相慰。可惜，我们见面时，他的访问期就要结束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回国，我一早送他去机场，一路无语。他告我，不久他会再来法国。果然年底他就回来了，这次是携夫人同行。

我当时在法国稍稍安顿，老郭这次来，我们能在新租的小公寓里请老郭吃饭。那天已在法国的力川也来了。有朋友在身边，心里总觉温暖。这次老郭带来他出的第一部书《重建阅读空间》，题赠给我和雪，这是我在巴黎拿到的第一部与文学有关的书。毫不夸张地说，我是如饥似渴地读老郭那些文字，它似乎为我打开了研读法国文学的新视角。我最喜爱老郭对建构新阅读空间的那些思考，他以张岱《西湖七月半》中“五类看月人”为例，阐发阅读之心态和境界，立意高远，比喻绝妙。但最让我感动的是老郭送我的另一份礼物，六盒侯宝林相声精选磁带。老郭带着他那永恒的微笑对我说，“心情不好时，听听侯宝林。”三十多年过去了，虽说现在连听磁带的机器都已罕见，但老郭送的这六盒磁带，我一直珍藏着。有它在，老郭带给我们的欢乐和温暖就一直陪伴在身边。

我最终定居法国，老郭却仍然来往于中法之间。后来我有了自己的房子，老郭会在我这里歇歇脚。老郭是力川的老学长，而力川是法国红酒专家，与老郭见面，他总会带来上好的法国红酒。可老郭这个浸淫法国文学多年的人却永远喝不惯红酒，他爱喝两口，喝的却是中国白酒，尤喜二锅头。那天力川带来的法国美酒，老郭尝后也只是说了句，“有点儿不一样。”那天我们喝酒谈天，兴会淋漓，说好第二天早起去参观夏多布里昂的故居狼谷，现在那里已是夏多布里昂纪念馆。就在这里，夏翁完成了大部分《墓中回忆录》的写作。这部书是老郭的最爱，他曾选译过一部分。我曾问他为何不全译。他说这书篇幅太大，他抽不出时间来译，所以只选了一些和文学创作有关的章节译了。

或许那天酒喝多了，又睡得晚。第二天雪驾车带老郭去浪谷，待要买票时，发现自己竟然没带钱包，而老郭伉俪也是两手空空。这场面够让人尴尬的。雪情急之中，向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老郭，说他是法国文学研究专家，夏多布里昂著作的译者。一定是老郭温文儒雅的态度让人信服，工作人员不仅让他们免费参观，还听了一场精彩的专业讲解。

近些年，老郭出国走动少了。虽然每次电话中都相约在法国相聚一游，但毕竟岁月不饶人，于是，电话交流就



由郭宏安翻译的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基督教真谛》打印稿。

2019年，大疫前我最后一次回京。3月10日一早，拨通了老郭的电话，是老嫂子接的。我说要去看老郭，嫂子埋怨我，为什么不早打电话，让她做点准备。我说，又不是去搞对象，有什么好准备的？老郭接过电话说，来吧，来吧。坐地铁直达美丽园，上楼后一时恍惚，忘记老郭家在左手还是右手。正犹豫间，见右手的门微开，想是老嫂子的“准备”。叩门进屋，见老郭站在客厅中央，熊抱过后，一眼就瞥见熟悉的场景，玻璃茶几上摆放着一摞书，是六册《波德莱尔作品集》，加一册老郭的《论“恶之花”》。每一册的扉页上都已写好题赠，书籍装帧精美，让人忍不住想摩挲把玩。这次我特意给老郭带去一瓶上好的圣埃美隆特级酒庄的红酒。我跟老郭说，年纪大了，烈度的白酒要少喝啦，红酒养身，可每日小酌。老郭摆手说，不喝了，不喝了。我们坐在晒台改装的阳光房里，品茗闲谈。茶香伴着温馨的话语，弥散在这温暖的方寸之间。那天老郭看上去状态极佳，面色红润，精神矍铄。我清楚记得他说，“好久不出国了，要选个好季节，再去法国，否则就真走不动了。”我说，那我就等着在巴黎机场接你们啦。在老郭家坐了很久，谈了很多，直到下午方起身告辞。老郭送我到门口，我们相拥相约，法国见。望着满脸微笑的老郭，谁能想到，这竟是永诀？

时代迁化，世事流转，人们只见邪恶张扬，良善匿迹。但就有磨灭不掉、摧残不尽的一小伙人，饥渴般地向往美善之事。正如老郭在《论波德莱尔》中所说，“《恶之花》是伊甸园中的一枚禁果，只有勇敢正直的人，才能够摘食并且消化。他们无需等待蛇的诱惑。”这是老郭的夫子自道吧。老郭极爱《恶之花》，因为这个恶mal是相对于空虚、无聊、伪善、冷漠、残忍的美之形态，它要给无意义的生存启明意义。“恶之为花，其色艳而冷，其香浓而远，其态俏而诡，其格高而幽。它绽开在地狱的边缘。”以探求美之真谛为己任的老郭，便绝然担起这下地狱的重担。我愿录周梦蝶先生的一阕诗，奉献于老郭的灵前，伴他天路旅程：

让风雪归我，孤寂归我
如果我必须冥灭或发光——
我宁愿为圣坛一蕊烛花
或遥夜盈盈一闪星泪。

老郭曾送我一部他的散文集《雪落在莱蒙湖上》，但今年巴黎暖冬，未见飘雪，阴雨绵绵，无日无休。许是上天下悯苍生，不愿用洁白掩饰暗黑。但这淅沥冬雨不恰是我们痛悼挚友远行的泪滴吗？

版面编辑：边放

专栏 | 百年前美国人看“五四”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1月30日第04期

美国知名驻远东记者密勒指出，塔夫脱关于山东问题的言论令人错愕又厌恶，是荒谬而卑劣的，而且缺乏事实依据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北京的爱国学生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图：视觉中国

文 | 王笛

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

虽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了，当年美国人怎样看待、美国媒体如何报道这场运动，我们并不清楚。近些年，我之所以花时间研究这一课题，便是想从中获知美国社会和政府当时的对华态度。

“五四”过后不久，《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中国学生罢课》的文章，系统讲述了学生“五四”罢课的来龙去脉，并分析了事件的起因：“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充分暴露了日本的扩张野心，“是破坏世界和平”的行为。中国学生认识到日本的危险性，但他们无能为力，因为政府太软弱，无法拒绝日本人的要求。中国人希望通过巴黎和会来改正中国所遭受的不公，但和会不仅没有宣布“二十一条”无效，反而让日本承接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中国政府好像没有抵抗的决心”。

同期，《纽约时报》也发表文章，指责日本“讹诈得到山东”。文章指出，在青岛永久的“租借特许权”，是与日本占有青岛铁路执法权相结合的，这条铁路贯穿山东的中心，使日本完全控制了全省的经济和政治。美国经济和政治专家对事实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后，向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提出了书面报告。美国海军和军事专家也表达了对日本控制青岛的港口和铁路的担忧，指出“这将严重损害中国的防御安全，也对美国在亚洲的整体战略地位有不利影响”。

文章驳斥日本所谓山东是其对“一战”的贡献应得的补偿的论调，认为“日本从来没有在战争中给予盟军任何帮助”，即使向美国提供船只使其能向欧洲增援，这些船却在很大程度上经不住海上风浪，最终于事无补；而且每次提出向欧洲派一些部队，“日本不是找借口说做不到，就是要求补偿”。反观中国，提供了约20万劳力，成千上万的人死在欧洲，却没有从盟国得到任何帮助。日本还宣称，为了促使日本参战，“英国向日本保证其会获得德国在山东的权利。”

根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报道，北京英美协会（Peking Anglo-American Association）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巴黎和会上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条款”。该协会是外国人在华北最有影响的代表机构，包括大量的外交人员、政府顾问、记者、商人、金融人士、传教士以及外籍教师。协会呼吁英美政府，山东问题的决定不仅不公平，对世界和平和远东政治秩序的稳定也是非常不明智和危险的。它指出，这是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经济利益发展的严重阻碍”。决议指出，通过秘密条约、政治侵略甚至战争解决国际争端，对新的国际秩序并无作用。该协会对于在巴黎和会上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交给日本，“感到强烈的失望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

美国前总统塔夫脱曾为对日妥协进行辩护：威尔逊有充分理由在巴黎和会上放弃中国，否则将会被日本拖入战争。1919年7月《芝加哥论坛报》披露，美国知名驻远东记者汤姆斯·密勒（Thomas F. Millard）给塔夫脱写了“言辞尖锐的责难信”，指出前总统关于山东问题的言论“令人错愕又厌恶”，对中国的做法不仅是“荒谬而卑劣的”，而且“缺乏事实依据”。密勒质问塔夫脱：你的论调为威尔逊“提供了在巴黎和会上抛弃中国的理由”，这种观念的发布和传播“都将使美国政府蒙羞”。如果你的言论传到中国，“毫无疑问会被日本的反西方宣传所断章取义”，会煽动民众将仇恨情绪“发泄在美国人身上”。如果任何人因此“失去生命，财产被破坏，那么你就无法逃脱你的责任”。密勒还指出，在中国的各个美国组织，包括美国协会、美国商会、传教机构、美国女子俱乐部、美国华北商会等等，通过在北京的美国使馆，“纷纷致电总统，表示对山东决议的抗议”，塔夫脱实际上也“冒犯那些在华的美国人”。密勒20

世纪初期研究远东局势的著作《亚洲的决裂：1909年前远东的兴衰》近年在中国翻译出版。

1919年《大陆月刊与西部杂志》在讨论“怎样才能帮助中国”的时候便指出，国际因素的确“加重了中国的问题，但不是主要原因”。文章明智地看到：“总统替换皇帝不能在一天甚至在一代人之内改变中国的传统。”在“一战”中，欧洲列强的势力在中国衰弱，而“北京政府却无法利用这个间隙获利”；中国本应该运用“一战”之利，但是“却陷入内战的泥潭中”。当时中国内部纷争，对在巴黎和会上争取自己的权利是非常不利的。参加凡尔赛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南北势力都有，王正廷是南方代表，与北方政府代表顾维钧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分歧。

今天我们来看当年这段历史，其实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须是真正代表了中国人民及其利益，否则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

版面编辑：边放

专栏 | 靠棚屋获永久地产权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1月30日第04期

根据英国的“占地者权利”，只要在长久废置的荒屋内住上足够长时间，就能合法获得该地产的永久所有权。哈里因此赢了官司



哈里·哈洛斯（Harry Hallows）和他的住所。

文 | 王梆
作家

有部浪漫电影叫《汉普斯特德公园》（Hampstead），讲一个美国寡妇如何爱上伦敦隐士的故事。电影中，那位藏身伦敦汉普斯特德街区公园野生树林的隐士老哥，蓄着鲁滨逊式的大胡子，在一栋杂木搭建的小木屋里，过着捕鱼饮雨、拾柴取暖的返朴生活。养尊处优的美国寡妇如何撞入密林深处，并爱上这位“云深不知处”的隐者，不是我关心的重点，因为我知道这不过是造梦者用电影的景深和梦话编织的一段虚拟黄昏恋；我关心的是，你若在威尔士深山或苏格兰高地某旮旯角搭个违章棚子，鼯鼠一样钻进去住也就算了，但怎么可能在伦敦？进一步说，怎么可能在汉普斯特德？

话说汉普斯特德离伦敦市中心只有4英里，离著名的青年亚文化和世界主义购物中心卡姆登大街只隔一道狭窄运河。每次去卡姆登看涂鸦，吃来自世界各地的烧烤和料理，买最具有挑衅性的T恤，我一定会顺道去汉普斯特德，因为它就在卡姆登的西北部。汉普斯特德是伦敦著名的凭吊胜地，沿着它的高街漫行，目光所及之处，动辄就是D.H.劳伦斯、乔治·奥威尔、弗洛伊德等人的故居。多年以来，它丰饶的文化史，风格多元的建筑群，以及那芬芳的绿荫小径，令它扛住了时间的腐蚀，活成了一本精美而立体的日历，因此地价自然不菲。2022年，这里的平均房价是137万英镑，一栋三四居室的联宅接近300万英镑。隐士老哥搭棚子的地方虽是一小块密林，若进入今天的市场，少说也得300万英镑。

神奇的是，黄昏恋是虚构的，隐士老哥却真有其人，名叫哈里·哈洛斯（Harry Hallows），是一位爱尔兰游民。1986年，他被房东驱逐出门后，就净身钻进了汉普斯特德街区公园的野生树林。他在一栋只有半堵砖墙的废墟上加石棉瓦，并用捡来的旧玻璃窗和木门，搭建了一个小家。从1986年到2005年，他钓鱼，种菜，拾荒，太阳能发电，过着今天无数青年梦想的off-grid（脱离电网）生活——直到2005年3月，一个立志于将维多利亚建筑改造成奢华公寓的地产公司，因获得地方政府的征地批准要将该树林征为商用，隐士才被发现。

换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我们恐怕就只能为这位老哥的命运感叹了。但这里是英国，英国人秉承的罗宾汉式的劫富济贫的精神，以及华兹华斯式的对大自然的狂热，令当地居民立刻结成联盟，不仅反对地产公司的征地计划，也反对针对哈里的驱逐。意外的是，即使没有当地居民的反对，这位隐士老哥也不会被驱逐，因为根据英国的“占地者权利”（squatter's rights），只要在长久废置的荒屋/荒地内住上足够长的时间，就能合法获得该地产的永久所有权。2007年，哈里赢了官司，法院将他栖息范围内的半英亩地全判给了他。2016年，哈里去世，他把这块地捐给了英国两家流浪者救助机构。

在英国，自1977年起，“占地者权利”曾为像哈里那样的无家可归者建立了与荒屋和野地的联结。2012年之后，该权利的界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荒屋被排除在外，必须是“非住宅区（谷屋、茅屋、仓库、野地等）”才算数。尽管截至2021年，英国仍有近30万荒屋，68%的英国人依然认为这些荒屋应用来缓解日益增长的露宿问题。

今天，只要在非住宅区内住满10年（未经登记地产需12年）以上，其间能够提供连贯有效的居住证明（邮件地址、水电账单等），并做好料理和修葺工作，且从未被原业主发现并驱逐，就能申请该地产的永久所有权。当然，申请前，占屋者必须向地产登记中心呈递申请表；登记中心会立刻与原业主取得联系，原业主有65天时间对此申请作出表态，并必须提供足够证据显示“驱逐该占屋者将不悖于道德良心”，才能终止该申请。

可见，通过这种方式取得地产权，不是说一点难度没有，但也没有偏向虎山行那么难。不敢尝试这条路的，还可以走另一条。我认识的一对年轻夫妻，双双为高科技产业员工，凭一台电脑就可以生活，且早早就在郊区购置了一套带小花园的两居室。但二人的共同志愿却是努力还贷，尽早退休，依林而居，养鸡种菜。其实，根据网上各种攻略，他们只需要买块林地，趁夜黑风高，以林叶障目，在里面建一间木屋，住满4年，其间当地政府若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喝令其拆除，那么他俩就即刻拥有了该地的合法居住权。此外还有一条岔道，他们可以买一块农业用地，写明作农场用，养鸡畜牧，耕种农田，同时修建畜棚或谷仓，从修建之日起，便可合法居住在畜棚或谷仓旁的移动住宅里（比如房车）；10年之后，便可将畜棚或谷仓改造成合法的永久住房了。

18世纪美国政治家詹姆士·奥蒂斯说，房子是一个人的城堡，只要他足够安宁，他就应被当作城堡的王子来保护——英国法律给出了漂亮的注解。□

版面编辑：边放

科学 | 鸽子，流变与归巢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1月30日第04期

人类在几千年前就发现鸽子有归巢能力。这种神奇的能力一直在帮助我们，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归巢鸽曾出色地完成了许多不可能的任务



人类在几千年前就发现鸽子有归巢能力，它们即便被带到很远的地方都能想办法飞回去。图：视觉中国

文 | 小庄
科普作家

“在中国，流行着一个奇特的习俗，让乐器收藏家们很感兴趣。每天早上，北京各银行代表的会议上会调整铜钱和银两之间的汇率。归巢鸽被用来分发这些每日报告，报价被拴在它们的腿上，而不是用电报或电话通知结果。以小葫芦或竹子做成的哨子插在鸽子的尾羽之间，鸽子被放出后，直接飞向它们所属的不同银行。哨子常被雕刻成动物头的形状或其他有想象力的造型，表现为一列并排放置的管子，每个管会发出不同的音。”

这是一段刊登在1905年10月《宾夕法尼亚博物馆公报》（*Bulletin of the Pennsylvania Museum*）上的文字，描述了清末老北平前门的标志性一景，即信鸽报汇率。全城的钱铺、粮栈及各行各业的大型商号都要到钱市胡同参加交易，当时住在大栅栏附近的人们总能在清晨时分，看到几百只鸽子从这条狭窄的胡同里飞出去，很是壮观。

作为很早就进入了中国古人生活的一种鸟类，鸽子在《周礼》中便已被列为“六禽”之一。驯养鸽子、以飞鸽传书的可靠文字记载最早出现在唐代，而鸽子身上佩戴的乐器——鸽哨——也是宋朝即已盛行，南宋诗人范成大曾为之写下了“巷南敲板报残更，街北弹丝行诵经。已被两人惊魂梦，谁家风鸽斗鸣铃？”的诗句。当鸽群在天空盘旋，流淌过哨子的空气会发出和谐的声音，奏出一支空中交响曲。到了清朝中后期，老北京的鸽哨制作曾是民间一绝，只不过随着鸽群消失，如今已悉数成为博物馆的展品。鸽哨技艺于2014年被正式收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尽管如此，这种独特的声音装置仍然引起了现代声音艺术家的兴趣。一位叫纳撒尼尔·曼（*Nathaniel Mann*）的英国作曲家，便从牛津皮特河博物馆收藏的中国鸽哨获得灵感，尝试用35毫米胶卷筒、冰棍棒和旧唱片等回收材料进行仿制，并找来一位鸽友彼得·佩特拉维修斯（*Peter Petravicius*）合作。2013年，他们在Audible Forces音乐节上进行了首演，让一群佩戴着鸽哨的鸽子从特伦特河畔斯托克的上空飞过。在场的人们纷纷被头顶这片华丽的交响所震撼，有一位女士甚至发出感叹，称“这是我所体验过的最接近天堂之事”。

19世纪的英国人也曾经历过一个养鸽子的黄金年代。不过当时当地，受宠的不是能够高飞远徙的归巢鸽（*homing pigeons*），而是有着多变外表的花式鸽（*fancy pigeons*）。维多利亚时期的鸽展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奇特鸽子著称，在规模上丝毫不亚于狗展。上至王室贵族，下至矿工小贩，无不投入了对花式鸽进行培育的狂热。其中有一名勤奋的鸽友，可谓非常成功，他的养鸽成就更被载入了科学史册，此人便是著名博物学家、演化论的奠基者查尔斯·达尔文。

达尔文大约从1856年开始在自己家的别墅花园中饲养鸽子。他费尽心机买来了短面翻飞鸽、球胸鸽、凤颈鸽、扇尾鸽等各种不同品种开始繁育，并把这项工作当作重要的人工选择实验。他在上面投入了相当多时间，阅读其他人写的手册和书籍，以学习养殖方法，还会去参观展览，并努力结交有经验的育种人。

他在1859年11月27日写给朋友托马斯·赫胥黎的信件中写道：“关于育种，我不知道有哪本书。我对罗威的评价不高，但我可以说没有比他更好的。我认为尤厄特是一个更好、更实用的权威，但他的观点和事实分散在三四卷厚的书中。我通过阅读大量的专门论文和所有的农业和植物学杂志获得了大部分信息；但这是一项长年累月的工作。困难在于要知道我去相信什么。一两个主张不值得信；事实是如此复杂。我希望并认为我在这个问题上的陈述是真

正谨慎的，尽管我所提供的一切都太简单了。我发现与鸽友和育种者的交往非常重要。比如，有一天晚上，我坐在博罗的一个豪华酒店里，和一群鸽友在一起，当时有人暗示布尔先生用他的球胸鸽和犬种家鸽杂交以增加体型；如果你看到所有鸽友对这一可耻行为所表现出的严肃、神秘且可怕的摇头，你就会认识到杂交对改良品种的作用是多么微乎其微，以及这一过程会给后面的世世代代带来多大危害。这些要比书上几页单纯的陈述生动得多得多。”

写这封信的前三天，正是达尔文那本彻底颠覆了同时代认知的经典著作《物种起源》（全名《论借助自然选择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族的物种起源》）出版的日子。在《物种起源》第一章“家养状况下的变异”中，鸽子就被反复提及。达尔文相信，所有鸽子起源于一个共同祖先，尽管它们的性状差别如此之大，但通过育种过程，可以清晰地发现，所有这些差别都可以通过变异得来，“每一品种那主要赖以区别的性状都是显著容易变异的，如传书鸽的肉垂和喙的长度，翻飞鸽的短喙，扇尾鸽的尾羽数目。”演化论鼻祖在鸽子身上所付出的努力，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1868年出版的另一部洋洋巨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这本书有近千处提到了鸽子，以至于有人提出，在其理论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达尔文鸽应该处于和达尔文雀一样重要的地位。

达尔文在鸽子身上提出的一些疑问，也依然激发着当代分子遗传学的发展。比如，翻飞鸽的短喙曾让他迷惑不已，因为该品种的喙已经短到了妨碍亲鸟给幼鸟喂食的地步。这固然是人工选育导致的悲剧，可它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2021年，发表在《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上的一篇文章中，来自犹他大学的生物学家团队终于在家鸽的基因组中精确捕捉到了ROR2——这个基因所发生的突变与很多鸟的短喙相关，甚至还和人身上的一种遗传性疾病即胎儿面容综合征（Robinow syndrome）相关，具有这种遗传缺陷的人类同样会出现面部发育异常。

时至今日，花式鸽培育仍然是一小部分人的爱好，只不过其风靡程度和维多利亚时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反而是归巢鸽培育，由于赛鸽亚文化长盛不衰，成了相对更热门的领域。那些能在长距离飞行比赛中胜出的鸽子，可以卖到非常高的价钱。2019年3月，一羽名为阿曼多的明星赛鸽在线上拍卖中，以125万欧元被一位神秘中国买家买走，打破了此前一羽名叫纳丁的赛鸽所创下的37.6万欧元的纪录。

人类在几千年前就发现鸽子有归巢能力，它们即便被带到很远的地方都能想办法飞回去。这是一个很有用的特征，很早就被用到了信息传递中，如在古代奥运会上让它们去宣布获胜者，也因此它们被称为信鸽。赛鸽运动同样利用了这一点。

鸽子是如何认巢并返回的？这一问题涵盖了生物学上的许多未解之谜。研究人员的共识是它们具有“指南针机制”和“地图机制”，前者针对定位，后者针对确定目标地点，但关于这些机制怎样发生，还存在很多争议。比如，有的研究认为这是鸟类能够探测地球磁场，有的研究认为鸽子会利用大气中气味的空间分布，还有的研究认为它们和人类一样通过道路和其他地标特征来认路，甚至也有研究发现信鸽会使用低频次声波进行导航。此外，光照和重力等因素也被发现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无论如何，这种神奇的能力一直在帮助我们，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归巢鸽曾出色地完成了许多不可能的任务。

法国军队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依靠鸽子传递了上百万条信息，所以“一战”初期，他们早早进行了鸽舍部署。1914年第一次马恩河战役，英法联军成功地挡住了德意志军队的进攻，鸽子可谓功不可没。普法战争后不久，1878年，美国陆军信号兵团从费城购买了12只信鸽，并将这些鸽子运往西部，交给在蒙大拿州基奥堡指挥第五步兵团的纳尔逊·迈尔斯上校去繁育训练，此后他们对归巢鸽的研究一直时断时续。

1917年，美国陆军找到了两名非常适合和鸽子一起工作的军官，便开始向法国战场派遣鸽子连。要知道，当时的通信还是依靠埋地电缆连接的电话，十分不便。无线电台是在战争后期才发展起来的，并且发报装置十分庞大，携带不方便。和它们相比而言，鸽子要灵巧机动得多。但是，鸽子也会面临特有的威胁——德国机枪手随时准备着射杀天空中飞过的一只鸟。

美国陆军信号部队在“一战”期间总共雇用了约600只鸽子，其中一只叫雪儿·阿米（Cher Ami）的黑格纹公鸽成为拯救大兵们的英雄，这就是2001年被拍成电影《幻影奇兵》的“迷失营”（*The Lost Battalion*）的故事。1918年10月2日，美军第77师在阿尔贡森林中走得太远，被困在了山坡上，接下来数天内和人数、武器都占优的德军对峙，并且还遭受到了己方炮弹的侵袭。由于被切断了供给和通信，这些士兵只能把与外界取得联系的希望寄托在所携带的鸽子身上。他们一只只地送出去，却又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它们挨个儿被射死。雪儿·阿米于10月4日放出，起飞后不久就被击中了胸部。尽管如此，它依然顽强地回到基地，把被困部队的位置带给了援军，代价是自己的一条腿和一只眼睛。接收到信息之后，美军炮兵调整了攻击坐标，以协助第77师突围，最终554名士兵中有194人活了下来。事后，法国军队授予它最高军事荣誉之一“十字勋章”。

1919年6月13日，雪儿·阿米在新泽西州的蒙莫斯堡去世。它的尸体被制成了标本，陈列在史密森尼历史博物馆中。



摄影、撰稿 | 芮兰馨（特约）

新成昆铁路近期全线开通，半个多世纪前在中国西南的险峻山川间修成昆铁路的工人也已届古稀耄耋，但往事仍历历在目

2022年12月26日，新成昆铁路正式全线通车，使得成都到昆明的时间缩短至8小时内，比老线快了1倍有余。虽然160公里/小时的设计时速在习惯了高铁速度的人们看来并不亮眼，但铁路线经过的却是上世纪50年代曾被苏联专家定义为“铁路禁区”的地方。成昆铁路穿过横断山脉，深入大凉山，有四五百公里处于地震带，地质灾害频繁。老成昆线全长1096千米的铁路线，由于路经地质复杂的山地，桥梁隧道就占了全线接近一半长度。新成昆铁路已用特长桥隧代替了这种方案。



📷 普雄车站附近，草丛中堆放着废弃车头和设备，成为附近孩子们的乐园。

成昆铁路是“三线建设”至关重要的交通线。由于路经区域的攀枝花煤矿等资源点，铁路线在当时被赋予了经济和国家战略的意义。1958年，成昆铁路开始动工，因各种原因中断数次，1964年才正式大规模兴建，采用从两头往中点同时推进的方式。昆明到西昌由18万铁道兵负责，成都到西昌则是由原西南铁路局（后拆分为铁二局和铁五局）的17万工人修建，1970年，双方在西昌礼州完成接轨通车。



📍 乐山的“二老工人”每个季度都会有一次雷打不动的聚会，关心彼此近况同时也回忆往事。左起曾国华、黄聪贵、张启斌、毛安华、张金春、翟洪剑、卢福全。

在铁路系统内部，通常把成渝、宝成时期，即上世纪50年代参加铁路修建的称为“一老工人”，把1964年至1966年参加铁路修建的称为“二老工人”。成昆铁路的这17万“二老工人”如今少有的在世者都已年届古稀耄耋。如今，沿途险峻的地理空间，已被现代技术的时间折叠。但新的铁路工作者们仍会感叹，60年前，几乎没有机械化的条件下，当年的铁路工人是如何建造这条铁路的。对于这些垂暮的工人而言，关于这条铁路线的记忆，也牵引着他们与大凉山的时空一次次重逢。

不变的聚会

为避开正午的酷暑，2022年8月的一个清晨，七位铁路工人早早到了他们的“老聚点”——乐山老城区的一家农家乐。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年的3月、6月、12月的7日以及9月6日，是乐山的“二老工人”的聚会日，几十年来从未间断。聚会除了关心彼此近况，最重要的内容总离不开成昆铁路上的往事。

1964年9月6日是他们离开乐山上成昆铁路的日子。工人们描述初进凉山的记忆时，总最先提起陌生而险峻的山水。“第一次是坐汽车进去，路很窄，一边是大渡河，一边是悬崖峭壁，山像刀劈下去的一样，不敢往下面看。”张金春回忆道。



📷 聚会时，翟洪剑与周启林回忆起铁路修建时的往事。

张启斌和毛安华都是隧道工，俩人一边相互校对自己记忆中的细节，一边用手比划着河流、山洞和桥梁的位置关系。最初去的隧道点在苏雄，工人们在牛日河旁住下，“晚上在河边睡觉，刚开始睡不着，只听得见像要吃人的水声。”修建前期，并没有大型机械，隧道是工人先一锤锤敲出炮眼，放入炸药爆破，再慢慢往里推进。张启斌回忆，每天有100多人从不同的坑道位置进入洞中打隧道，这是公认最苦也最危险的工种。黄聪贵做过的工种多，最初是隧道工和爆破工，后来浇灌混凝土，虽没有那么危险，但却是最脏的活儿。

前些年身体还好时，卢福全曾与工友们结伴回到凉山，想找寻几十年前在那结识的彝族旧友。卢福全是成昆铁路建设工程的汽车司机，几乎跑遍了全线。张启斌和毛安华说卢福全和张金春是“幸运”的，进入西南铁路局后，二人就被分配在西南技工学校学技术。卢学的是驾驶，一直到退休都负责开车。“所以现在他身体比我们好些，没有吃打洞子的苦。”毛安华玩笑道，从进了洞开始就“昏天暗地”，出洞后全身漆黑，只看得到眼珠子在转。

但在大凉山里开车也充斥着危险，沿着铁路线只有简易的“施工便道”，贴着峭壁的路仅有几米宽，塌方和翻车时有发生。据工人们回忆，光是掉进大渡河的车就有几十辆。有从北京来支援三线建设的车队，司机们都没见过这样的地形，被乌斯河和峭壁吓得开不了车，几个月后只好回去了。

“越穷的地方，上铁路的越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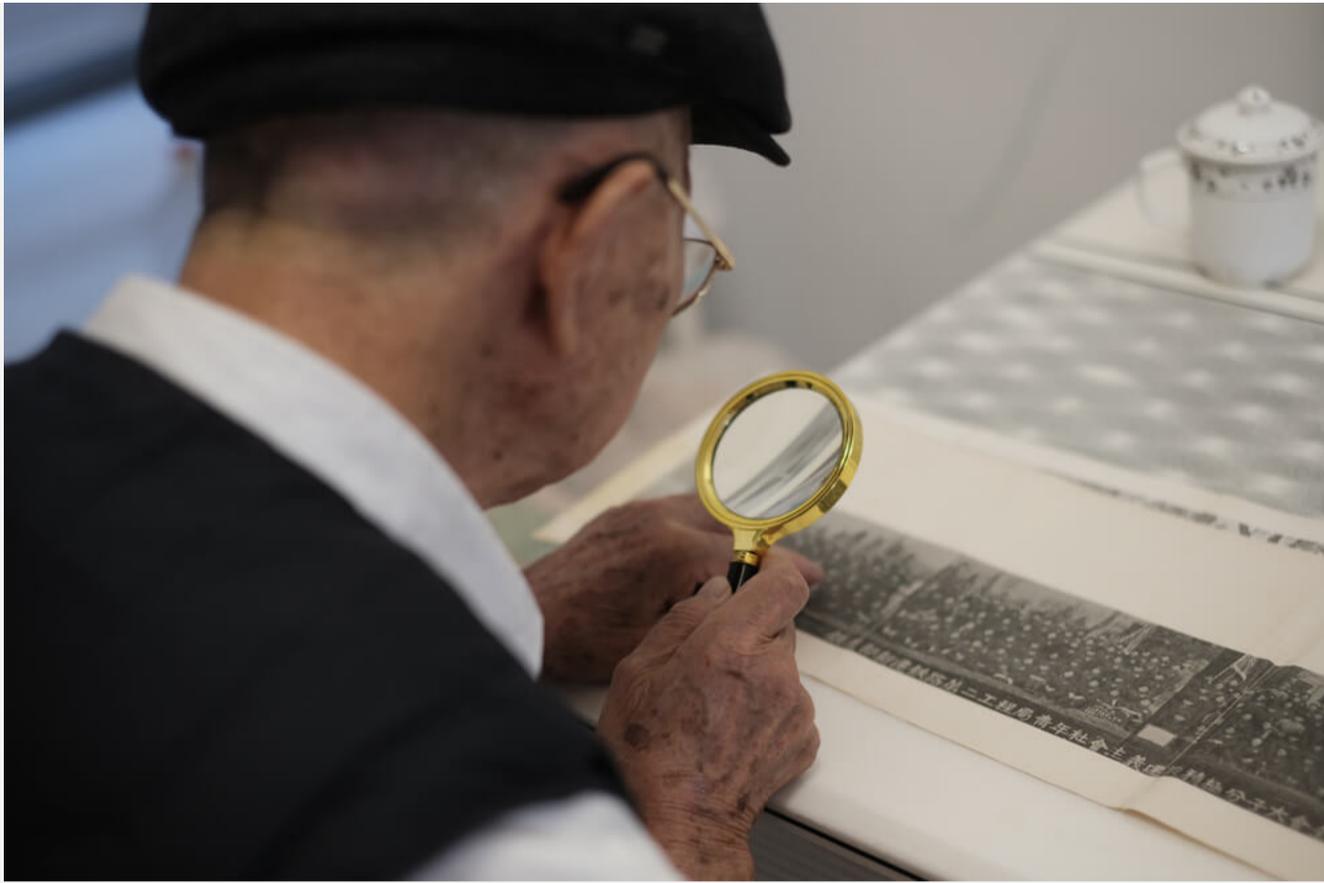
最令工人们惧怕的是泥石流。杨明建曾是成昆铁路的物资管理员，他时常回想起1968年夏天亲眼目睹的一场惨烈灾难：中普雄旁的河滩上，他们用手刨开沙石，起出从上游冲下来的遗体，33具。后来才得知，上游一个100多人的工程队被泥石流吞噬。附近的布洛伊达森林，数人才能环抱的巨树，杨明建和工友将其锯下，为死去的工人制成棺材，立起木牌，将他们埋葬在普雄烈士陵园外的土地。令卢福全心存余悸的是在喜德的一次泥石流：“那晚工地放露天电影，很多工人都不在住处，如果不是放电影，死的人会更多。”

如今，乘坐成昆铁路老线，沿线仍能见到座座墓园，全线有工人烈士陵园20余处。此外还有遇难后限于条件只能就地掩埋的，居住在漫水湾的杨琼和章明凯夫妻两人，就曾偶然遇到来凉山寻找父亲坟茔的工人后代。在漫水湾铁路工人陵园中，墓碑上见到的籍贯大都是四川三台、中江、璧山，这是当年最穷困的几个县，“越穷的地方，上铁路的越多”。



📷 熊锡荣，1925年生，内江三台县人，上世纪50年代还曾参与修建宝成铁路，在成昆铁路工程中主要任务是打隧道。

生于1925年，熊锡荣是为数不多还健在的上世纪50年代参与修建宝成铁路的工人，从老家四川三台县出发，他记得自己上成昆线“是吃梨子的季节”，他的主要任务是打隧道，还记得秦岭的30号隧道是“烂洞子”——好像随时可能垮塌，大家都害怕被埋在洞里。



📷 陈廷洲，1931年生，四川简阳人，修完成渝铁路五天后便去了宝成铁路。成昆铁路完工后，他又前往非洲参与坦赞铁路援建。



📷 代炎培，1927年生，重庆璧山县人，因年少时读过私塾，修路之余他在“扫盲班”教工友们认字。

生于1927年的代炎培和生于1931年的陈廷洲也都是工人中年纪较大的，在上成昆线之前，他们也参与修建了上世纪50年代的成渝铁路和宝成铁路。陈廷洲如今还记得在1954年的一场大雪中，赤脚在嘉陵江边修路的情景。他回忆起初上铁路，是“为了吃饱饭”，在完成成渝铁路的五天后，直接去了宝成铁路。成昆铁路完工后，陈廷洲又前往非洲参与坦赞铁路援建。代炎培年少时读过私塾，成昆修建期间设有“扫盲班”，修路之余，他教工友们认字。

谢茂青是四川中江县人，生于1938年，在上成昆线之前他是四川中江的小学老师，由于字写得好，被分配写宣传标语，用于提高士气的大幅标语一条条挂在悬崖边。说起当年离开学校去修铁路的原因，谢说除了想赚钱养家，“也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 吴承清，出生于1943年，四川三台县人，因为当时年纪较小而且干活卖命，有“关不住的小老虎”的名号。

三台县人吴承清上成昆线的时候年纪还小，他是1943年生的，但干活卖命，因此有了“关不住的小老虎”的名号。有一年，吴所在的大队支援邻队的隧道工程，几百人打一个隧道，由于山体地质松垮，打了一年，山空了。工人们住在山顶上，有人看着队上的理发员走着走着就不见了，人掉进了空山中。后来工人们打了竹排，铺在山面，上工前都先敲敲竹排，听听底下是不是空的，才敢过路。由于原材料匮乏，以及设备限制，成昆线的建设多靠就地取材。吴承清回忆当年517队修建的越西县下拉伯三线红星大桥，全是用当地的石头建成的。各个施工队都要自己想办法，凿石架桥。“当时工地上有‘灯笼火把打隧道’的说法，最初打洞全靠洋镐和锤头”。

在到达漫水湾地势平缓的安宁河谷前，铁路线周折弯曲，一座山头甚至需要绕好几圈，这是成昆铁路特有的“展线”结构——杨明建打着手势比划着——在山里打洞，在里面“画一个葫芦形”，以缓冲铁路线的高落差，山上两座可以肉眼互相望见的车站，徒步走过去可能只需要10分钟，火车却需要在“展线”中穿行更长时间才能抵达。

行驶在成昆铁路的列车，很多时候都处于漫长的黑暗中。开往普雄的5319列车上，满背湿透的列车员靠在窗边：“等感觉隧道风吹得沁人时，才算真正进入凉山里面了。”火车进入沙马拉达隧道，“这个洞子要等得久噢，七八分钟才见得到光了。”沙马拉达隧道是成昆铁路最长的隧道，经常在铁路线上往返的当地彝人，显然已很熟悉沿途路段。44岁的王志刚是冕宁县人，在沙马拉达车站工作了8年。见到王志刚时，他刚匆匆跑进岗亭，举起令旗，在空荡的站台上迎接朝山谷驶来的列车。王志刚喜欢沙马拉达的雪景，他的手机里有许多大雪覆盖铁路线的照片。这是老工人记忆中，冬天会冻坏汽车发动机的成昆线最高点，海拔近3000米。

火车翻山的过程中，森林的味道从窗外灌满车厢。居住在沙马拉达乡火把村的阿西拉洛，今年90岁，当年曾协助铁路工人修建沙马拉达隧道。他与其他彝族青壮年上山砍下森林中的巨木，将木头滚下山，作为隧道里的支撑。隧道全长7公里，开凿难度极大，险象环生，伤亡不少。



📍 阿西拉洛，生于1933年，沙马拉达乡火把村人，曾协助铁路工人修建沙马拉达隧道。

沙马拉达隧道上的“东方红”字样，曾出现在无数宣传照中。在7公里外的那一头，车头的光点闪耀了几分钟，火车才徐徐驶出隧道口。火车穿洞时，大风裹着骤降的温度和潮湿涌出，在这里，隧道口斑驳的标语印记将时空拉回半个世纪前，时间仿佛静止。



📷 沙马拉达隧道全长6379米，是当时全国最长的隧道，位于老成昆铁路的最高点，海拔近3000米。

铁路异乡人



📷 参加工友聚会的曹修武（左）、章仕俊（中）、杨秀华（右）。

成昆铁路工人多数是四川和贵州人，在成昆线修建完成后，大部分又立刻去往新的铁路线，直到退休，很多工人都难以回到故乡度过晚年。杨秀华和章仕俊都是贵州人，如今都住在湖南衡阳铁五局的机筑处大院内。章仕俊当年负责贵州的招工，“招来的老乡基本上都在一个队，大家都很亲近。”杨秀华至今记得1970年，成昆铁路在礼州接轨时，沙马拉达隧道出了问题，接轨时间不能拖，他就一直守在工地上抢修，不敢睡觉。曹修武是湖北人，他谈起有一次翻山去借机械设备，路上只有折耳根（鱼腥草）吃的经历时，记忆里这种难以适应的当地食物，至今仍让他眉头紧皱。



石天富（左）和谢先华（右）讲述当年成昆铁路修建过程中的往事。

谢先华和石天富都是隧道工。修建后期有了日本进口的YT-25手持风钻机，机器本身就重达60斤，加支架100多斤，打洞时就靠人一直举着。举风钻的感觉谢先华现在还记得，几个小时下来，放下了风钻的身体还会不自觉抖动。遇到含水少的地质，钻洞产生的粉尘会持续进入工人的体内，无法避开，矽肺在短期内就能形成，“肺变得像石板一样硬”。不同地质需要不同的打法，遇到坚硬的花岗岩，钻洞很难，喀斯特地质则更加危险，容易发生塌陷。谢和石二人，及工人张树林、屈明双，现都住在衡阳茶山坳镇，老平房紧挨着他们修建的衡广复线，日复一日的火车轰鸣陪伴着这些铁路“异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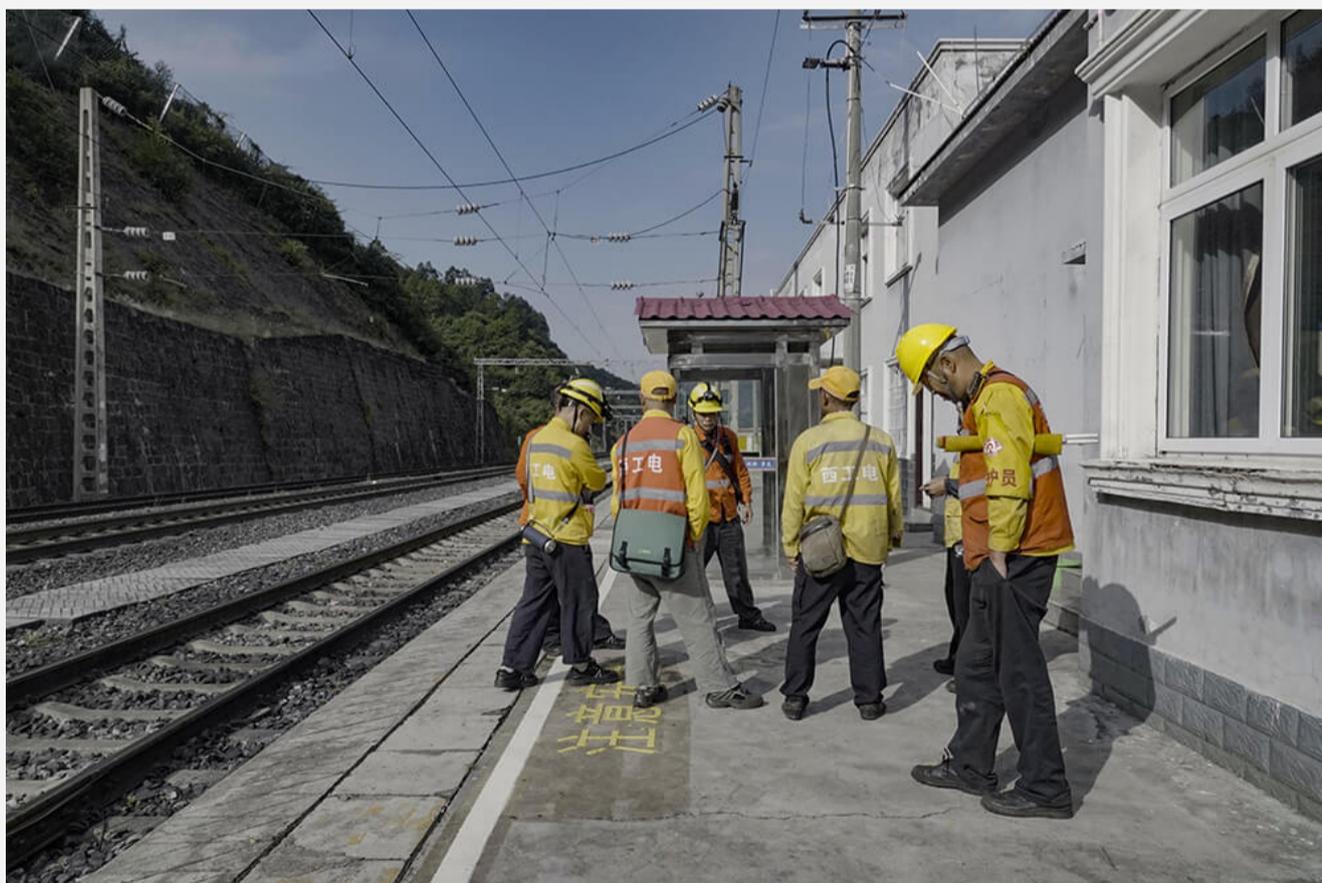
📷 王福全，1940年生，四川三台县人，他在成昆线上是炊事班班长，为了保证工人伙食在工地养猪、养羊。

桥工队的炊事班班长王福全是四川三台县人，在上成昆线之前，他就是村里公社伙食队的。为了保证工人的伙食，王福全在铁路工地养猪养羊，王福全小时候在农村就学会养猪，这成了他在铁路上保证工人伙食的绝招，“到哪都要养猪、种菜，不喂猪怎么得行！”有他在的工程队，伙食是出了名的好。1982年，因女儿生病需要手术费，王福全还曾作为劳务输出前往伊拉克修路，“你是个工人，只能拼命干活。”如今独居在湖南衡阳，王福全仍习惯每天给自己做两个川菜，狭小的厨房如当年他的炊事班房一样，井井有条。

如今居住在广东肇庆的倪兴来，口音还是明显的江浙腔。1964年他被分配到贵州建设水城车站（现六盘水），属于“大三线建设”的铁路网络。至今倪还熟知多年前操作过的各种机器：摩洛哥的翻斗车，捷克的“太拖拉”卡车，日本D80铲运机。湖南株洲人吴渭贤，以及四川中江的肖盛成，如今都居住在贵阳，除了成昆铁路的建设，他们都在上世纪80年代的铁路改制困境中，竭力为单位寻找各种“活路”。

铁路工人赵志顺在成昆线完工不久，沿着成昆全线采风，在1982年出版了《旅行在成昆线上》一书。此后他离开了铁路单位，去往贵州兴义开始了迥然不同的生活，至今仍在写作。赵志顺参与过贵昆线、成昆线，湘黔线等铁路建设。由于喜爱文学，在铁路时也一直读书写作。在给笔者的信中，他写道：“成昆铁路，是一个既虚掷过青春，又拽回过青春的地方，铁路生涯是我生命中极为宝贵的一部分”。至今赵志顺还一直用着“枕木”这个笔名。

老年活动室里，曹修武说道：“回忆起来就像昨天一样，大凉山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样了，铁路修完就走了，我们该回去看看的。”随后他与杨秀华、章仕俊一起离开，“反正也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些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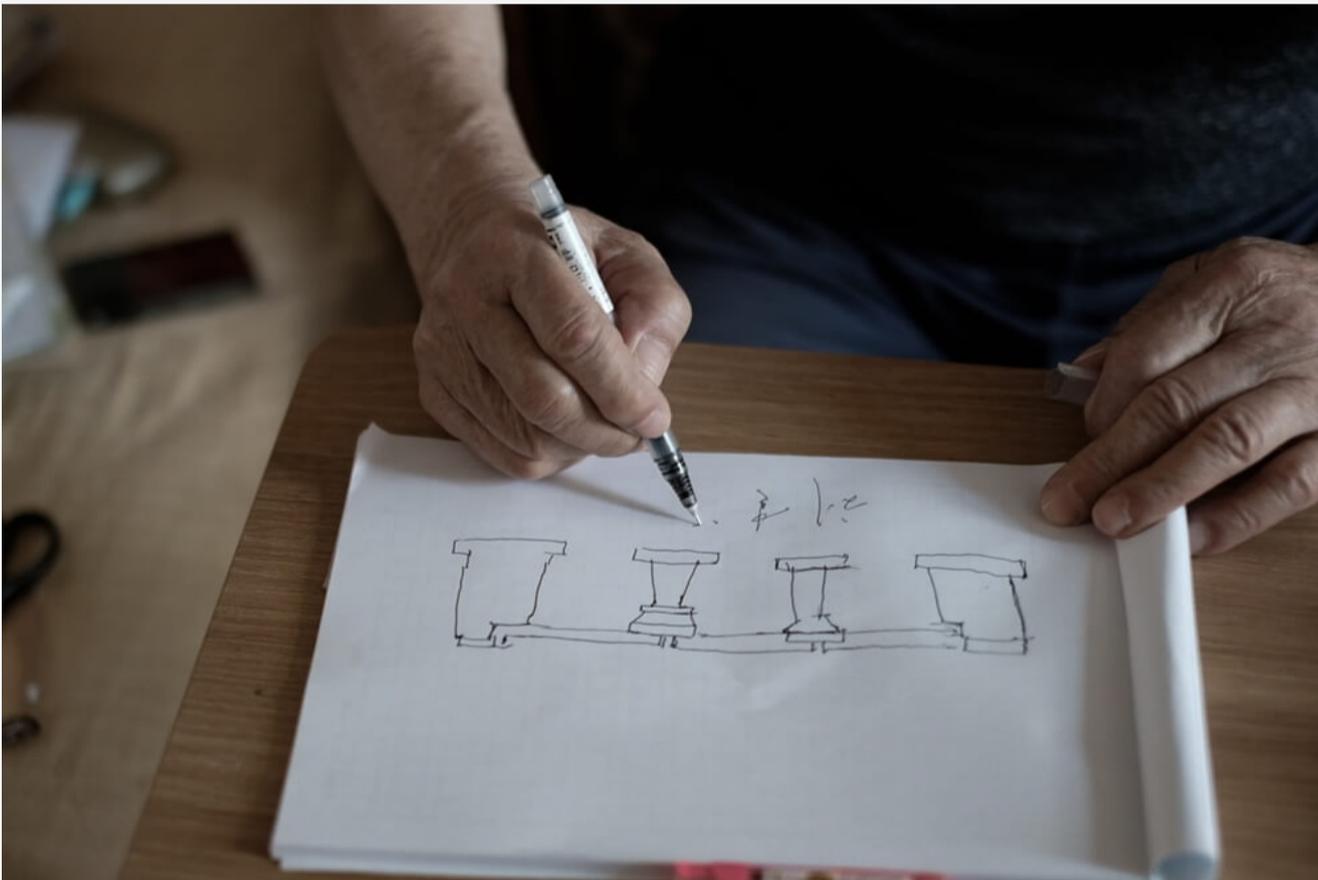


📷 由于年代久远，为了保障运行安全，需要有专人给成昆铁路的铁轨“探伤”。

“我们都老了”



📍 刘建华，1940年生，湖南湘乡人，1963年毕业于长沙铁道学院桥梁专业，在成昆铁路做桥梁设计。



📍 2021年10月，已经有阿尔茨海默症状的刘建华还能画出一座铁路桥梁示意图，当年底他在贵阳逝世。

2021年10月5日，贵阳养老院里，刘建华颤抖着画下了一座歪歪扭扭的桥梁示意图，边画边喃喃道：“先画桥墩，再接桥梁……大致就是这样，画不好了。”他是湖南长沙人，1963年从长沙铁道学院桥梁专业毕业，在成昆铁路负责桥梁设计，一生中画过无数设计图纸。尽管已有阿尔茨海默症状，脑海里过往许多记忆都离他而去，却留下了这座歪歪扭扭，但始终没被记忆抹去的桥梁。两个月后，刘建华去世。

2022年12月7日，新冠疫情余波尚烈的日子里，张金春与工友们仍按期聚在了一起，这次一共来了24人。一个月后，一位工友就突然离世了。“以前有六七桌，现在就这么两桌人了。”张金春说。

张金春还想去坐坐老成昆线，“但我们都老了，没机会了”。他把如今已密布全国的高铁线称为“新线”，与之对应的是他们那一代老铁路人所建设的“老线”。跟铁路打交道几十年，工人们大多对“老线”了如指掌，沿着铁路线能找到记忆中不变的坐标。如今，在密闭的车窗里，这些老铁路人已难以辨认车站的位置和线路的方向。

老成昆线全段耗时长，除了速度限制，还因为沿线设站密集，途经许多大凉山深处的彝族村庄。一位从瓦祖上车的彝族阿姨坐在窗边，去新凉看望友人，这是她几十年来，已非常熟悉的线路。旅途中的车厢也是沿线居民很亲近的空间，当地人会在车上售卖零食或是手工作品。列车设有专门放置牲口的车厢，列车员说，彝年前后，车厢内的猪儿“塞得满满当当”，她还遇到过火车里去邻村接亲的队伍。



📷 往返于“普雄—攀枝花”的5633次列车内：独自喝酒的彝族老人；



📷 去新凉看望友人的彝族老妪；



📷 座位上酣睡的婴儿；



📷 背篓是列车里最常见到的搬运容器。

新成昆线，已不在老线的小站停留。普雄车站后，半山上的铁路线旁，堆放着一些废弃的“退休”车头。在铁轨边等待几小时，才会偶尔有缓慢驶过的货运列车。不远处，没有走出凉山的工人的墓碑，面朝着老成昆线，静默地立在群山中，终年与山谷的风声，和每日来了又去的汽笛为伴。



📷 轨道边的普雄铁路职工陵园和烈士纪念碑。成昆铁路全线分布着22座墓园，官方统计有约2100位工人牺牲，但沿途也有散落在山间的坟墓。

图片编辑 | 董德

开篇图说：越西县乃托镇铁马大桥，全桥长882米，是成昆线上的第三长桥，采用了薄壁混凝土空心墩技术。此桥是为了避开滑坡而修建的非跨河铁路桥，与桥平行的是大渡河的支流牛日河。

订阅财新
支持严肃新闻

逝者 | 个体私营经济命运缩影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1月30日第04期

年广九（1940—2023），民营企业家



年广九。

文 | 财新周刊 孙嫣然

2023年1月11日，民营企业家、“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九（又名年广久）逝世，享年84岁。

年广九1940年出生，安徽怀远人。早年家贫，他随家人一路逃荒，颠沛流离，最终定居芜湖。9岁起即随父母摆地摊为生，早早学会了街头叫卖；几年后接手父亲的水果摊，并谨遵其“利轻业重，事在人和”的营商教诲。年广九贩过水果，卖过冰棒，也倒过鱼虾；1963年因犯“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1966年“文革”开始后，又被扣上“牛鬼蛇神”帽子再度入狱。

出狱后的年广九性情不改，又转行卖起了瓜子。孰知因此改变人生，日后企业越做越火，被冠以“瓜子大王”和“中国第一商贩”，乃至改革开放的“报春花”。

在计划经济时代，区区瓜子亦属于统购统销物资，由供销社统一经营，凭票购买，个人染指售卖则属违法行为。年广九起早贪黑，跟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打游击战。他曾自称，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赚下了人生第一个100万。赚下的钱不敢存银行，就把钞票用牛皮纸包好藏在家中。1976年，唐山大地震震塌了房子，别人家拿出来在院子里晒的是粮食玉米，年广九晒的是一沓沓钱。

“傻子瓜子”得名于年广九摆摊时的做派。“别人买一袋后，总会问这够秤么，我就抓起一大把，递到他手上！”由于这种不计较斤两、薄利多销的做法，年广九被称为“傻子”。一传十传百，“傻子”火了，生意也越做越大。在“万元户”还很稀罕的上世纪80年代，年广九一天的流水就能超过2万元。

年广九文化程度不高，但脑子灵，有胆识，经营中颇有一套本事。“傻子瓜子”不仅在调味上肯下功夫，还在技术上勇于创新，向顾客承诺货真量足、童叟无欺，在上世纪80年代的芜湖一枝独秀。1981年9月12日，当地报纸以《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为题刊发报道，“傻子瓜子”从此销售疯长，年广九本人也名气大增。1981到1984年，年广九的雇工从3人发展到103人。在他带领下，芜湖的瓜子产量从不到100万斤猛增至3000多万斤，创造利税400多万元。

“傻子现象”引起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关注。1983和1984年，邓小平两次直接点名，以年广九和“傻子瓜子”举例，表示国家鼓励和发展民营经济。

1984年，年广九与两家芜湖市属国企签订了联营协议，正式成立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虽然公私联营没有给他带来更丰厚的经济回报，但他认为自己在探寻一条私营企业发展的新路。

1985年，年广九率先在全国开展有奖销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一时间“您想拥有一辆轿车吗？请买傻子瓜子”广告词铺天盖地。一个月后，国家出台政策制止有奖销售，全国各地纷纷退货，公司直接经济损失60多万元，从此声誉锐减。不仅如此，芜湖市人民检察院接到举报，对年广九个人经济问题展开调查。1989年，年广九因“贪污、挪用公款”罪被逮捕，次年“傻子瓜子”公司关闭。1991年，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前列罪名不成立，最终以流氓罪判处年广九有期徒刑3年。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说道，“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

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这段话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年广九后来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印在自己名片背面。他曾称“只有党了解我”，“我是改革的模子，是否合格由党判断”。

1997年秋，浙江卫视播出6集电视专题片《傻子沉浮录》，再次引发轰动，两个月有57家电视台相继播放。同年9月，中共十五大召开，年广九深受鼓舞，一口气在国内开了96家分店，雇了200多人炒瓜子、500多人卖瓜子，年收入达3亿元。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年广九响应国家政策，接收国企下岗员工。彼时对个体户的偏见仍有残留，年广九却说，国企的包袱太重了，只有个体户充分发展了，这些工人才有地方安置，他们的积极性才能被带动起来。

2001年，年过花甲的年广九把“傻子瓜子”商标转让给儿子，从此退居二线。但他没有真正闲下来。2004年，他带着律师去河南街头打假，站在通过法律途径保护商标权的前列。直到2018年，年近八旬的年广九还被人看到出现在“傻子瓜子”总店的柜台后，仍然保留着早年顾客买好瓜子装袋后再多抓一把塞进去的习惯。同年10月，年广九入选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

版面编辑：边放